

帝國主義論

圖說定

◆◆全一冊實價六角◆◆

譯述者 鍾原昭

發行人 張鴻飛

總經售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總店：福州路三二四號

支店：廣州南京漢口北平

出版期：民國廿六年五月廿五日

發行額：初版一一二〇〇〇冊

〔乙項〕第一二三三號

帝國主義論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目次

緒論

第一章 生產的積集和獨占

- 第一節 積集的成長和獨占.....
- 第二節 獨占和競爭.....

第二章 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政治

- 第一節 銀行的新作用.....

M. Chang
C. m. Chang

元

1

第二節 金融資本.....

第三節 金融寡頭政治.....

第四節 金融寡頭政治和國家.....

第五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第二章 資本的輸出.....

第一節 資本輸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第二節 資本輸出和寄生性.....

第三節 反伊里奇的資本輸出論.....

第四章 資本家團體間的世界分割.....

第一節 國際獨占的作用.....

第二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第五章 大列強間對於世界的分割 九

- 第一節 世界領土的分割和殖民地 九
- 第二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九
- 第三節 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 一〇〇

第六章 不平衡發展的法則 一〇七

- 第一節 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法則的本質 一〇七
- 第二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一一七

第七章 帝國主義和勞動階級 一一三

- 第一節 帝國主義下勞動階級的狀況 一一三
- 第二節 帝國主義下勞動和資本的鬥爭 一一五

第八章 帝國主義是頽廢着的和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 [四]

- 第一節 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和頽廢 [四]
- 第二節 頽廢的形態和寄生主義 [五]
- 第三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六]
- 第四節 帝國主義是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 [六]

第九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七]

- 第一節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生及其三個時期 [七]
- 第二節 世界經濟的分裂和二個制度的鬥爭 [八]
- 第三節 在總危機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最重要的特性 [八]
- 第四節 蘇聯的成長和資本主義穩定的終結 [九]

緒論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其特徵如下：帝國主義第一、是獨占的資本主義，第二、是寄生的，頑廢了的資本主義，第三、是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伊里奇）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的階段。這個階段是開始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間的。十九世紀的末期的三十餘年是向着這個時期的過渡。「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進入到更高的社會經濟秩序了，因此在那時就已經全面地形成而且呈露出這個時代的特徵。」（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第七章）

生存於先獨占資本主義時代的馬恩，「祇能夠推察那隨着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而到來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約瑟夫）在馬恩的著作中，祇不過散佈着少許預測帝國主義時代的卓見。

馬恩的經濟見解，被伊里奇應用到最新的資本主義的現象上，這裏乃獲得了牠的進一步

的發展。這種應用我們常常可以在伊里奇的論著中見到的，在這些論著裏，他使帝國主義論成為最發達的科學理論，同時也批評那些偽裝科學的機會主義和布爾喬亞的理論。正因為伊里奇能夠把卡爾的經濟理論，應用到最新的資本主義底現象上去，所以才能夠闡明這些現象底本質，並且才能夠說明這些的本質怎樣地，而且為什麼會發生出一定的現象形態，伊里奇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在約瑟夫的著作中又發現了牠更進一步的發展。

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的特徵，很明白地表現於他所給與帝國主義的一般的定義中（這些定義我們可以在他的論著中找到）。這些定義，雖然祇是包括着這些現象（即在資本主義最新階段上所發生的現象——譯者註）底極其重要的，以及特徵的性質，但是在這些定義中，正顯示出伊里奇對於這個階段理解的本質。

「若果一定要非常簡單地給帝國主義下一個定義，那麼必須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獨占階段。……但是，這個太簡單的定義，在抽出其主要點上，雖然是很便利，然而，若果必需要從其中特別地誘導出這些現象的最本質的性質的話，則是太不充分。同時，不要忘記一切的定義，都有着限制的和相對的意義，而且牠決不能包括發展着的現象的全面關聯，在

這樣的瞭解之下，我們就給帝國主義以這樣的定義吧！這個定義包括着以下這五個重要的特徵，第一、（在帝國主義之下——譯者）生產和資本的集積，達到了很高的發展階段，而且創造出在經濟生活中演着重要作用的獨占；第二、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而且在這種「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少數的財閥巨頭；第三、和商品輸出相區別的資本輸出，在這裏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第四、形成了分割世界的國際獨占資本家的聯盟；第五、由最大的資本主義強國完成了地球上領土的分割。因此，帝國主義是發展到最高階段上的資本主義；在這個階段上，成立了獨佔和金融資本的支配，資本輸出獲得了重要的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了世界的分割，而且最大的資本主義的強國，完成了地球上全領土的瓜分。」（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第七章）

伊里奇把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加以考察以後，才給這個階段以這樣的定義，這個定義，不單單只說明：獨占的支配帝國主義的根本的經濟特徵和本質，同時這個定義也強調了帝國主義的其他特徵，對於這個本質的制約性。帝國主義底這些的特徵，不單單只是互相地關聯着，以及互相地制限着，同時牠們，完全都是從一個根本的，基礎的特徵中——

論——即，從生產的集積以及那由集積所發生出來的獨占中——產生的。這個根本的特徵，對於其餘特徵的主導作用，正是伊里奇的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

但是，必須要注意；這裏所引用的定義，不過祇是舉出了帝國主義底經濟的本質，而且祇是說明了帝國主義的經濟特徵底表象。在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定義是不完全的。所以給了這個定義以後，伊里奇繼續這樣寫：「若果，我們不單祇將根本的純經濟概念（前述的定義完全祇是說明了這個純經濟概念的）拿來思索，而且也將資本主義的某一階段在資本主義全階段上的歷史的地位，或者也將帝國主義和勞働運動上的兩個基本的傾向間的關係拿來思索的話，則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另外給帝國主義下其他的定義。」（前揭書第七章）伊里奇重新更加精密地把帝國主義定義爲獨占的，頗廢着的以及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這個定義不單祇包含着帝國主義底經濟本質，而且也表明了牠的歷史地位。因此帝國主義底完全的，正確的認識是要考究牠（帝國主義——譯者註）對於勞働運動上的兩個基本的傾向的鬥爭上的影響，對於勞働大衆，首先勞働者羣底地位的影響，對於勞働和資本的鬥爭形態的影響，對於國家和政黨等等的影響。

伊里奇對於帝國主義的考察方法，也在帝國主義的這樣理解上被確定了。伊里奇把自己
的考究從生產底集中和獨占而開始，一步步很有條序地如下地陳述了：即陳述了生產集中怎
樣地產生出獨占，而且在經濟生活上付給牠（獨占——譯者註）以怎樣重大的任務；被生產
集積所制約着的銀行底集積，怎樣地強化了一切集積過程；獨占工業資本，怎樣地和獨占的
銀行資本相融合，而且怎樣地形成了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政治；牠怎樣地變化了資本輸出底
作用和性質，而且怎樣地引導向資本家聯盟以及強國間世界再分割的鬥爭。

當我們考究那表現爲帝國主義主要特徵的，獨占的基本形態以後，我們也明白了帝國主
義上層建築構成要素的性質（不消說這個帝國主義的上層建築的性質，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之
上的）。舊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上層構成的配合，引起了帝國主義矛盾的空前的尖銳
化。首先，這是意味着「世界上，獨占資本主義若果在一切部門中沒有了自由競爭，是不存
在的，而且將來也不能夠存在的。」（伊里奇）這也更加意味着在資本主義的動機（即利潤
的追求——譯者註）存在之下，獨占的支配必然地引導到寄生主義和頹廢。在這一切結果
上，發展底不規則性，獲得了重大的意義。

在這些一切變化的總結上，生產屬社會性質，和資本主義的占有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底全體系——達到了非常尖銳化的程度，而且這種尖銳化，把資本主義引導到行將死亡的道路。如果，伊里奇的著作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是卓越地敍述關於「帝國主義經濟本質的問題」，那麼在這個論著裏，而且也在其他的許多論著裏（如社會主義和戰爭，第二國際的崩壞，機會主義和第二國際的崩壞，關於自治問題的討論的總計，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裂，等等著作中）伊里奇也考究了勞動運動上兩個基本傾向的鬥爭，同時也考究了國民的問題，以及關於國家等等的問題。在帝國主義底特有的時期中，反動的增大，議會主義的危機，軍備競爭，國際的、階級的以及國家等等矛盾的尖銳化，在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的曙光上，並不是可以用那些從統治者的醜惡狀態中所發生的偶然現象來說明，而是用獨占資本主義，以及牠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上層構造的必然結果來說明。

伊里奇把帝國主義看爲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看爲「普羅列塔里亞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他在自己的論著上，說明了：這個階段，怎樣地尖銳化了這個時期以前——（即和那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同時開始的革命和戰爭底時期以前，亦即資本主義

的總危機時代以前）——的資本主義的矛盾。

爲着把那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期同時開始的一九一五年加以特徵，伊里奇如下地寫道：

「當資本主義完全克服了歐洲先進國家底封建主義，而且還能夠更加的——比較——安靜和順利地發展着的時候，即當牠還能夠『和平』地擴張到那沒有被開發的土地，和最後才被捲入到資本主義漩渦中的國家去的時候，比較『和平的』資本主義，曾經存在過。不消說，也大約在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的這個時期中，『和平的』資本主義既在軍事的，也在一般的階級的意義上，製造了和近代的『世界』極其不同的生活條件。但是對於十分之九的先進國家底居民，對於百萬萬的殖民地和落後國家底居民，這個時期已經不是和平的而是榨取的、苦痛的、恐怖的罷！（這個恐怖要比那所被認爲『無涯的恐怖』要來得更爲可怕罷。）但是這個時期永遠地過去了，而且，由於比較更不安定的、飛躍的、破局的、衝突的時期，出來代替了牠（到了這個時期，對於人民大衆，已經不是『無涯的恐怖』而是『有涯的恐怖』占着支配的地位了。）」（伊里奇）

開始於大戰時期的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從十月革命時期中所發生出來的世界經濟的分

裂上——即二個世界，二個制度的分裂上——發現了自己的表現，同時，這種總危機正表現出帝國主義底最後階段。這個危機的本源是置其基礎於獨占的、頹廢着的、行將死滅底資本主義的性質上，而且也是置其基礎於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性質上，只有伊里奇的帝國主義的理論，才使我們能夠瞭解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性質，尤其是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特有的政治現象。這個階段中所特有的國際的革命過程，法西斯的成长，社會民生主義的法西斯化，世界××運動的擴大，敵對戰爭要素的成熟等等，都在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的條件上，表現出了獨占資本主義的特性。

第一章 生產的集積和獨占

第一節 集積的成長和獨占

獨占，照伊里奇所給的特徵來說，則「……是帝國主義最深固的經濟基礎。……」牠是資本主義一切先歷史發展底不可避免的結果，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資本集積和集中法則底直接產物。近代資本主義底獨占是從集積而發生的這一事實，由於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進展所證明。例如，在德國，每千家企業中，大的經營在一八八二年只有三家，一八九八年有六家，一九〇七年有九家，到了一九二五年已達到十八家。在每一百名從事於工業的勞働者中，屬於大經營的，在一八八二年是二十二名，在一八九五年是三十名，在一九〇七年是三十七名，到了一九二五年竟達到四十七名。在企業的總量中百分之一·八的企業，集中着百份之五〇以上的勞働力，而同時百份之八十七的企業，僅僅占有百份之二十八·七的勞働

力。關於近代德國工業上生產手段的集積程度，在下面的表中，很明白地表現出來。（這個表是依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資料所造成的。）

企業的規模	企業數量	總數和各種企業 所佔的百分比	馬力 (單位千)	各種企業在馬力總 數所佔的百分比
I (五十馬力以上)	三二、七五九	一、八	一四、八六八	七九、八
II (中等的企業) (從六到五十馬力)	二〇六、〇九九	一一、一	一二、三八二	十二、八
III (五馬力以下)	八七、一	一一、三六八	一一、三六八	七、四
總數	一〇〇	一一、八五八、七三七	一一、八六一八	一一〇〇

生產巨大的集積，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生活中，給大企業以極大的優越性，而且造成了「數萬的大企業擁有一切；數百萬的小經營一無所有」的這種情形（括符中，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第一章），因此，必然地使那些比較少數的巨大企業分佈在國民經濟的數百部門間，同時使生產集積底過程，進行得非常地不平衡。而且使這些大規模的企業，緊緊地把握了一切工業底重要部門。同時在各種部門的少數或者數十資本家手中，即大企業所有者底手中，

集中着大部份的生產手段，因此他們在一定的階段上，由於使中小資本家隸屬於自己，由於合併他們的資本，以及使他們的資本倚從於自己等等的方法，而獲得了獨占的地位。因此，我們知道，集積為獨占創造了直接的前提，而且「可以說，在牠（生產的集積——譯者註）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其本身緊密地接近了獨占。」（前揭書第一章）

近代企業高度的資本有機構成，為資本的投資造成了巨大的障礙，結果，把大部份的資本都投到固定資本裏去，因此不能夠迅速地把牠從某一生產部門，轉移到其他部門中去。同時因為大企業的經濟權力以及戰鬥能力的驚人成長，所以在前者和後者的總合上，遂使他們間的競爭，成為更加的困難和衰敗，而且招來巨大的損害，因此使資本家們也不得不立在一時的妥協的前面。同時，那從競爭所發生，而且把生產集中到少數企業中去的集積，為那在資本主義之下（即當生產還分散於多數的小企業間的時候）所不能達到的、一時的協定和獨占結合，創造了客觀的可能性。

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機構，在其自身發展的一定水準上不可避免地引導向獨占結合的形成，引導向資本主義獨占的支配，同時這個獨占本身又引起了資本的集中和集積的更加緊

張的過程。

資本主義結合的極其流行的形態，是加特兒（Cartel），獨占組織的這種形態，是資本家的一種結合。這個結合爲自己的參加者，制定了生產的分擔額，以及商品價格的最低水準，而且也在他們之間去分配那些原料和販賣市場，同時也確定勞資的最高的水準等等。加特兒的參加者，無論在商業或在生產領域中，都依然是獨立的。加特兒屢屢掌握着工業的許多部門。牠，如果依照其本身的性質講，那麼可以說是資本獨占組織的一種比較幼稚，而且不十分鞏固的形態。

獨占結合的更高的形態，是把（既成商品底販賣，以及原料的供給等）許多商業事務都集中於自己手中的新迪克（Syndic）。

獨占結合的最耐久的形態則要推托拉斯（Trust），托拉斯是相互結合着的企業的絕對專制的主人。結合於托拉斯中的企業的所有者，轉化爲能夠享受一定利益分配金的股東，這種的分配金是和現存於托拉斯之中的股票數量相符合的。如果說，加特兒和新迪克比較容易崩壞，那麼托拉斯可以說是資本底比較耐久的獨占結合。在這個獨占結合裏面，一切加入到

這個組織裏的企業，溶合於一個統一的組織中，而且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

企業（托拉斯）的康平拿（Combinat）形態的流行，是「……達到了最高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特性……」（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第一章）。康平拿據伊里奇所給的定義來說，則是「一個由於許多不同部門的企業所結成的組織。譬如，是一個由於原料加工的許多連續部門（例如把鑄石溶解為鑄鐵，把鑄鐵製練為鋼鐵，而且以鋼鐵來製造各種鋼鐵製品等等部門）所結成的組織，或者是一個由於演着相互補助作用的各種部門（例如對於副產物或者廢物的加工，包裝材料的製造等部門）所結成的一個組織。」（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第二章）

但是，因為資本集積和集中的驚人成長，甚至使那些已經康平拿了的托拉斯的範圍，也不能再滿足這些獨占集團對於資本應用的要求了。因此在最近幾年來，資本獨占組織的特別的形態——康郵（Concern）——遂獲得了擴大的流佈；牠們（這些的康郵——譯者註）在金融關聯和金融依存底各種制度的援助之下，掌握了國民經濟中許多不同部門的企業，而且也屢屢掌握著原則上和他們沒有關聯的許多康平拿。加入到康郵中的企業和銀行，形式上仍

然是獨立的，母公司（康郵的中心）的指導作用，是依賴對於依存企業（子公司，孫公司）股票的收買，股票的交換，以及信用關聯制度等等方法來現實。康郵是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結合——即金融資本——的極其典型的實例。這種的康郵祇能夠完成於工業和銀行集中的極其高度階段的基礎上。這樣的康郵的事業，屢屢遙遠地超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底境界，而獲得了國際的性質（參看第四章）。美國的加里曼集團，法國的蘇內伊得爾·克里蘇康郵以及最近因為自殺而破產和倒閉了的伊文拉·克里伊格拿康郵——即，克里伊格和托里——等等都屬於獨占組織的這一類形態。

把上述所引用的資本獨占結合的形態加以區別以後，我們必需知道其中，必然有着許多中間形態和他們同時存在着，而且也必需知道前者和後者之間的界限是有充分的彈力性和制限性的。此外，我們也要知道在各個不同的國家中，甚至也在同一的國家或者同一的組織（例如托拉斯）的範圍內，也能夠發見資本主義獨占的各種不同的形態。

因此，近代資本主的獨占是生產手段的集積以及對於勞動支配過程所不可避免的產物。隨着和蓄積具有相同意義的集積的發展，那發生於這個基礎上的集中，遂演着重要的作用，

集中是表現爲「已經蓄積了的資本的集積，表現爲其個別獨立性的絕滅，表現爲資本家對於資本家的收奪，而且也表現爲多數小資本家向少量的大資本家的轉化」（資本論一卷）。擴大於資本家間的無情競爭戰的基礎上（這種競爭戰是發生從資本主義本身性質中的，也是發生從私有財產、以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中的，而且牠不可避免引導向小資本的沒落和大資本家手中的資本集中）所發生的巨額資本集中，極其強化了資本主義獨占的形成過程。在這過程（即獨占的形成過程——譯者註）上，無論這種集中的過程，是「由於強力的合併的方法來實行也好，或者這種已經形成，以及正在實行中的許多資本結合，是由於更加圓滑的方法，即由於股份公司的形成的方法來實行也好，問題上並不生任何變化，而且在經濟的作用上……仍然是不變。」（資本論）

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獨占的發展，以及他們支配強化的過程上，都演着重大的作用。而且，近代獨占資本的組織在多數的場合上，都是採取着這種形態。個別資本的集積過程無論怎樣地進行着，若果單單只靠牠本身，則無論怎樣都不能夠達到近代企業所要求的那樣大的規模。「若果必需等到若干個別資本的蓄積，達到能夠處理鐵道的時候才開始去建築鐵道，

那麼世界上恐怕到了今日仍然還沒有鐵道罷。反之，集中由於股份公司的方法，才能夠這樣地容易達到的。」（資本論一卷三十三章）股份公司之所以能夠支配着巨額的資本，乃是因為牠不單只管理着自己的資本，而且也管理着分散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量資本的緣故。因此，股份公司是大資本對於小資本榨取的強力槓杆，也是大量創業利潤的綴取，以及公司中少數資本家「巨人」的專制支配的強力機關。

例如，在一九二九年初，德國有着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個股份公司，和二百二十八億八千五百萬馬克的名義資本。在這個總量中，八千五百三十五個股份公司，僅僅只有着十九億零八百萬馬克的資本，而同時一百七十一個大股份公司竟握有一百十七億零四百萬馬克的資本；即百份之七十四·四的股份公司只有着百份之八·一的資本，而少數的部份——即百份之一·四——的股份公司卻佔有差不多半數——即百份之四十八·五的資本，在一九三〇年初，德國有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四個股份公司和二百三十七億二千八百萬的資本，而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只剩下九千六百二十一個股份公司和二百二十三億馬克的資本。因此，平均起來，每一個股份公司在一九二五年構成了一百四十七萬馬克的資本，一九三〇構成了二百

二十一萬馬克的資本，一九三一年是二百三十六萬馬克。但是必需知道這種靜的統計，並不能反映出在參與制度的媒介中大股份公司對於小股份公司的支配。依照一九三〇年的統計，全德國股份公司的總資本的五份之四是集中在大股東的手中，而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集中在他們手中的，只不過是三份之二。為資本主義獨占做露骨的辯護的羅白里夫曼的話並不是偶然的，牠也不得不承認事實上各個股份公司，是被若干人的集團所管理，「這些少數的人單單祇保有着很少的私人資本，但是由於輕微的投機的結果而占領了許多生產部門；而且強制牠們來奉承自己的利益。這些金融業者應用着近代信用制度以及股份事業的一切支持手段，在銀行、托拉斯的康郵、保險公司、統制公司等等的援助之下得到了管理着比他自己所有的資本、要大到二十倍左右的資本的可能。」

獨占資本的強力組織——加特兒、新迪克、托拉斯等等——用自己的網握住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經濟，而且牠在重要的部門上成為更加地強固。例如在德國，鑄山企業百分之一八十一·五是結合着的，褐炭的百分之一九十四·五以及電器企業的百分之一八十六·九是結合着的。德國的鋼鐵托拉斯管理着全國鋼鐵精練事業的百分之一四十五，伊格法爾濱印斯德差不多

支配着綜合有機染料生產的百份之九十五，和窒素生產的百份之八十，亞阿格和斯曼斯管理着德國電氣工業輸出的百分之八十。四個加里的康鄧，掌握着全德國加里產額的百分之九十三。煉瓦、漆布之生產，砂糖和酒精的工業也都由於獨占組織所握占。

在美國資本主義獨占的作用更大，因此他們發展的水準和他們組織階段也更高，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依照政府的統計，九十三個資本家在相互的關聯各種形態上，管理着全美國鐵道長度的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貨物運輸的事業。在帝國主義戰爭的若干年以前，已故大資本家加里曼所管理着的鐵路網，其長度要超過全德國的鐵道。由於魯克飛里所管理的，美孚汽油托拉斯獨占着石油以及很多石油生產物的運輸和再加工，在一九一一年這個托拉斯形式上是被拆散了，但是在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廢止自身的存在。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牠握有着全美國汽油工廠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也掌握着汽油引送事業的百分之六十八和美國市場上汽油販賣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由摩爾根所管理的美國鋼鐵托拉斯，在一九三一年有一百三十六個工廠和一百零一個熔鐵爐，以及二十三億美金的財產。麥倫拿托拉斯掌握了美國和加拿大的鋼精(Aluminum)生產的百分之百左右。白銅的獨占（加拿大

國際白銅公司）掌握着加拿大的白銅產額的百份之百，和世界產額的百份之九十左右。（以上都是一九三一的統計）

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在某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底特徵上，尤其是在保護關稅的政策上去求資本主義獨占發展的原因。但是這種觀察完全和事實相反。在二十世紀以前，還保留着舊的自由貿易的英國，生產的集積也同樣招來了資本主義獨占的支配。例如百份九十五的鑄鐵的生產是由於獨占結合掌握，鐵道的新迪克在鐵軌生產上獲得了支配的地位。保爾脫姆水泥的結合在一九一二年已經管理着水泥生產的百份之七十五。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仍佔有著百份之七十。糊牆紙的托拉斯，管理着這種生產物生產的百份之九十八。棉布的工業（在德國這個經濟部分比較強硬的屈從於加特爾化）在英國已經于一八九九年結合爲托拉斯，牠握有全棉布生產的百份八十五，除了這些以外，到如今，在還存在着的這些形態中，也必需記入那掌握着石油生產的百份之九十左右的人造油的托拉斯要尼里未兒，以及管理着百份之七十左右的有機染料生產和差不多百份之百的室素生產的英國化學托拉斯（即帝國化學有限公司）；還有橡皮車胎托拉斯答論（牠握有英國橡皮車胎生產的百份之八十五，和販賣的百分

之六十左右）：四五個冶金的康都，握有銅鐵生產的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九年，蘭開夏棉花組合管理着棉花生產的五份之一左右。英國石炭工業的集中過程，在最近十數年來，是尖銳地向前跳躍。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在一千四百個石炭企業中，一千個小企業只握有着石炭產量的百分之七，而四百個企業竟握有着百分之九十三。在一九三二年以後，僅僅只有那掌握着二十七個石炭公司的四個大勢力存在着。因此，伊里奇如下強調地說道：「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異（例如，保護關稅，或者在自由貿易的關係上）單單祇在獨占的形態上，或者在獨占出現的時期上，附給牠以差異的條件。但是獨占是從生產的積集而發生的這一件事實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近代階段的一般的和基本的法則。」（伊里奇）

伊里奇把資本主義獨占的發展制定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八六〇年到七〇年間。這個時期「即是自由競爭發展到最高和最後階段的時期」，也是近代獨占發生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開始從一八七三年的危機以後，到十九世紀的終末。這個時期即是「加特兒發展的擴大的連續期，但是這種發展還並不是一般的」。第三期是開始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初——在這個時期中，「加特兒乃成為一切經濟生活基礎之一——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

主義。」那表現爲資本主義的牢固基礎的自由競爭，通過了資本集中和集積遂成長，而且不能不成長爲其自身直接的矛盾，即不得不成長爲獨占。獨占獲得了支配的地位，而且侵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方面，牠既使舊的矛盾成爲更加尖銳化，又使新的矛盾發生了，而且把資本主義轉化爲帝國主義。

以自由競爭爲基礎的舊的資本主義時代終結了。獨占資本主義於是乎開始。

第二節 獨占和競爭

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獨占的發生，使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質的巨大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的範圍，乃是和自由競爭相比較而說的。生產的社會化過程，是在資本的集中，以及從集中所產生出來的獨占的形態上發生出來的。這種社會化的過程爲收奪者的收奪，創造了必然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即爲那向直接的社會生產（即直接地由於社會所節制和管理的生產）的轉化，創造出必然的前提，同時，我們知道，這種直接的社會生產，是發生於生產的社會化的基礎上的。當生產力仍然還是存在於私有的性質上的時候，牠的巨大的

社會化，祇招來一切資本主義矛盾的強化，尤其是，招來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強化。僅僅在排除私的占有的基礎上，才能夠排除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創造出更加的必然性和十分性，即為牠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能夠以計劃經濟來代替的這一件事情，創造出更進一步的必然性和充分性來。這個已經為卡爾所豫知了，關於獨占的問題他如下地寫着，獨占「為全社會和國家將來收奪（即生產手段的收奪——著者註）而準備了極其滿足的條件。」（資本論）

然而，我們必需知道，若果，獨占越大，若果，在牠的範圍中，生產越是組織化，那麼全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也必更加強化；這是鐵一般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的獨占，是存在於私的占有的基礎上，而且也是存在於為着利潤追求的基礎上的緣故。當獨占的結合及其強力的獨占敵對者行着鬥爭的時候，牠盡可能地利用了自己機關的一切生產能力和自己的一切金融權力，也利用了一切關係和勢力。這樣某些獨占範圍中的組織性（這種組織是存在於結合着的資本家間的沒有終止的鬥爭上的東西）乃成為全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強化的源泉。在這個資本主義獨占形態上所發生的生產力的社會化過程，決不能夠消滅資本主義的確

定的性質。

獨占是競爭的對立物，但是，牠們之間的對立，是相對的對立，第一、因為在資本主義之下，自由競爭付給獨占（即資本家對於生產手段上的獨占）以前提，第二、因為，自由競爭助長了資本的積集和集中，強化了獨占，同時也破壞了競爭，但是，不單祇是這樣，而且，牠之所以成爲相對的對立物，同時也因爲「獨占並不能夠阻止競爭的加強，再者，牠本身也發生了競爭，正如同輸入的禁止和高度的關稅，恰恰發生出走私的競爭一樣。」（馬恩全集。）強調了從資本主義的獨占勢力中所發生出來的變化底特別意義以後，我們決不要忘記了：獨占是「從資本主義發生，而且是存在於資本主義和商品生產，以及競爭等等的一般環境中的東西，同時獨占和這個一般的環境本身作着不斷的、連續的對立鬥爭。」（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第六章）這個由於伊里奇所提起的問題底正確性，可以由於以下的事實來證明，即，隨着那沒有加入到獨占結合中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相互間的競爭戰的存在，同時那些表現爲獨占支配的新競爭形態，也更加增大而且銳化了，例如，獨占內部（即加特兒，新迪克的內部）的鬥爭，生產代用商品的獨占者之間的鬥爭，獨占者和未加入獨占結合的企業之間

的鬥爭，爲着爭奪購買者的「銀錢」所發生的獨占者之間的鬥爭等等，都更加增大而且銳化了。

再者，甚至最流佈的結合獨占的內部（即，加特兒、新迪克的內部）的競爭，也沒有被消滅，而且，變化了自己的形態，而獲得了尖銳的性質（例如，「分潤」——即生產的分配——等等的鬥爭，）並且屢屢招來獨占的崩壞，這種競爭在不景氣和危機的時期，變得特別的尖銳，例如，在近代世界危機的打擊之下，歐洲大陸銅鐵加特兒于一九三〇年倒閉了，同時在一九三二年，世界銅鐵和硫黃加特兒也因爲牠而關門大吉。倘若，知道了獨占是從競爭，而且也是從那爲着利潤的狂暴的追求而發生，同時又是形成於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這個問題，那麼，這些現象的必然性是很容易瞭解的。獨占的協定，不外是表現爲獨占者間經濟勢力和關係的制定和形成，這種勢力關係的制定是形成於他們之間的頑固而長期的競爭的結果上的。企業發展的不規則性，不可避免地招來那從前所構成的勢力關係的變化，這種不規則性也相對地改變了某些獨占參加者底分配，即，利潤的分配，因此這些獨占參加者之間不能夠沒有競爭，同時這些的競爭在某種情形之下往往招來獨占的崩壞，在危機的時候，常常

所被發現的那些獨占的崩壞，不消說並沒有緩和這種資本獨占化的傾向，相對的，因為危機的結果，這些傾向更加地被強化了。而且最後，她創出了更加強化的資本組織來代替這些崩壞了的資本組織，這裏單單祇證明了資本主義獨占不但沒有被排除，而且還為那些結合於他們之中的資本家的尖銳鬥爭，創造了新的前提，這個同時也證明大部份的獨占（即新迪克，加特兒等等）是帶着極不安定的性質。

加之，如上面所說過的一樣，資本主義獨占本身的性質絕不能使生產成為完全社會化，因此為那些灰色的企業，即未加入獨占結合的企業的存在，創造了一定的前提條件，這時，往往不單是小的企業，連巨大的，甚至最大的企業也仍然還保存着灰色，因此，這使得他們能夠維持自由行動和自由競爭，同時使他們也能夠得到那些由獨占維持的很高價格的利益。這個招來獨占者和灰色的企業之間競爭戰的銳化，例如，在世界的銅業加特兒中，美國的理友伊生集團（即馬烟銅器公司和德尼斯銅器公司）正可以供獻於這個灰色企業的實例，除此以外，獨占價格的騰貴使資本家向某些部門的過早，或者，過遲的流入，也引起了這些部門中新的企業，以及新的灰色企業的形成，因此也使競爭戰成為更加銳化。于一九二八年，在

加拿大的銅器工業上，灰色企業的發生，即所謂風康布列茨銅鑄公司的形成，正可以用做這個例子。

這一切都使獨占資本組織間的競爭戰，帶上了特別尖銳的性質，若果，在國民經濟的某一部門的範圍中，有着二個或者二個以上的獨占結合，那麼在他們之間必然地演着鬥爭，勢力和抵抗，這種鬥爭的持續性和冷酷的程度，是和競爭着的組織的勢力成爲正比，但是，縱令某一個獨占結合，努力掌握了切或者大部份的生產的時候，這也並不意味着競爭的消滅，因爲在這個時候，競爭是被展開於接隣的生產獨占者間，例如，汽車分司和鐵道公司之間；電器公司和瓦斯工場結合之間等等，同時狂怒的競爭戰，也被展開於代用商品之間（即，滿足同一種消費的各種商品間，例如人造絲和木綿等等）。除此以外，在獨占支配的時期，更加發生了一種的新的競爭戰的形態——即爲着購買能力的分配，爲着爭奪使用者的「銀錢」而發生的各種部門間的獨占底鬥爭。各個獨占部門都非常地關心着顧客，對於某種滿足他們需要的東西支出自己財產的很大部份嗎？或者對其他的需要上支出很小的部份呢？結果各個部門都對一切的其他的許多部門（運用一切盡可能的廣告等等的方法）而行着鬥爭。

爲獨占結合一種形態的康平拿的發生，更加招來競爭的強化和更新。譬如那和煤炭獨占業相衝突的冶金企業，爲着和煤炭工業的獨占鬥爭，而開始建設了自己炭坑，在對方報復的手段上，這個煤炭的獨占者，也創設了自己的冶金企業，這樣便形成了許多相互對立於這種無情競爭戰中的，新的康平拿巨頭。例如，德國的化學托拉斯，爲要和那結合爲新迪克的加里康邨在合成肥料（這個合成肥料中包含着加里、窒素、磷酸鹽等）的市場上相鬥爭，刺激了這個康邨去組成自己的混合窒素生產的企業，而且也刺激這個化學托拉斯努力向各國加里工業侵入。這一切都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獨占和競爭是不能相互地排除，而祇形成了對立物的統一，從競爭而成長，而且和競爭有着難於克服的矛盾的獨占，其本身也發生了競爭。這個事實可以用卡爾在哲學的貧困上所說的話來解明；即「獨占產生了競爭，競爭產生了獨占。」

在資本主義獨占的影響之下，這種的競爭戰，由於改變了自己的形態而更加的強化，更加帶着破壞性。獨占者更加運用那對於自己敵對者的原料物質的剝奪的方法，對於他們同盟排斥的宣告，對於他們市場銷路的剝奪等等的方法，他們往往也並不躊躇去爆炸自己競爭

者的企業，炸藥乃成爲獨占者的經濟鬥爭手段，也成爲獨占者鬥爭的方法。因此「在我們的前面，已經不是小的企業和大的企業的競爭戰，同時也不是技術落後的企業，對於技術超越的企業底競爭戰，在我們的前面是那些不服從獨占，不服從獨占壓榨以及獨占專橫的人，被獨占者的絞殺。」（帝國主義論第一章）

生產社會化的巨大過程是發生於資本主義獨占的外殼之中的，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失望的辯護士，才能夠在這種原理上，作出了關於資本主義能夠沒有危機，有組織化地，以及有計劃地發展底結論。隨着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而且在這個生產社會化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基本的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和私的占有之間矛盾——遂成爲空前的尖銳化，而且正因爲這種尖銳化，乃強化了資本主義經濟無政府狀態。

第二章 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政治

第一節 銀行的新作用

銀行資本的集積和集中，以及銀行作用的變化，都是生產集積，以及從生產集積發生出來的獨占的直接產物。銀行資本的集積，是在工業集積的基礎上進行，而且也是在工業的直接影響之下而進行的。但是，另一方面，銀行的集積本身，引導向工業集積的強化和加速。

銀行的基本的，以及最重要的任務是付款上的媒介，「牠們表現為貨幣資本的債務者和實際的債權者之間的中間人。」（卡爾）

最後，在生產集積和記載的進展的過程中，銀行的地位遂本質地變化了。舊的銀行——中間者——現在乃變成一個有着許多分支的銀行，同時，這些的支行常常把自己的觸角，擴

張到一切能夠吸收財富的地方去；隨着銀行的規則任務的發展，不規則的任務，也隨着而發展了。銀行本身遂成為奉承於獨占的獨占企業，銀行之間的競爭戰同樣也達到更高的階段：到今日這種競爭，已經非常顯著地成為奉承獨占要求的競爭，而且另一方面這種競爭，也成爲達到了獨占階段上的巨人的競爭。

銀行的集積是在各種不同的形態上進行的。在今日，那些集中於少數銀行中（這少數銀行嚴密地擴佈了自己的支行網，藉牠來吸收那投入資本循環過程中的巨額，也吸收各階層民現存的開放的資金，）的資金驚人地增大了。由於某些銀行的強固，銀行的數目顯著地減少，隨而，發生了銀行的有範圍的集中——即，牠們向着少數中心的集中。大銀行的勢力的強化，招來了比較小的銀行對他們依存性的增大，也招來了前者對於後者的併吞和支配，同時也招來現存銀行的結合。這樣集積的隱蔽的形態，也隨着更加增大了：即如同那相互間的計算所（即交往關係的清算所）的發展，統制股票的占有，一個銀行的指導者的參與其他銀行的指導機關，「鏈鎖」制度等（即銀行之間在協定的基礎上利益之本質的制定等等）都隨着更加增大了。

某些銀行的勢力的增大使他們相互間的競爭更為殘酷。因為銀行經濟勢力的增大，以及銀行向大獨占者的轉化，隨着競爭的強化，在他們之間遂生出各種反覆的一時的協定，而他也形成了銀行間的聯合等等。若果，協定採取着較為長期的性質，那麼最後，這些協定便引導向新「集團」的形成和融合。「在集積過程的結果上，那些站在全資本主義經濟先頭的少數銀行間，必然，更加策謀和強化那獨占協定的形成，那銀行托拉斯的創造。」（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第二章）我們知道，「站在這些集團的先頭，而且為着特別大規模和有利底金融業務——例如國家公債等等的業務——而和五六個少數的其他銀行結了協定的這些銀行，已經從「媒介」的任務而成長，並且轉化為少數獨占主的聯盟。」（前揭出書第二章）

在一九一三年，十二家最大的倫敦的銀行，掌握了全英國存款銀行股份資本的百份之七〇，和全國存款的百份之七十一。到一九三二年，參加的已經不是十二個，而只是五個銀行（最大的五家），牠們掌握了全英國銀行股份資本的百份之八十四，和存款總額的百份之八十六·八。從一九一八年開始，英國發生了最重要的合併，這種合併招來了那以若干銀行（即最大的五個）為支配底近代制度的形成，而且這種融合在一九二八年一月由一個英國的第

六大的銀行（即馬汀斯銀行）的創立所完成。在德國，九個最大的柏林銀行，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中，還祇掌握着總存款的百份之四十七，到了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已經握有百份之四十九，到了一九三二年——僅僅祇有五個銀行——却握有全存款的百份之八十一（若果在各州的十八個國家銀行也加入計算最大的五個銀行以外，還要增加百份之六十六點三。）在一九二九年，發生了德意志銀行和迪斯康施·格沙斯查福的結合，在一九三二年發生了德勒斯單斯銀行對於客倫蘇塔斯銀行的吞併，以及商業銀行對於巴滅銀行的併吞。銀行事業的巨大集中過程，同樣也被發現於美國：百分之一的美國銀行（不消說是銀行的巨頭）管理着全國銀行總業務的四份之三。

資本的集積，以及銀行事業上的獨占，變化了銀行的作用，也變化了牠們和工業相互間的關係。生產的集積以及那由於生產集積所制約的銀行的集積，強化了銀行和工業的相互的依存性。生產的集積必然地引起資本向固定資本中投入的增大。資本有機構成的增大，使資本從一個部門向其他部門迅速的轉移更為困難，因此喚起了長期信用上的必需性的增大，銀行的集積，使這些信用底獲得成為可能。但是這些長期信用對銀行是危險的。同時，銀行的

資金長期固定於工業中，也同樣是危險的，因此這裏爲着補救以上的毛病，乃發生了企業股份的形態。因爲股票的可動性，因爲在任何的時候牠們（股票）都有向貨幣轉化的可能，所以銀行常常能夠成爲股份公司的股長，而管理這種事業，而且也能夠以更大保證來授給牠（股份企業——譯者註）以一時的借款和投資。這樣使銀行對於工業企業的業務生出了更長久的關切，而且刺激銀行努力地去制定對於他們的緊密的關聯。這樣從銀行的規則的業務中，從牠的中間人的機能中，在他們發展的一定時期上，遂發演出一種新的情形。由於自己的機能而應着工業企業的需要的銀行，「最先便能夠準確地知道某些資本家事業狀況，其次設法由於統制他們，運用擴張或縮小的方法，阻礙或促進信用放款等等方法去影響他們，最後，乃獲得了完全決定他們命運的可能性。」（前揭書第二章）

隨着銀行集積的增大，銀行爲債權者或者爲供給資金的機關所參加的這種企業的範圍也隨着擴大了，銀行和工業的嚴密關聯，使銀行本身遂開始執行了工業企業創立者的作用。在和創業者事務的緊密的關係上，銀行的紙幣發行事業也隨着而出發展了。紙幣的發行，對於銀行是極其有利的，而且牠也使銀行地位更加鞏固。有價證券的收買，也成爲銀行的事務之

一。股票的買占，對於銀行，比一切付款業務，是更加有利的，而且因為他們管理着很大資本，所以不單使他們能夠買占現存公司的股票，而且也使他們能夠創設新的企業，而且用牠，來強占創業利潤。這裏，如果工業的積集，和銀行的集積越強化，那麼這種為着利潤上的分配的鬥爭，也必越加尖銳。工業和銀行的集積也顯著地強化了銀行，和由銀行通融資金的工業間利益的結合，在這種場合，銀行往往利用自己的關係和信用的壓力，來造成了所謂「強制的加特兒化」。這裏遂發生了對於「銀行恐怖主義」的不滿。

銀行和工業的長期信用的關係的成長，以及銀行的紙幣發行和創業等事務的增大，造成了他們對於工業、商業、運輸業的深刻的關切，也創成了他們對於銀行的關切，這個也招來了「同業聯合」的形成。在這種幹部會議和監督會議席上的代表，便能夠決定企業和銀行的工作的全進路。

大部份的交易所的機能向銀行的轉移，是銀行的集積，以及銀行中的商品和基金業務的發展的直接產物。大銀行，努力地侵佔了交易所的各種機能。「……許多巨大銀行本身就成爲交易所……」（前揭書）

第二節 金融資本

因此，銀行的干涉本身便促進而且強化了這個由其自身的生產發展的傾向所制約的過程——換一句來說，即牠自身促進而且強化了集積和獨占形成過程。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以及融合，即金融資本的形成，是生產和銀行的集積的產物，而且也是工業和銀行獨占成長的產物。「生產的集積，以及從積集所發生出來的獨占，還有那銀行和工業的融合，都是金融資本發生的源泉，也是金融資本理解的內容。」（前揭書第二章）隨之，金融資本是從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融合所形成的，而且達到了獨占階段的資本的新形態。金融資本「是和獨占的工業聯盟的資本相結合的，少數最大的獨占銀行資本。」（伊里奇）因此，資本主義的獨占的性質，是金融資本最本質的特徵。

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相結合的具體形態，是有着極其多種多樣的。在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資本，為自己的更進的發展，創造了豐富的內部蓄積。在那裏資本是由於殖民地的榨取、商業利潤、以及運輸的收入等等的形態，而流入。上面所說的這一類國家在國內蓄積

着很大資本的國家。他們的銀行和工業的合併，是以複雜的和間接的形態為特徵。英國正可以用做這個例子。英國，在大戰前，合併是非常緩慢地，而且以間接的形態（例如通過「媒介人」或者「發起人」等等，即通過大量的媒介形態）而進行的。在大戰後，英國的融合才以率直的和直接的形態實行。

在那裏，大銀行和工業托拉斯，以及康鄧相結合的大聯盟演着重要的作用。根據一九三一年的統計，五間英國銀行的管理者，在工業、商業以及銀行的企業上，占有一千零七十一個指導地位。大托斯拉的所有主，本身就是大銀行的所有者。而且托拉斯也創立了自己的銀行。

反之，在那些「年青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牠們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已經達到了和其他國家同樣程度的階段，然而牠們缺乏着那樣工業化所要求的資本，因此牠們的融合多半是採取着急速的、直接的、明瞭的形態。

例如，在德國這種的結合，是特別強力的。在那裏合併的主導，多半是從銀行出發。因為這些國家很遲地才出現於資本主義的舞臺上，又因為其自身資本蓄積的限制性，而且更加

因為這些國家即刻出現那大資本所需要的重工業的發展，所以更強化了這種作為發起人和資本徵集者的銀行的作用。德國最大的銀行是一個典型的康鄰。維也納的克里迪彈脫里，在一九三一年，支配着全國工業的百份之七十到八十左右。兩個比利時銀行（即比利時大眾銀行和布魯塞爾銀行）支配着許多股份公司，這些股份公司占有全比利時股份公司總名義資本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相反的，美國，在他們發展的特殊條件的影響下（即封建要素的輕微性，和不充分性，以及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四分之一以前，絕對地還不存在和資本從英國的流入等等），所以爲這種發起人的，多半是工業和鐵路公司。例如，炸藥托拉斯條·鎊支配着許多銀行，魯克飛里集團，在最大的美國銀行（即，查伊斯國際銀行）中，保有非常大的勢力，牠（查伊斯銀行——譯者註）也和其他的美國銀行巨頭一樣，是一個管理着許多國營工業企業的大康鄰，同時，牠也是表現爲一個由各種參與制度所組成的，階梯式的金融從屬的構成。

參與制度在銀行和工業的最新的集積上，也在金融資本的形成上演着重大的作用。巨大的企業和銀行，不單單直接地吞併小的企業和銀行，而且屢屢使他們隸從於自己，並且也連

用那「參與」他們的股份資本的方法，運用股票的交換和買佔，以及借款制度等等的方法，來使牠們加入到自己的集團裏，或者康郵中來。假使某些巨大企業和銀行，事實上是能夠獲得而且侵佔那些對於其他企業的管理所必需底股票和債券，那麼在金融從屬鎖鏈的援助之下，對於這巨大的資本，對於結合着的一般的指導和支配就能夠獲得以少數自己的資本來實現自己支配的可能性（他們往往借助於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媒介下的各種參與制度）。因為在近代這種股票是非常分散的（例如在英國一股是一鎊以下，在美國是二十五元以下），而且，又因為非常容易去買佔和壓迫那些分散着的小股票的緣故，所以對於企業的支配，並不是一定要占有牠股票的絕對多數，往往這種支配，能夠實現於占有牠的全股份資本中統制股票的百份之二十五到三十五的條件上（例如：美國的摩爾根系的條・鎊，對於汽車托拉斯「即通用汽車公司」的支配，即是這個例子。）除了這些以外，銀行常常能夠從牠們所支配的錢款中，（例如交到銀行中的借款的擔保品）創造出無記名股票來和交易總所相對抗。

以這樣的方法形成企業的總體，形成了依存公司的各種制度，在這種制度的頂上，是站着那支配全康郵的母公司。金融資本在自己的運動上，同樣也支配着許多市營和國營的企

業，而且也變成土地的所有者，在商業方面也是如此。

在一個集團裏，結合着工業企業，銀行，保險和運輸等等的公司的大康寧的例子，首先要推美國的金融資本集團。美國的摩爾根集團在自己支配的範圍中，包含着如下的大托拉斯；即合衆國銅鐵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大眾電器公司，以及紐納加蘭銀行等等；牠在一九三〇年，支配了許多多的企業，這些企業保有三十億美金以上的財產。那個管理着美孚汽油托拉斯的魯克飛里集團的勢力範圍，在一九三〇年，被估價為十五億美金左右。魯克飛里集團（其自身的財產在一九三〇估價為八億五千萬美金，）在危機的幾年間，更擴大了自己的支配範圍，同時，因為摩爾根地位的衰頹，牠遂獲得了查伊斯國家銀行中的決定地位。美蘭，加里曼，孔列公司以及那些由金融詭計的「天才者」所指導的許多康寧，也都是美國的大集團之一。

這裏必需補充；即在農業經濟中金融資本發展的特殊性。金融資本之侵入農村經濟中，也在各種的形態上，以各種的方法來完成。金融資本運用自己在農村經濟中的獨占結合，以及信用制度的幫助，用肥料、農耕機械和其他等等的發明，以及合作制等度等的援助，更加

深刻地侵入了農村經濟中，而且把勞動着的農民也轉化為自己直接榨取的對象。一方面大土地的所有者、村落資本家以及地主等等，不斷地和銀行以及工業的上層者相結合，並且轉化為金融寡頭政治的構成部份。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的成千成萬的勞動着的農民，遂成為金融資本榨取的犧牲者。同時，資本主義獨占的支配，更創造了工業價格和農業價格之間巨大的剪刀形，而且更增大了工業和農業之間的不等價的交換。但是農民經濟的分散性，無組織性，以及分裂性，使金融資本，在農村中的壓榨，成為特別地困難。這一切都引導向工業和農業之間不規則發展的深化，也引導向農業比工業的絕望的落後，而且更招來農村中巨大的階級對立和衝突。

隨着那由於獨占更進一層發展所引來的金融資本的成長，使生產的社會性質，大大地增大了，同時使資本主義的敵對性質也隨之而增大了。

「生產手段的社會的分配，僅僅只從問題形式方面發生出來。但是，依照其自身的內容來說，這種生產手段的分配完全不是社會的，而是私有的，即和巨大的、首先是最大的獨占資本相應合的，同時，這種獨占資本不可避免地使大眾生活貧窮化，使農業的發展比工業發

展絕望地落後，在工業上使重工業比其他的工業部門特別發達」（伊里奇）資本的所有者和資本機能的分離，在金融資本支配的時期更加被強化了，資本的所有者和生產資本的使用的分離，貨幣資本和工業資本或者生產資本的分離，那些僅僅靠着資本主義的收入而生活的金融生活者，和企業家，以及一切直接參加資本管理的人的分離，是資本主義一般的特徵，帝國主義——或者金融資本底支配——是資本主義最高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之下，這種的分離達到了非常大的規模，金融資本較其他一切形態的優越性，是意味着金利生活者，以及金融寡頭政治佔着支配的地位，也意味着那些有着金融勢力的區區少數的國家比其餘一切國家的特出。」（帝國主義論）

在金融資本裏，赤裸裸地表現出大資本家對於社會生產物的獨佔，也表現出那達到了獨占階段的，資本主義寄生的本質。金融資本的壓榨，把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引向更高的境界。

第三節 金融寡頭政治

金融資本的支配，是意味着資本家集團和金融財閥的支配，而且，引向金融寡頭政治的形成。助長牠的最重要的事業，是參與制度。布爾喬亞以及社會法施斯的經濟學者們（如蘇里吹·格爲里吹、本蕭特音，以及格里芬汀等）贊揚股份公司的形態說牠能夠引向「資本的民主化」。事實上，股份的形態，強化了獨占者集團的權力，這種制度，不單強化了獨占者的權力，而且也幫助他們用多種多樣的方法來採集擴大的住民階層。在成熟了的資本主義國家，小股票非常流行。金融資本，依靠股份公司的援助，從極其小的經營者（這種小經營者往往連那最小的貯金也收集的）那裏，抽出他們的財產。勞働者和勤務者的參與，常常通行於美國的托拉斯中（例如美國鋼鐵托拉斯，通用汽車公司，哈味兒斯特兒等等。）在國際哈味兒斯特兒托拉斯的三萬五千的股份中，其勞働者和職工們的資本，就占有一萬三千股；但是他們向托拉斯股份資本中所參與的部份是非常微小的，而其餘的部份，完全是由於最大的資本貴族（即和摩爾根相合作的，馬克·摩爾克集團）所支配的。

事實上，勞働者的參與企業股份，祇等於他們將自己勞資的一部份，讓渡給家主去管理一樣，而且也使他們更加隸屬於資本。戰後的合作銀行，以及那些有勤務者基金的勞働同盟

的參與資本家的股份企業，都執行着這樣的任務。小經營者，遂成爲金融貴族手中的奴隸。

他們本身，減低了反對資本貴族的勢力。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的國際生梯銀行中，曾經發生了職員參與本行股份資本的事情，這種參與的方法，是由銀行把銀行的股票，當作薪金去支發給牠的職員，因此其後引起了股票價格的暴落，但是銀行仍然以從前的股票價格去支付薪金給他的職員。以上這個特別的事情，正可以用做參與制度的例子。大企業的主宰者，用各種方法來把企業的實際地位，從一切化外的企業中隱蔽起來。母公司的指導者們，並不保證形式上獨立的子公司的事業；但是，母公司能夠通過子公司而實行那些使他們的收支成爲「不透明」的一切必要方策（例如，利潤或者損害等等的隱蔽）而且以這些手段來使他們的企業成爲無統制性。這一切都非常強化了金融資本的勢力和實權。「集積在單一的手中，而實際上是被獨占所利用的金融資本，從公司的創立，從有價證券的發行業務，以及國家公債等等中，採集了巨額的，更加增大了的利潤，而且，由於牠來鞏固金融寡頭政治的支配，並使全世界都向獨占主交納貢物。」（帝國主義論第三章）

在恐慌、和不景氣的時候，金融資本集團和康寧，從廉價企業的買佔中（即從跌價的股

票的買收以及各種的「恢復」和「再組織」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這些非常有利的事業（即恢復和再組織等）本身，遂成爲金融資本以及金融寡頭政治支配鞏固的手段。股份資本的「拆散」以及對於土地的投機等等，同樣都使金融寡頭政治地位成爲強固的手段，也是巨額儲蓄的源泉。像那些由金融資本集團的援助而發行的國家的和國際的公債，在這種範圍內，都有非常大的意義。

但是，切不要把金融寡頭政治想像爲獨占者的有組織的以及永久不變的集團。因爲，資本主義發展的不規則性，在帝國主義之下，成爲非常尖銳化的緣故，同時也因爲資本集中過程，激烈地被強化了的結果，所以，一個金融資本集團由於削弱和驅逐其他集團的勢力，而使其自身的勢力強化，這樣不可避免地使某些金融資本集團勢力範圍和界限成爲特別不安定的可動性和脆弱性，但是，在牠們的動態上來分析某些集團勢力關係，那麼，無論從比重的評價，或者關聯的性質，以及矛盾的傾向和尖銳化等等的意義上來說，都予以各種不同的結果；即，金融資本集團間的衝突，以及在變化了的條件上的利益的矛盾，在變化了的勢力關係之下，常常會把合作、協定以及相互的關心，轉化爲公開的鬥爭和競爭。

尤其是，美國的大集團之間，非常明白地表現出金融寡頭政治支配，結合，利益衝突，以及那爲着獨占權力所達到的白熱化的鬥爭，激怒的競爭——即以經濟的突進而使競爭者破產和破滅的競爭——等等的複雜性和多面性。那爲着美國金融支配權所發生的摩爾根和羅克飛里間的鬥爭，是美國金融寡頭政治的內部利益矛盾發展上的一個極其顯明的事實。倘若，摩爾根由管理美國聯邦銅鐵公司而成爲美國銅鐵工業上的獨占者，在美國冶金工業上成爲從屬地位的魯克飛里，在一切鑄鐵工業方面就不得不體驗到摩爾根的壓力。反對的加入到魯克飛里集團的勢力範圍的美孚汽油托拉斯，在自己的市場的競爭者中，必然會碰見那個背後站着摩爾根和摩爾根同黨的金融勢力的大陸汽油公司的。因爲這些極其強力的團體間，在鋼鐵、石油、煤炭、鐵道公司等等的部門中的競爭，在很久以前，已經就帶着非常緊張的性質（雖然這種的競爭有時也在隱蔽的形態中），所以也更加尖銳地表露出他們之間，奪取美國的大銀行的鬥爭。各種鬥爭的基本的對象，是最大的紐約銀行（即，查伊斯銀行和生梯銀行）。

因爲世界經濟危機，以及摩爾根地位衰弱的緣故，魯克飛里集團，在一九三三年末，遂

努力地把摩爾根集團從國際查伊斯銀行中（這個銀行到今日完全由於魯克飛里的勢力所支配）驅逐出去了。某些集團的不規則的發展，以及由於這個不規則的性質所發生的他們之間鬥爭的尖銳化，很明白地表現於美倫拿集團的例子中。由於美倫拿集團勢力的強化而發生的美國銅鐵工業中勢力關係的變化，也造成了摩爾根集團和美倫拿間關係上的變化。除了銅鐵以外，美倫拿也在煤炭工業，石油以及化學企業上，占着極重要的地位，那差不多完全由美倫拿所支配的美國銅精工業，當然更不在話下，這樣，隨着美倫拿勢力範圍的成長，牠和美國其他金融集團的鬥爭的緊張程度，也必然隨着而增大了，例如，在最近幾年來，獨占了若干獨占公司的美國化學公司（即美國沙伊尼馬伊公司）也加入了美倫拿的集團，這個化學公司爲了自己勢力的擴張，而給美國化學康郵，尤其是給摩爾根系的條·鎊化學托拉斯不少的威脅。鬥爭和協定的交織同樣地也明白地表現於美國金融寡頭政治的實例上，從所引用的圖表中，我們明白地看到美孚石油集團和哥爾夫石油集團，（這個集團是由美倫拿所管理的）石油市場上競爭在，但是牠們相互間，同時也有着私人協定。同樣，和維斯訂格烏公司訂了輸出協定的，通用電氣公司，不僅僅在美國的市場上，而且也在世界的市場上，仍然是維新訂

格烏的一個極其強力的敵對者。然而，維斯訂格烏公司（即孔列集團，美倫拿，國家查伊斯銀行）中的複雜的利益的交織，這裏也值得提及的是金融寡頭政治中鬥爭的複雜性和多面性，很明白地表露於摩爾根集團和許多其他美國的金融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上。孔列銀行，因為曾經為着鐵道的爭奪，而和摩爾根的同黨作了自己歷史的鬥爭的緣故，而且又因為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牠曾經援助了合里曼集團的緣故，因此在過去曾經獲得了摩爾根敵人的稱號，就是在最近，牠也仍然還是激烈地和摩爾根相對抗的美國金融資本集團之一。在美國汽車市場上，迪倫和皮德集團是摩爾根的通用汽車公司（這個通用汽車公司後來又獲得了多爾志，巴拉熱爾斯兩個汽車公司）的競爭者，牠同時也是和摩爾根利益相衝突的一個特殊的實例。這個迪倫集團也在銀行券發行事業上，和摩爾根相對立。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的擴大的有名鬥爭，表現於魯克飛里系的美孚汽油和福特，同時化崩尼都斯梯化學托拉斯（這個企業是條·鎊托拉斯的強力的競爭者之一，而且也是共同參與通用汽車公司的基本的股東之一）上。在危機的影響之下，因為代用商品鬥爭，激烈地被強化了的緣故，所以使美國金融寡頭政治中矛盾的複雜的交叉線，更為紛亂。在美國的鋼鐵工業（安例康銅鑄公司，以及古

根格伊康邨) 和美倫那系的鋼精公司的獨占結合的鬥爭即是一個明白的例子，這種鬥爭，是因為這個鋼精公司努力以自己的生產品來代替各部門的鋼製品而發生的。

因此，我們知道獨占侵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全部經濟。獨占金融資本家的權威，以及那區區少數人的權威，和勢力，擴佈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若果這種過程越加深刻，那麼招來煩瑣和寄生主義的強化，招來這些矛盾的破裂的準備的金融資本獨占的內部矛盾，也必更加的銳化，而且問題並不單單只限於經濟的部門中，「當獨占」成立，而且支配着數百萬的資本的時候，不可避免地侵入離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其他事情而獨立的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帝國主義論第三十章)

第四節 金融寡頭政治和國家

「在新的經濟上，即，獨占資本主義上的政治的上層建築，是從民主政治向反動政治的轉移，自由競爭和民主政治相適應，獨占却和的反動政治相適應……。無論在對內政策，或對外政策上，帝國主義都努力廢棄到德謨克拉西的路，而努力走到政治的反動的道路。在這

種意義上，誰也不能否認帝國主義是一般的民主政治亦即整個的民主政治的廢棄。」（伊里奇）

帝國主義，是和國家政治制度形態的民主政治相矛盾的東西。但是這並不說：帝國主義在遂行金融資本政策上，不利用民主政治的政治形態。祇要金融寡頭政治支配還是採取着隱蔽的形態的時候，這種利用必定仍然存在的。但是不論在那一種政治形態之下，對於勞働階級的壓榨，或是對於殖民地的榨取，「交易所的權威，都被強化了。」（伊里奇）

「在全世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布爾喬亞使用二種手段來和勞働運動，和勞働政黨相鬥爭。第一個方法是暴壓，迫害，禁制，鎮壓。這已是中世紀壓迫農奴的方法。無論在那裏，都有選擇這種方法的布爾喬亞集團和階層存在着，但是選擇這種方法的，在進步的國家中比較少，而在落後的國家，則比較多。而且，當勞働者，爲着反對雇庸奴隸制而行着爭鬥的時候，尤其是危機的時候，這個方法使一切布爾喬亞聯合起來。歷史所給我們上述事件的實例，是英國的憲章運動，以及一八四九和一八七一年法國革命。布爾喬亞，反對勞働運動鬥爭的另一種手段，是對於勞働者的離間，對於他們組織的破壞，以及把他們誘入布爾喬亞

方面爲目的，普羅列塔里亞某一團體，某一大代表的收買，這種手段已經不是農奴時代的手段，而完全是布爾喬亞的，近代的，而且已經是和發展的文明資本主義制度相適應的，和民主制度相對應的手段了。」（伊里奇）

但是，帝國主義更變本加厲地採用第一種方法，即，對於勞工運動的直接鎮壓，以及對於勞動者羣的階級實際撲滅。「……在成長了的，堅強了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前面，充滿了恐怖的布爾喬亞的指導者，重新開始應用那落後的，死滅了的中世紀時代的方法了。行將死滅的布爾喬亞，爲着壓制那不安的雇佣奴隸，而和一切死滅了的，以及快將死滅的勢力相結合了。」（伊里奇）布爾喬亞的獨裁，在這些條件下，更轉變爲政治的壓迫和反動政治的強化，即轉變爲公開的和直接的獨裁。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獨占的布爾喬亞，以法西斯也來表現其獨裁的形態。（參看第九章）

使國家的機關努力去奉承那支配集團的利益，而且努力把金融寡頭政治代替民主政治的這兩個事實，是金融資本時期的性質所決定的，一般傾向。

國家，在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是「管理全布爾喬亞一切事業的委員會」，但是，在帝國

主義的階段中，牠乃成爲，奉承金融寡頭政治利益的東西。布爾喬亞支配形態的危機，即議會政治的危機，都和以上這些事實有着緊密的關聯。隨着金融寡頭政治的發生，那普羅列塔里亞意識和力量的增大演着重要的作用。勞動者羣以及牠們團結和意識的成長，他們在勤勞者間作爲指導勢力的成長，勤勞者間憲法思想的破滅，革命熱情的成熟等，破壞了議會制度存在的基礎，也絕滅了職工們對於他們的信用。社會集團矛盾的解決，屢屢轉到街頭（即轉化爲流血——譯者註。）同樣，布爾喬亞本身階級勢力的再建，也用反動政治來實行。布爾喬亞政黨，從那些依靠着獨占企業的人員中，從奉職於這些企業以及奉職於那些和自己的投資相關聯的企業的人員中，募集自己的基本幹部。政黨的特別的形態——即武裝隊伍——也隨着而出現了，國家的機關，乃成爲金融寡頭政治的工具，他們利用這種工具，來爭奪原料市場、販賣市場，而且也利用牠，爲世界分割和投資等等的鬥爭。議會轉化爲特別的機關，這些機關使立法適應於寡頭政治集團利益的東西，從前的權力的劃分（在從前的分配之下，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演着交互的有力的作用）代之以司法權的特別的強化，以及布爾喬亞階級支配的官僚和軍事機關作用的成長。

國家和種種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事業的關聯遂更為強化，國家的獨占制度以及國家的信用制度，也更加強力地和資本主義私的獨占相結合。這些傾向的發展，引導向金融寡頭政治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結合。國家，遂成為依從於他們利益的支配工具。「美國支配的中心，從華盛頓而轉移到華爾街去了」——（華爾街是集中着紐約金融「事業」的生活的地方）——

一個小布爾喬亞的美國上議員彼得格曾經的這樣寫過。在美國的各議院官吏當中，存在着下列金融寡頭政治最大的代表者，如梅隆、拉蒙等等。關於英國，德寧曾經如下地寫過：「帝國的政策，是由於少數的社會集團所決定，這些集團的會員是從政治的職務，向商業的職務交互地更動。」例如英國的財政部長，肯尼迪是最大的世界銀行——即米連銀行——的主腦部的代表，英國商業大臣，是英國金融寡頭政治的一個最大的代表，副總理大臣麥唐納是大火车製造工廠的所有者等等。）連資本主義最有經驗的辯護者維納孫巴特，也不得不確認：「金融資本支配了全世界，而且叫政治家們如同木偶一樣地跳舞着。」

這些發展，引導向國家的「統制」機能的成長和強化，我們已經知道，這些國家，都是由獨占布爾喬亞（即金融寡頭政治）的監察委員會所組成的，同時這些發展，也引導向獨占

的形成，這些獨占，由於國家權力的援助，努力地以大眾爲犧牲，來實現自己的巨大利益。國家把「計劃性」和「調整性」，努力地引入到資本主義的經濟中這一件事實，只表現出獨占布爾喬亞造成了對於全國大眾的掠奪，正和社會法西斯與機會主義的理論相反，這一切，都不能夠引向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化」，而反之牠正表現出資本主義敵對矛盾（即，危機和戰爭）以及牠們暴炸力的特別的成長。

隨着金融資本對於國家利用的增大，以及他們向經濟生活中的干涉，又因爲牠們和種種資本主義獨占關聯的鞏固，所以獨占資本本身的直接的組織，（例如各種企業家聯盟或者其他形態聯盟，集會和公司等等的組織）嚴密地實現了他們許多基本的經濟方策，同時他們爲着要守護寡頭政治集團的利益，爲着抑壓昂揚着的革命階級——即普羅列塔里亞——，乃組成了武裝的隊伍。但是，牠們和國家的結合過程是矛盾地而且是不規則地進行的。那些抹殺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的，以及把資本主義國家看爲並不是組成於階級上，而祇是在帝國主義的時期，才成爲金融寡頭政治代理人的錯亂的理論，會引向國家資本主義傾向的過重評價和誇張，引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機會主義的表現，他們無異是承認資本主義，能夠無危機地發展。

在這種的基礎上，社會法西斯蒂想要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國家資本主義，詐稱為社會主義。然而，我們知道向着國家資本主義去的傾向單單只強化了一切資本主義集團的地位，尖銳了他們之間為着爭取利用國家的鬥爭，也招來資本主義經濟無政府狀態，以及他們的敵對矛盾的強化。

社會法西斯的理論者，常常把國家經濟政策以及自治企業的成長，引證為資本主義胎內社會主義成熟的過程。他們想要將企圖者從崩潰和倒閉中救出獨佔的國家的政策，以及那些奉承這些目的的統制，表現為開花於近代資本主義溫和環境中的社會主義，但是實際上，這一切單單祇強化了，那對於勞働者以及數百萬所謂「未開化的」國民的榨取，這一切對於他們的無情的榨取，不單單祇為布爾喬亞的寡頭政治者創造了幸福的條件，而且也為社會改良派的合作運動者以及那些極其幸運的近代社會民主黨少數上層份子，創造了幸福的條件。

在國家機關以外，支配集團也把新聞、發明等等收集於自己的手中。「一方面，形成了某些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的大量金融資本，這些金融資本，組成了非常嚴密的擴大的關聯網（這個網不單支配着中等的資本家，而且也支配着最小的資本家和經營家，）另一方面，銳

化了和其他國家的金融集團的鬥爭，這些金融資本的形成和他們間鬥爭的尖銳化，都使一切有產的階級全面地轉移到帝國主義的方面去」。（帝國主義論第九章）

布爾喬亞的一切階層依從於金融資本以及金融寡頭政治的政策的軌道。金融寡頭政治的意識形態，乃成爲牠們的意識形態，而且也滲入了勞働階級的上層中。

勞働運動的官僚政治，乃使勞働組織的一部份成爲依從於金融寡頭政治底利益的一個皮帶。改良主義的指導者和金融資本的個人的關聯，或者金融的關聯，都招來了社會改良主義者的工會的上層份子和大資本底露骨的結合，獨占者的聯盟不僅僅從布爾喬亞議員中，而且也從市府的以及合作社運動的人員中，選出一切公務人員，而且這種聯盟也成爲社會見解的指導者，以及社會「精神的父親」。同時那些被收買的腐化的國家和市府機關，以及改良主義的勞働合作社的上層份子所組織的集會，也和牠們相結合了。

「資本主義的最新政治設施——新聞、雜誌、議會、聯盟、集會等等——爲那些勤勉、溫和、改造主義的，以及有愛國熱忱的職工，勞働者，創造了和他們的經濟特權和恩賜相適應的政治的特權和恩賜。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用各種安隱的和有利地位，例如內閣中的地

位，或者軍械工業委員會中，在議會以及各種的委員會中的位置，或者在「充實的」合法的雜誌的編輯，甚至也在那些更加「充實的」以及順從於布爾喬亞的勞動同盟的幹部的位置，來吸引而且贈送給布爾喬亞的勞動政黨的參加者或代表。

因此，我們知道了一切國家的政治，市政和經濟的機關，以及那些被收買的改良主義的工會上層份子，甚至於新聞和那些反叛大眾的意識形態等等見解，都成為金融寡頭政治的支配工具。這種支配，往往超出一個國家的範圍。

第五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金融資本，在社會民主政治理論家根前，成為完全錯誤的，和代牠辯護的論述。希爾芬汀，給金融資本的形成過程，以如下的特徵：他說：「大部份的工業資本，都不屬於那些應用這些資本的工業家。這些工業家僅僅在銀行的媒介下，獲得對於這資本的管理，這些銀行表現為資本的所有者和工業者的關聯。另一方面，銀行，把大部份資本，相應地緊束於工業中。這樣，銀行資本遂不斷地成長，而成為工業資本家。這樣的銀行資本，即在貨幣形態上

的資本以這樣的方法實際地轉化爲工業資本的，我稱此謂金融資本。」（希爾芬汀金融資本論。）在這個定義上，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化，和生產集中，以及從集中所成長的獨占，便成爲沒有關係。生產集積和銀行新作用之間的緊密關聯，在這個定義中並不存在。格里芬汀的定義，純粹是形式的敘述。他沒有說明，金融資本獨占的本質，單單祇抓住一個形式的特徵。他只停留在現象的表面，把問題歸結到怎樣去利用銀行資本上。合生和合併，在這裏單方面地被特徵了。金融資本所呈示出的寄生主義的成長，在這裏完全被格里芬汀所沫殺了。

因爲這個定義完全和那生產領域上的過程相分離，（而我們知道這種生產領域上的過程正是資本的支配向金融資本，並不是銀行資本支配過渡的根本原因），所以這個定義在金融資本的形成之下得出，銀行資本的不可避免地占指導的這樣錯誤的結論。銀行資本的指導，在這個關聯之下必然會得出如下的結論：即成爲支配要素的，不是生產，而是流通。這個論述，不消說絕不是偶然的。給了這個定義以後，希爾芬汀又說：「這裏正是黑格爾派所敘說的否定的否定；銀行資本是高利貸資本的否定，而其本身又被金融資本所否定了，金融資本，表現爲高利貸資本和銀行資本的綜合，而且在經濟發展的非常階段上，牠乃占領社會的

成果。」（前揭書）。由於我們所引的話，證明：金融資本——根據格里芬汀的意見——不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綜合。正如他說是高利貸資本和銀行資本的綜合。這裏希爾芬汀祕密地把銀行資本代替金融資本。

希爾芬汀拿銀行的支配，流通的優勢，無政府狀態向市場關係範圍中的移還，來開拓那走向「組織化的資本主義」去的道路，來敷設那走向資本主義生產上基本階級矛盾排除去的道路，來敷設那走向資本主義的宣傳和直接的不朽的辯護的道路。社會法西斯的另一個「支柱」K·藍勒，同樣也是從流通占首位的論述出發。藍勒和格里芬汀相同——或許更加露骨——把金融資本誤認為銀行資本，他想要引導出關於資本主義流通的社會化，能夠引伸到社會主義的結論。

非英·耶諾他耶夫斯基的理論，同樣也是替資本主義行辯護的理論，他努力想撲崩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外表上和形式上，非英·耶諾他耶夫斯基是反格里芬汀理論的。但是，實際上，他並沒有和格里芬汀理論的辯護的和機會主義的要素相搏鬥，而只是反對其少數正確的定義，而這些正確的定義，乃是格里芬汀拒絕把自己的進展引向社會法西斯去的一點。非

英在本質上，是努力在辯駁自己的金融資本的理解，辯駁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相融合的事實。

非英爲要造出否定伊里奇理解上的金融資本的根據，所以把金融資本和銀行資本一視同仁。根據非英的意見，則金融資本是「生產利子」的貨幣資本。非英祕密地把貸付資本來代替金融資本，他更引證馬克斯的工業資本的以及貨幣機能（即貨幣生產商業資本）以及其支配形態的——即生產資本——的學說。非英努力地制定這些形態間的關聯，但是無視牠們間的矛盾，他努力地給銀行和工業的相互關聯以純形式上的意義，然而他抹殺他們各各的獨占的本質。非英雖然強調資本的機能，從資本所有的分離，但是不希望去理解他們間的關聯。他採用機械主義的主張，僅僅看那對立物兩方面的外表的對立·貸付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對立，所有者和資本的對立等等，如果，根據他的理解，那麼，金融資本的形成和合生便會成爲不可能的東西。

非英想把融合的承認，來根絕生產占首位的試舉，但是，這是明白的失敗了。因爲合生，即金融資本的形成是生產發展以引向獨占的生產集積的產物。非英努力地使那個由他置

換的貸付金融資本，來和工業資本相對立。

然而，當某些銀行的，以及由這銀行所融資的企業的統制股票，都集中於一個資本家集團手中的時候，這種集團的資本，已經不是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牠成爲金融資本。英非也不希望去理解這種新的本質。非英和高茨基都反覆地論說工業資本的支配（高茨基也同樣說過），而且以牠來否定資本主義的頹廢和寄生性，以及頹廢的不可避免性。作爲資本的一種形態的金融資本，是新的範疇，是和工業或者銀行資本相區別的，完全的第三者。他的基本特徵，是這兩個資本形態的相互滲透和融合。而我們知道牠金融資本的形成正表現着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牠的寄生主義的成長，以及牠的頹廢。

但是，這是不適合非英以及牠的孟塞維克的意思的，因爲這是意味着資本主義進入了自己發展的最後階段，進入了自己沒落階段。關於資本主義「長生不老」的證明，關於牠的生產力，能夠更進一步「正規化」發展的證明，對於非英是必要的。非英的最主要意見，很明白地表現於他的著作中，在他的著作中，有以下幾句話：「列寧：帝國主義，根據其經濟本質來說，則是獨占的資本主義。這句話是正確的，但是所謂帝國主義是過熟的或者行將死亡」

的資本主義。這個不確實的表現，乃成爲許多「小的」錯誤的原因……獨占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更高的階段：在這個發展階段上，牠必然到達頂點，這個頂點之後就近于末日。但是問題是：他是否已經達到了頂點了呢？」（非英金融資本和生產資本）

非英以爲資本主義，就是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還未達到末日，他特別強調革命前俄國資本主義尚未成熟。社會法西斯以及他們的戰友非英堅強地主張：不單祇是先獨占的資本主義不造出社會主義轉變的準備，就是在金融資本的時代，也沒有造成這些準備。這裏，他們得出關於帝國主義進步作用的結論，得出了關於資本主義還未達到自己的頂點的結論，得到了關於資本主義仍然一點都沒有破綻的結論。

托羅茨基也在流通占首位的觀點之下，成爲全般社會法西斯的理論家。關於金融本的問題，托羅茨基如下寫過：「美國實際上，是從工業資本主義過渡到這個更加高度的銀行——高利貸形態的工業金融資本主義。」（托羅茨基）

他和非英等相似，同樣地把金融資本確定爲銀行資本，而這種銀行資本是和那盡着機能的生產資本相區別的。根據這種意見，則金融資本的支配是意味着銀行資本對工業資本的

支配，而且也意味着向高利貸資本的復原。

如果把托羅茨基的觀點拿來和格里芬汀以及非英相較，則托羅茨基的理論的確有牠的特點，獨占和金融資本的支配基礎和戰後時期相聯結。而且在這個問題上，托羅茨基的態度，和社會民主理論家的意見相同。

第二章 資本的輸出

資本輸出的作用和性質的變化，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徵。資本輸出在帝國主義時代，獲得了卓越的，和「特別重要的意義」（伊里奇）而且，牠由於擴大到極其大的規模，而成為一個特別特徵的現象。資本的輸出，在「國際的依存網和金融資本鏈鎖」的形成上，也演着重大的作用，而且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資本的輸出也存在於前帝國主義時代，而且牠常常是體味着把價值向國外的輸出，這種價值輸出的目的，不外是想在國外，創造出剩餘價值的有組織的榨取，前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輸出之間的差別，是由於那在資本主義獨占階段上而發生的資本主義構成的變化所制限，同時因為這個構成變化的結果，資本的輸出，遂獲得了超凌商品輸出的那樣重大的意義，而且轉化為金融資本家手中，用來榨取國外超額利潤的強力工具。

第一節 資本輸出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關於資本輸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這個問題，在說明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輸出的新作用上，具有本質的意義。資本輸出的可能性，由於以下這些原因所形成，換句話說，使資本輸出成為可能的，是因為許多落後的國家，也已經被吸收到世界資本主義的圈內，因為鐵路主要幹線的已經被建設或者正在建設中，又因為產業發展的主要條件已經被確立等等的緣故。

「資本輸出的必然性，是由於少數國家中資本主義的『過於成熟』，由於有利的投資（在農業的不發達和大眾的貧乏的條件下）成為不十分等等事實所造成。」（帝國主義論第四章）

若果，在前帝國主義時期，資本的輸出了是能夠存在的話，則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可能性向必然性的轉變，是由於那些從金融資本和獨占的支配所發生出來的，許多特殊的條件所制約。

高度的獨占價格，招來大眾購買力的限制，隨而，也招來內部市場容量的限制。而且，國民經濟中的獨占的支配，不可避免地招來農業比工業的「絕望的落後」，而且使農業價格

和工業價格之間的「剪刀形」的擴大，這正意味着都市和農村間不等價交換的強化，和農民大眾的貧乏。獨占的支配，限制了新的投資，因為獨占支配極端銳化了競爭戰，所以，使那些向某一部門的新的投資，不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而且往往帶着危險。尤其是，加特兒化的部門，由於使沒有加特兒化的企業和部門的利潤水準降低，而把沒有組織化的資本家的資本，「驅逐」到其他的國家去。這一切都使資本發生更大的「剩餘」的形成。所以，這些割餘的資本乃不得不向國外，去尋求更加有利的運用。「保護關稅主義」的成長，也同樣引出了這種的結果。資本主義獨占的結合，利用保護關稅，甚至於禁止關稅來作為把內部市場收奪於自己支配下的工具。資本主義的獨占，用提高國內市場的價格的方法，一方面，在這國內市場中，因為和世界市場上的外國獨占聯盟，作了勝利的戰爭的緣故，所以在內部得到了巨大的超額利潤，而且另一方面，把大量的超額利潤蓄積起來，這種的超額利潤，是結晶於巨額的「流動資本的形態上」。同時這種流動資本，都被拿來向國外輸出。

關稅的增大，同樣地為資本輸出，創造出必然的前提條件。尤其是，在那些發達的國家之中，把資本向那些有着高度關稅壁壘的國家輸出，在某種目的之下，特別有利，因為若果在

這些國家中開設某種企業，可以利用其嚴密地被保護着的國內市場的良好條件，來以很高的價格在這國家中，賣出自己所生產的生產物，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這種良好條件，向國外實行傾銷。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這個事實，非常地刺激歐洲的資本，尤其是英國的資本向採用高度關稅壁壘的美國流入。相反的，在近幾年來，因為英國提高關稅的緣故，向英國也流入了若干美國和德國的企業。

單單祇談到關於獨占資本主義下的資本輸出問題的時候，牠祇意味着直接的或間接的對於大量獨占超額利潤的榨取，因為，資本主義的獨占，的確，是絞取獨占的超額利潤。——但是獨占組織，對於這種超額利潤的追求，往往不是資本輸出的直接目的。若果把資本輸出，單單祇在這些觀點之下來考研，那麼，在牠許多豐富的，而且實際是存在着的，這些現象和關聯上，不免殘留着許多缺陷。例如，如我們所知道的，英國以借款的形態，向印度輸出資本，而牠的利息是比其他各國來得更加低廉。資本的輸出直接地也能夠追求軍事的和政治的目的（如同軍用道路、軍港、兵工廠等等的建築）。在這種場合，資本輸出雖然往往並不是直接以超額利潤的獲得為任務，但是在最後，牠的確達到了這種目的。

因此，資本在帝國主義時期，不一定祇是輸出爲着超利潤的即刻的或者直接的取得。在實際上，金融資本，利用那資本的輸出，來驅逐牠的競爭者，來侵佔牠國領土，來分割原料和販賣市場。這種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時期，一個國家對於某一國家的政治征服的最重要的工具。因此，我們知道，資本的輸出，應當不要把牠從帝國主義的經濟關聯，和基本矛盾而分離地去考察，而是應該把牠拿來和帝國主義一切其餘特徵的結合和關聯上去研討，最後，資本的輸出引向獨占超額利潤的獲得。但是，這種超額利潤的獲得，往往並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即通過對於競爭者的驅逐，對於原料源泉和販賣市場等等獨占地侵奪）被完成。

雖然，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的輸出獲得了優勢的意味，但是，無論如何，牠並不意味着商品輸出的縮小。資本的輸出，成爲激勵商品向國外輸出的手段。由於資本的輸出，遂侵佔了新的販賣市場。把一定量的商品，向着那個有資本輸入的國家而輸出的這一件事屢屢在借款的承認之下導直接地成爲可能。因此「資本向國外的輸出，乃成爲促進商品向國外輸出的一個手段。」（帝國主義論二四章）在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輸出，是資本主義獨占的一定的現象形態。但是「獨占無論什麼時候都伴隨着的獨占的基礎，這個基礎，即是利用那有利

的協定爲目的而發生的「關聯」，來代替市場上公開的競爭。舉一個極明顯的例子來說，即，如果借債者，在借款的時候，應把借款的一部份，來購買借款國的生產物，來作爲借款的條件。」戰後，以資本的輸出，來「強制」商品輸出的這個事實特別普遍地，而且特別廣大地被應用的一個現象。

隨着資本輸出的一般增大，資本主義商品的輸出也隨着增多，這個事實我們可以從以下的表記中看出。

年 代	世 界 的 單 位：三 億 品 流 通	年 代	四 個 最 大 的 外 投 資 的 規 模。 資 本 主 義 國 單 位：同 上
一八七二	二五、六	一八七二	一九、七
一八八〇	二九、四	一八八二	一三、八
一九〇二	四四、七	一九〇二	三九、九
一九二三	七四、〇	一九一四	七六、八
一九二九	一三一、二	一七二九	一〇、六

從這個表中我們可看到，資本輸出的增大，不僅僅（一般地來說）只伴隨着商品輸出的增大，而且，連商品輸出的速度，也隨着資本輸出的速度的增大，而被加速和強化了。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輸出的巨大成長，同樣地意味着國際信用和國際信用關聯的增大和成長。在借款的形態上，在世界市場的貨幣資本運動的形態上，同樣地增大了世界信用的關聯。資本輸出，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收支的平衡上，也有着重大的意義。

這樣，資本的輸出，在帝國主義時期，由於資本主義構成的一般的變化（即，由於資本主義獨占的支配，「資本主義的過熱」，資本「剩餘」的形成，不規則發展的強化等等）而成為金融資本家手中的一個強力的工具，他們利用這種工具，來為着原料的侵奪，為着販賣市場以及勢力範圍獨占地佔領，為着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再分割的鬥爭，而且利用牠來直接或間接地獲取巨大獨占超額利潤，因此資本輸出，也使競爭，發展的不規則性，以及資本主義的頹廢和寄生等等更進一步地強化了，而且也引向那不可避免的武裝衝突和破局。

把資本向外輸出的規模列圖如下：

年 代	英 國	德 國	法 國	美 國	四 國 合 總 計
一八六二	三、六	—	—	—	—
一八七二	一六〇	—	—	—	—
一八八九	—	—	—	—	—
一九〇〇	二六〇	—	—	—	—

一八八二	二三、〇	—	一五(一八八〇)	—	三七、〇
一九〇二	六二、〇	一二、五	三二	—	一〇六、五
一九一四	八五、〇	四四、〇	六〇	—	二〇五、〇
一九二九	〇五、〇	—	五五	一二五	二八五、〇

*註：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二九年以後輸出資本開始特別地增大

從以上所引用的表中，我們知道，從一八六二年到一九〇二的這個時期中（即在二十世紀以前）這個時期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由於獨占資本主義所代替的時期，所以資本的輸出，是比較不顯着。另一方面，從所引用的表中，同樣也表示出，「資本輸出的驚人發展，僅僅是在二十世紀的開頭」。（帝國主義論第四章）換句話說，資本的輸出，是等到獨占資本主義的支配，已經在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確定的時候，才開始驚人的發展。

第二節 資本輸出和寄生性

資本的輸出對於輸出資本的國家，有以下兩個意義，即一方面，牠帶來了超額利潤，

助長了某一個國家的勢力和財富的增進，另一方面，牠也意味着利子階層的增大，居民中寄生階層的成長，以及牠們向金利國家的轉化，亦即寄生主義和頹廢的成長。——「資本輸出，常常使那些輸出資本的國家，得到了絞取某種「利益」的可能性，這種性質，正闡明了金融資本和獨占時代的特徵。但是，隨着「這種輸出，也招來了輸出國，發展若干的停滯。」（依里奇）在別的地方，依里奇又寫着「資本的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個主要的經濟基礎，牠強化了利子階層和再生產的完全脫離這種情形，而且替那些靠着若干海外國家的勞働榨取，而生活的國家，打上了寄生主義的印章。」（帝國主義論第八章）——這個二重性質，也帶來資本向某一國家的輸入，一方面牠助長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消說，資本的輸入國的生產力常常是單方面的，和一時的，不完全的發展。而且另一方面，因為資本輸出，使牠們更加隸屬於資本輸出的國家，而且強制他們去實行某種權利的「讓渡」，（例如對於商品的輸入和販賣的「讓渡」，對於國家法律上的「讓渡」等等），因此不可避免地使牠們成為這些國家的奴隸。一切這些「讓渡」，不可避免地使某一個國家從屬於另一國家，帝國主義國家底金融資本，阻礙了這些國家生產力的更進的發展，他們維持而且鞏固那些存在於這些落後國家

中的，前資本主義的榨取關係，而且由於無慈悲的榨取使牠們陷於貧窮，並且也阻礙了那些殖民地國家中，足以和輸入資本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相競爭的工業部門的發展，這也可以說是民主的「超殖民地」理論的率直的揭穿。當資本向那些已經發達的獨立國家而輸入的時候，同樣也使前者更加依存於輸出資本的國家。

在有利的投資之下，在對於某一國家的某種生產部門獨占地占領之下，輸出業者，不單單祇在這一個國家中，而且也在全世界的經濟中，獲得了獨占地位的利益。若果向某一國家所輸出的資本成功去把一切有利的輸出企業，豐富的土地，原料的源泉和耕地等，都收集到自己的手中，那麼，牠在世界的市場中，也同樣地要獲得超額利潤。

以下這個事實，是證明資本輸出的寄生性的一個明白的事實，即資本向國外的輸出，經過了相當的時期以後，輸出資本的國家，從以前所輸出的資本中得到的收入，要超凌如今的所輸出資本。這個，第一，是意味着這些國家往往並不輸出新的資本，而祇是輸出那些所絞取來的超額利潤的部份。第二，是意味着這些的國家，從資本被輸入的國家中，吸收了大量增補的原料和必需品。依照H，K，哥布孫的統計，英國從外國的投資中，所得到的收入在

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九年期間內，超過了她的新投資約一百二十九億零六百萬英鎊之多。資本大部份爲不生產資本而輸出，即，爲不生產的目的而被利用的國家公債的形態上，或者商業利潤等等的形態上的資本而輸出。

資本輸出，對於帝國主義者是有利的，所以，牠使那些爲着投資的新的範圍的鬥爭，更加採取尖銳的性質。這些金融的集團，常常和牠們在世界市場所代表的國家的政府，結着緊密的關聯，並且牠們常常被這些國家所給與的援助所保證。銀行和康郵間的競爭，這裏乃轉化爲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因此，資本輸出，是和資本輸入國的許多特權的獲得相關聯，而且獲得了這樣的意義：即「金融資本（更精密說）在世界上一切國家中擴張了自己的網。」輸出資本的國家，不僅僅在落後的和不發展的國家中，強化了自己的權力，而且也在最強力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設立了自己堅固的巢窟。」（伊里奇）因此，爲着投資範圍的鬥爭，爲着這個國家中的「勢力」強化的鬥爭，爲着把資本向其他地方輸出，和投資的保護政策等等的鬥爭，不可避免地招來了新的狂熱的武器鬥爭，招來不可避免的武器的衝突。

第三節 反伊里奇的資本輸出論

奇爾芬汀給資本輸出的本質，以如下的定義，他說：「我們把資本輸出理解為價值的輸出，而這價值是拿到國外去生產剩餘價值的。但是本質上，剩餘價值仍然是屬於土著資本的管理。假如，德國的資本家，把自己的資本移注到加拿大去，而且在那裏生產，並且已經不能夠返還本國的話，那麼，這對於德國資本是損失的。這並不是資本的輸出，而是資本的移注。」（希爾芬汀：金融資本論）

在這個概念上，希爾芬汀無視那前帝國主義時代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輸出之間的差別。換句話來說：希爾芬汀不理解這個潛伏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輸出背後的本質。因此，難怪希爾芬汀不把資本輸出和那爲着超額利潤獨占的鬥爭相結合，和發展的不規則性相結合起來，希爾芬汀，使資本輸出形態，成爲單純化，他單單把資本輸出，在生產資本形態上來敘述，而且最後他否定那由資本輸出所發生的寄生性和頹廢。關於資本輸出的特徵的問題上，希爾芬汀說：「因此，我們知道，資本輸出使那由於新市場的消費能力所決定的範

圍，增大了。但是，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和運輸的方法，向其他國家轉移的這個事實，使經濟能夠加速地發展，而且因為自然經濟的頹廢，乃引向擴大的內部市場的發生，也引向市場上生產的擴大，隨着，也使那些能夠輸入的資本，來支配付新的利子……。資本的輸出，幫助其他國家的開發，而且大規模地發展了牠們的生產力。」（前揭書）希爾芬汀創出了超殖民主的理論，他單單看到資本輸出的「有利的」影響。

除了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輸出理論以外，盧森堡也同樣，歪曲地敘述了這個問題。如我們所知道，盧森堡以為蓄積在純資本主義環境中，是不能現實的。他以為資本輸出，在「第三者」的不存在之下，也是不能夠實現的，在他自己的反批評論文中，她說「假使，資本主義生產，為自己形成了充分的市場，而且能夠以自己所蓄積的剩餘價值來擴張，那麼，近代發展的其他現象就會成為迷混：即追求最遠的販賣市場的猛烈，以及資本輸出——這些都是近代帝國主義的最明白的表象，就會成為迷混了（資本蓄積論）。換句說：假使剩餘價值，以純資本主義中的蓄積、能夠現實的話，那麼就不能說明在帝國主義時代的輸出。不消說，盧森堡的現實的理論，是不正確的，資本輸出的理論，同樣也被大大地歪曲了。盧森堡的資本

輸出的意見，完全抹殺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輸出之間的差別。盧森堡以爲帝國主義是歷史以外的範籌，因爲根據他的見解，則資本主義的蓄積，以及那獲取國外市場的追求，已經存在於一百五十年以前了。

從這個敘述中，我們明白看到：盧森堡所給與資本輸出的定義有以下這些缺點，第一、牠把資本輸出看爲非歷史的東西，第二、她否定資本主義發展上的獨占階級，第三、她不理解，即由那於資本輸出所發生的寄生性和頹廢。希爾芬汀或者盧森堡的理論是資本輸出的不正確的敘述。機會主義者，在自己資本輸出的敘述上，聰明地把這二個理論相結合起來。

第四章 資本家團體間的世界分割

第一節 國際獨占底作用

在世界的舞台上，那些最大的國家的獨占的出現，以及國際資本家結合的形成，都是生產集積的高度水準所附給牠的條件。生產的驚人的擴大，招來了那些偌大的工業巨頭的形成，這些工業巨頭，由於自己的擴大，而獲得了國際的重要性。例如，在迭特羅地方的美國福特汽車工廠，牠每年能夠生產出三四百萬架以上的機器，還有那在最近陷于破產的捷克斯拉夫的資本家拔佳的製鞋工廠，其每年能夠生產出三億——四億雙鞋子。當某些國家中最大資本主義的獨占資本，達到了這樣大的規模的時候，他們爲着有利使用的衝擊，乃不斷地要求國外的出路，這樣大規模的獨占組織（例如，管理着三十萬美元以上的資本的摩爾根財團）由於自己資本規模的擴大而獲得了國際的意味。國際獨占的形成，必然是從資本主義獨

占的內部性質發生出來的，而且這種獨占的最根深蒂固的性質，是建築在不能滿足的努力上。內部市場的支配，並不能夠滿足獨占的要求。若果，內部市場的獨占化的過程，越加深刻，若果同時一個國家中許多獨占結合間的競爭戰越加尖銳，那麼，獨占向着國際舞臺上的出現的要求，也必越加迫切。向着那本國市場的獨占化的努力，激動了資本家去占有外國的原料源泉和販賣市場，因為沒有了這些的東西，他們就不能夠維持國家內部的堅牢的獨占。例如，因為要努力地去維持內部獨占，所以引起法德加里新迪克的形成，福特為着支配美國的汽車市場的鬥爭，刺戟他去在巴西地方創造了橡皮耕地。

生產集積和獨占形成的一般過程，在其本身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引起分割世界的，國際獨占結合的形成。最初的國際獨占，已經發生於十九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間（例如加里鉀協定、硼砂加特兒、鐵軌加特兒、銅製品新迪克等等）。但是在二十世紀以前，國際結合的一般數量，大概還沒有超過四十個。國際獨占擴大的發展時期，是隨着帝國主義時期而開始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間。國際獨占數量的增大，由於國內獨占的發展所制約，由於金融資本的成長，由於那些為着販賣市場和原料源泉而發生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也由於資本輸出以

及表現於這種基礎上的世界經濟關聯制度的擴佈等等所制約。結果，到了帝國主義戰爭時候，國際獨占的數量，達到了一百一十四個，而在最近幾年來，竟達到了二百五十五個之多。

帝國主義發展的一般進路，不單單增大了那些分割世界的資本家聯盟的數量，而且也使國際獨占形態更形進展。這種進展的一般路程如下：即第一、這種的結合成爲無限量地擴大其範圍，而且轉化爲世界經濟的決定力；第二、生產企業國際的一般結合，更加成長爲複雜的金融資本主義的結合，也增大而且成爲巨大的國際康郵，這樣的康郵以金融依存網，來束縛着各種各樣的企業。在那些大勢力的近代國際獨占中，大部份並不完全保有資本家的契約聯盟的形態，也不保有各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組織的形態。他們用隱蔽的結合和依存制度，也用那些對於形式上獨立的企業的各種影響，用複雜的和突然的金融變動，用他們和各個國家的國家機關的特別依存關係等等的方法，來實現獨占的支配。維克爾斯——安斯脫蘭格康郵正好供結國際獨占康郵例子。維克爾斯軍事工業是和安斯脫蘭格企業相結合的，而且也和其牠英屬波斯的石油公司有着關聯。英帝國的政府，向來極其親密的參與維克爾斯資本，而且

這個軍事工業，也和國際的石油獨占波伊耶—德茨—沙爾，同時也和法國的蘇勒德康郵有着緊密的關聯，而且事實上，牠也支配着捷克斯拉夫和波斯意大利等地方的許多企業。

國際獨占，對資本主義現實的一切方面，畫上了或多或少的痕跡。這種國際的獨占，成爲國際關聯——即外部的商業以及資本輸出等等的基本的擔負者。最後，他們開始表現爲世界分割的主動者。（參看第一頁插圖）當全世界生產的重要部份，都被少數最大資本主義組織所獨占時候，這些少數的組織，遂開始實現相互間的世界直接分割。例如二個基本的集團（即美國資本的美孚汽油國際獨占，以及那和英波石油公司有着密切關聯的英荷蘭殼牌獨占波伊耶—德茨—沙爾，支配着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石油工業。美國的條·磅康郵（這個康郵支配着炸藥的生產、電影膠片、以及一部的人造絲，和橡膠工業等等）以及那活躍於英國範圍以外——即奧大利，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日本，中國，南美等等地方——的英國的帝國化學公司，還有那在外國，也有着自己的企業的德國最大的康郵伊·格·發爾濱印斯德電器企業等等，分割了全世界的化學工業。

世界的經濟，更加地被那些最大國際獨占的勢力範圍所分割了。最大資本財閥相互間的

勢力關係，是橫臥於這種獨占支配範圍的設定的基礎上，而且這種獨占範圍的設定，屢屢是以特別的國際獨占契約，或者協定，來鞏固的。國際獨占的發展過程，以及由於他們所實現的世界分割的發展過程的帶來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矛盾的特別的銳化。

國際獨占的增大，必然地使得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戰，更為尖銳化，相關聯，國際間的競爭自然也增大國內本身的競爭；例如，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為着美國的支配的競爭，使雙方的競爭者，都努力到國外去開設許多的企業。福特，在英國、加拿大、德國，此外也在亞歷山大、亞姆斯特丹、巴塞羅納、倍諾斯亞勒、哥本哈根、鹿特丹等地方，開設了自己的企業。通用汽車公司在澳洲、倫敦、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亞姆斯特丹、柏林等地方也有着牠自己的企業，而且也使歐洲許多汽車公司都隸屬於牠。國際間的競爭，更加被擴大於國際獨占的成長的基礎上，而且使這種國際的獨占的鬥爭，採取各種新的形態；即：1 國際獨占和獨立的資本家，以及小生產者的鬥爭；2 國際的獨占和某些國家中國家獨占組織的鬥爭；3 國際獨占本身之間的競爭；4 國際獨占內部的競爭等等。國際獨占的崩潰的許多事實（例如最近以來所發生的國際亞鉛加特兒、木材新迪克、國際鋼條加特兒、大陸銅鐵加特兒

兒、火柴康郎、伊格爾康郎、車輛加特兒等等的崩倒）證明了那些圍繞着世界資本家聯盟而行的競爭，是達到了怎樣緊張的程度。資本家聯盟，對於世界行着世分割這一事實，使競爭戰更為冷酷，而且更為尖銳。

電器工業，是一個非常集中的部門，牠可以成為那巨大集團和托拉斯為着世界市場支配所發生的鬥爭的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些結合間的競爭，一方面是，進行在電流的部門中（美國的通用電汽公司和西屋，英國的通用電汽公司以及聯合電汽公司，德國的阿—伊—格和西門子、蘇格爾等等都是屬於這一部門的），另一方面，緊張的競爭，也存在於弱電流的工業中，在這個部門中，德國的西門子，和摩爾根系的托拉斯（即，摩爾根系的國際電話和電報公司）是表現這一部門中的重要的敵對者。（請參看圖表）

在海洋航業部門上的國際的結合，無論在舊的或者已經發展的數目中，都能發現牠的例子。航業獨占的基礎，開始於一八七八年，當時由德國船業者的發起，而造成了船業者的最初核計會議。在大戰前，全世界就已經滿佈了汽船航路的會議網。根據英國政府委員會的統計，在一九〇九年，共計有七十五個的汽船代表會議。所謂這種會議者，乃是以獲得運輸

部門上的獨占地位爲目的，而綿結的船主商會間各種的協定；即如關於貨物和工作分配的協定，關於共同出發表的協定，以及關於同等運價的確定的協定，或收入的分配等等的協定。這種航業代表會議，一時曾爲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壞，但是現在已經完全恢復。近來，在海洋航業的部門中，差不多百份之百的船隻，已經加入了這些代表會議中。

這種海洋運輸上的獨占結合的支配，也可以用資本的強力的集中來說明。例如，依照一九三一年的統計，二億零三百萬噸的海洋船舶（即百份之二十九·一）是屬於五千五百七十四個小船主，同時二億九千七百萬噸（即百份之四十二·三）是屬於一百二十個大航海公司，而且其餘的部份是從屬於四百七十八個中等的船主。海洋航路代表會不單單在代表會自身的內部實行着鬥爭，而且也對於那些灰色的航業（即來參加托辣斯者），甚至於也對於那些僅僅爲着供給海洋船隻的需要，而到處尋求工作的不定的（即漂泊的）航業，也行着冷酷的競爭。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情勢之下，牠招來若干代表會議的瓦解（例如在一九二二年，從歐洲到南美的航業代表會的解散），也招來牠們地位的不安定，和這些最大康鄧的破產，例如有名的英國的勞耶美日的破產，這個集團，在自己的手中，結合着將近二百五十萬噸的船

隻，並且努力地想創造航業者的新的，和用人工來鼓勵的，更加強力的結合。

國際獨占，爲着世界分割的鬥爭，更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結着密切的關係。國際獨占，以自己的存在勢力，表現於布爾喬亞政府的一切政策上。當牠努力地爭奪世界的指導權的時候，遂擴大地利用國家機關的援助，國際獨占爲拉丁美洲的鬥爭這是完全依賴美國以及英國的政府機關，而且也依賴那些順從於美國和英國的資本家慾望的中南美的國家——即墨西哥、委內瑞拉、玻利維亞、阿根廷、巴拉圭等等國家的政府的上層者。從美國資本家慾望而出發的墨西哥政府適應着國際獨占對於硝石需要。從順地執行了美國銀行的慾望的烏拉圭政府適應着國際的獨占結合對於郴子的需要。反映英國資本利益的智利政府擔心着那些智利的硝石對於國際所獨占。國際獨占的一切巨大的方策，是採取某一政府的公開的或者半公開的表現形態的趨勢。獨占者的鬥爭，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鬥爭，密切的相吻合，在大戰以後，資本家的國際聯合的事業，得到了國際聯盟方面的極其勞心的援助。

國際獨占爲着世界分割底鬥爭，是帝國主義的驕武主義的最重大的動因。戰爭和武裝侵略的方法在牠們爲着販賣市場，原料源泉，投資範圍底鬥爭上，擴大地被資本家聯盟所利

用。隨之，這些「國際的，和結合了的資本，在軍事和武裝上，造成了壯麗的事業。」（伊里奇）國際動力加特兒，國際B沙合落康郵和其他獨占，對於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發展上曾表現出不少的力量。近代帝國主義衝突，和許多國際獨占的事業（例如直接支配着軍事和化學等的工業的國際獨占）都有着緊密的關聯。國際的獨占對於世界的分割，一方面，造成了帝國主義者間矛盾的銳化以及軍國主義的成長，也成為帝國主義戰爭發生的重要的原因，同時，另一方面牠也成為加強階級鬥爭的要素。任何一個國際的獨占，不單單祇企圖去反對其他資本家或競爭者，而且，首先，要反對勞働階級以及牠的革命的戰爭。任何國際獨占，都直接或間接地追求那階級鬥爭時資本家結合的目的。國際資本家的結合，往往直接地履行了「雇主聯盟」的機能。就是當國際獨占，沒有直接地去豫期這些機能的履行的時候，他們「……也成為資本家的工具，而且利用這種工具，來降低國際勞働階級的生活水準，而且以牠來使他們的地位惡化。」因此，普羅列塔里亞和國際獨占資本的壓榨相鬥爭，是一切勞働階級革命的必需要素。

第二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國際獨占的作用和實際的性質，被社會法西斯的理論家歪曲了。社會法西斯，是替近代獨占資本主義辯護的，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了，國際獨占的作用。國際資本家集團，在法西斯的論述上，被表示為國際資本主義組織化的基礎，被表示為各個國家的利益調停重要因素，是全世界經濟和平合作的美滿前提。

希爾芬汀，于一九〇九年在他的金融資本論中，就已經說出關於在經濟上能夠形成一個統一的世界托拉斯——這個托拉斯，是國際獨占發展過程的自然的成就——的意見。他說：這樣的國際托拉斯，將會排除生產無政府狀態、競爭、危機、和戰爭，而且也將會消除世界資本家階級內部一切的對立，僅僅保存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里亞之間的矛盾，但是，這個矛盾，也會成為無量地減少其緊張程度，因為，布爾喬亞的關係，消除生產方發展和利害關係的衝突。

在帝國主義大戰的當時，這種統一的世界托拉斯的理論，以特別形態，被考茨基所展開

了。他從自己的想像出發，得到了所謂超帝國主義論。他以為，近代帝國主義政策，能夠被這個新的超帝國主義的政策所驅逐，這種政策是在和平的，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平和的採取上，由於那結合為國際獨占的金融資本所組成的。因此，根據他的見解，則國際獨占，是國際間牢固平和基礎，牠排除了競爭，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在近代社會法西斯的文壇上，這種辯護的論述，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考茨基，在小冊子（Wehrfrage and Socialismus）上，他以為在那使國際獨占成為更進一步發展的戰後資本主義中，衝突僅僅能夠偶然地發生，而戰爭的危險，是無量地減少了。希爾芬汀在德國社會民生黨的基爾會議，以及第二國際的馬賽會議中的報告裏，展開了在國際獨占基礎上形成了全世界組織經濟的理論。另外一些社會法西斯理論家，丙蘇托克、迪克爾、斯諾伍登等等都和希爾芬汀相應。和第二國際布魯塞爾會議的議決，都是在這些概念的精神上被創成的。近代的危機，非常明白地表現出，「一切關於組織化的的世界經濟」的論述，都是和事實相反的，是毫無根據的，同時這個危機，強迫社會法西斯承認若干事實，但是，他仍不放棄那關於國際獨占問題的一般論述，而且在這些國家獨占中，去尋求那克服危機的最主要の方。

法，即創造世界「組織化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方法。我們在考察了資本家集團對於世界分割所發生的矛盾之後，可以知道社會法西斯所敘述的問題，是完全和事實相反的。同時表現出，國際獨占絕不能引向世界超「帝國主義」，而祇引向帝國主義矛盾的銳化。國際獨占，加強了生產的混亂，銳化了競爭，強化了危機，擴大了資本和勞動階級的對立，也擴大了帝國主義本身營壘內部的對立。

各個國際獨占和一個獨占的各個不同部門間發展的不平衡法則，是帝國主義發展突變性與不平衡性的要素，同時，這個不平衡性引向勢力關係的變化，因此，招來最尖銳的矛盾和絕不能被排除的衝突，牠更加明白地表示出：國際獨占，對於世界的分割是實行於最大的帝國主義家間所訂立的世界領土的分割的條件上。資本家集團，在他們爲着世界經濟分割的鬥爭上的作用，在這種關聯上，乃成爲那爲着世界領土分割的鬥爭的一環。獨佔集團爲着經濟分割的鬥爭，轉化爲領土再分割的鬥爭。「從各個國際資本向一個國際總體的編合和結合的這個事實，帶來了經濟破壞的傾向，因此這個事實消滅了善良的小市民關於階級矛盾消滅的希望，而這種階級矛盾實際是被銳化了。」（伊里奇）

國際獨占是遙遠地超出一個國家範圍的世界生產和資本集積的表現，牠銳化了帝國主義固有的矛盾——即世界生產力和阻止了他的發展的國境的防禦間的矛盾。如果在國際獨占形態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越是發展，則想要以新的領土侵奪的方法，以世界再分割的方法來克服國家境界的防禦的企圖，就必成為更加不可避免和增大。因此，我們知道，構成資本家集團在世界經濟分割過程上的關係，必然地和那形成列強間的世界領土分割的基礎上的關係相結合。

第五章 大列強間對於世界的分割

第一節 世界領土的分割和殖民地

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過渡，這個時期中所發生的爲着殖民地掠奪大戰爭的結果，全世界乃被少數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分割了。英國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間把自己殖民領土，從二億九千萬基羅方里，增加到十四億八千二百萬的基羅方里，法國從七千八百萬基羅方里，增加到一億一千萬基羅方里，荷蘭從五千六百萬，增加到二億五百萬。在帝國主義最後形成的瞬間，強國間的世界分割，所發生的鬥爭更加在於新的特殊形態上被展開——即以資本主義新階段爲特色的 new form，即資本主義獨占爲着世界的重新分割（即再分割）占所發生鬥爭的形態，亦即和分割相關聯的世界領土的再分割的形態。

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希爾芬汀歪曲了這個最重要的事實，牠把帝國主義時代所發生的爲着世界分割的鬥爭，祕密地稱之爲所謂「爲着經濟領土的鬥爭」。「爲着經濟領土的鬥爭」無論什麼時候都存在的；牠不僅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的全階段，而且也存在於古代和封建的生產方法的條件中。因此，在曾經被伊里奇所指摘出的希爾芬汀的態度，混合了這些時代間的質的不同，而且抹煞了帝國主義階段中的世界分割的事實。

殖民地的獨占的占領，是構成於帝國主義強國間，對於世界領土分割的基礎上。帝國主義國家，侵奪一定的殖民領土，而獨占地利用牠來爲自己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目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是和資本主義發展以先的階段的殖民地政策有着區別的，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政策是直接地由於近代資本主義一般獨占傾向所制約的。「殖民地的占有，在和競爭者相鬥爭中所發生的一切偶然的事件上，給與獨占的成功以完全的保證。」（伊里奇）殖民地的占有（對於資本主義的國家）有着以下幾個意義；第一、是意味獨占對於原料的占領，因爲沒有原料，他們就不能確保那在生產上或與市場中的牢固的獨占地位；第二、他們能夠獨占地去經營那些爲競爭國的商品所難靠近的，或多或少的市場；第三、他們在獨占商業的基礎

上，和大規模地殖民地實行不等價的交換；第四、他們獲得了低廉的勞働力的源泉，由於這種勞働力，使他們無論在殖民地，或者本國中都能夠維持高度榨取；第五、使那在本國缺乏着有利使用的資本，獲得獨占的投資範圍；第六、意味着高度的殖民地超額利潤的獲得，隨而使他們能夠將這些超額利潤的一部，拿來收買那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働階級的上層份子，這些被收買的勞働階層乃成爲勞働運動中，機會主義的保持者，和布爾喬亞社會的助力；第七、得到了那以殖民地的人民爲犧牲而榨取來的增加軍隊和官吏等等的租稅和費用；第八、使他們在地球的適當地方，得到了軍事的攻擊支點等等。因此，殖民地的獨占的占領——殖民地的獨占——在帝國主義的一般的制度上，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那爲着保護自己獨占的地位底鬥爭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底布爾喬亞擴大地立腳於而且不能不立腳於殖民地的占有上。隨着一切這些公開從屬於某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領土的存在，在同時，也形成了「國家的依從的許多過渡形態」（伊里奇）許多弱小的國家，就是不轉化爲直接的殖民地，也必要依賴帝國主義的國家，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從屬國家的形態；這種國家在政治上和形式上是獨立着的，而實際上是由於金融和外交的從屬網所束縛」（伊里

奇）如今的拉丁美洲的國家，和巴爾幹的國家都陷於這種從屬國的狀態中。中國，形式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當世界已經被分割完了的時候，他們乃圍繞着半殖民地和從屬國，而形成特別尖銳的帝國主義的對立。英國和美國爲着拉丁美洲所行的鬥爭，帝國主義者圍繞着中國的鬥爭，以及巴爾幹的矛盾等等，都是近代帝國主義矛盾的重要的一個重要特徵。「那些受了金融資本的壓榨的殖民地和從屬國，形成了帝國主義勢力的最重要的源泉，以及帝國主義勢力的最大的豫備軍。」（約瑟夫）

落後國家中的鐵路的建築，以及在這個工具的援助之下對於這些國家底經濟和政治關係上的侵略，是世界分割的強力工具。

「鐵道的建築，在那些以粉飾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而受取很高的薪俸的布爾喬亞，以及那些少數布爾喬亞的俗人眼中看來，好像祇是純經濟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企業。但是事實上，由於許多網，把這些企業和一切生產手段上的私的占有相聯結的資本主義的亂絲，將此建築，轉化爲對於數億萬（殖民地和半殖民的）人類——即在從屬國大部

份人民以及所謂「文明」國家中資本的雇庸奴隸——的榨取工具。」（伊里奇）

侵入了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在三重榨取的恐怖下，豫定了殖民地的命運。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榨取，封建的榨取，以及土著布爾喬亞的掠奪相結合。帝國主義，和前社會制度的支配階層——即封建領主以及那些和國民大眾相對立的商業高利貸的布爾喬亞——相結合的這一個事實使殖民地勞動大眾的幸福蒙受了極有害的影響。「資本主義榨取的特殊殖民的形態，最後，阻止了該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伊里奇）帝國主義，僅僅在農產物和原料的生產方面，促進了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帝國主義把殖民的全部經濟轉化為牠們本國的農業原料的附屬物，而且因為牠們很好地執行「這個任務的緣故，所以使殖民地的經濟成為畸形的發展。地上以及地下的掠奪式的榨取方法，招來生產力的破壞和巨大的損失。人工地集中於某一種生產物（即所謂單獨栽培）的，殖民地生產的有限制的單方面的發展，使殖民地的經濟成為極其不安定，而且使牠容易蒙受市況的一切有破壞性的變動的影響，而且使牠更加依存於帝國主義國家。因為這一切的影響，殖民地勞動大眾的地位，遂成為特別的困苦。但是，獨占的，榨取和封建的，以及土著的布爾喬亞榨取的結合，乃成為殖民地反帝革命解放

鬥爭的重要原因。表現爲重要的源頭和帝國主義勢力源泉的殖民地，至此乃成爲帝國主義沒落最大的原因，而且形成了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勢力的源泉和重要的豫備軍。

第一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社會法西斯，在牠們爲着世界和殖民地的再分割的鬥爭上，採取了反革命的意見、他們把帝國主義文化人和進步、作用的特徵、來作爲這個意見的基礎。例如，第二國際的布魯塞拉會議（一九二八年），以及社會民主黨的會議都接受了下面這種意見：即殖民地的解放會把牠們還原到野蠻，因此殖民地的解放是不適當的。社會法西斯祝奧——他是安斯特單國際事業的指導者——曾經發表以下這種的言論，即殖民地的強制勞働完全是應當的。社會法西斯以這種論述和反蘇聯的國家政策——即根絕那帝俄時代被榨取國民的殖民地奴隸的政策——的無情鬥爭結合在一起。

社會法西斯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意見，在托羅茨基反革命的著作上，反射出其他的意見。托羅茨基無視那殖民地中所剩下的最大封建的存在和支配，因此從殖民地的階級鬥爭考量

中，忘去了封建主義和勞動大眾之間的最大尖銳的對立，也放棄了封建主義和布爾喬亞之間的矛盾。他明白地歌頌那從帝國主義所發生的殖民地的，「激怒的工業化」以及機器擴迫的購買，和前資本主義形態的迅速地消失，他掩飾帝國主義支配的破壞式的，和寄生的性質。同時，他否決了那些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國民爲着自決的鬥爭的任務。因此他塗飾了殖民地革命的反封建的性質，而且顯明地掩塞了他們反帝的性質。托羅茨基也粉飾了殖民中土著布爾喬亞的作用，而且對於中國革命的近代階級，在反對伊里奇的標語「蘇維埃政權」上，提起了「憲法制定會」的反動的標語，隨而，托羅茨基誇大了農民的革命作用，而且塗飾了殖民地中普羅列塔里亞和農民，在普羅列塔里亞指導之下，聯合現實的最重要的任務。所以，他放棄了伊里奇的方向，即現實那在殖民地革命中，普羅列塔里亞和農民的『民主主義的獨裁的方向』。因此，我們知道，托羅茨基——變節者——在「很左的文句之下，完全塗飾了列強和殖民之間的矛盾，而且使那殖民地國家反對帝國主義榨取的革命鬥爭的方向成爲更加錯誤。

在其產黨中的「超殖民地」的理論，實際上，在特殊的變形上，變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概念。他們說：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中廣汎地發展了工業，因此，減弱了牠們對於列強的依存

性，最後把牠們「非殖民化」，使牠們轉化為獨立的，全面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超殖民地」支援者，塗飾了那殖民地生產力發展的關心和那阻礙了牠的發展，而且使的發展成為畸形的帝國主義之間的，難消的，益加尖銳化的矛盾。他們公然反對那由於帝國主義的作用所證明的事實——即公然地反對獨占的榨取排除了殖民地生產的完全的，全而發展的可能性的這個事實。

魯森堡關於那在列強的世界再分割的基礎上所發生的，列強和其殖民地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中也同樣地展開了這種錯誤的，機會主義的論述。以為：殖民地的作用使那些已經不能發現自己販賣的，剩餘價值部分能夠現實，因此她無視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榨取，除去了反對帝國主義壓制的，革命鬥爭的經濟基礎。在魯森堡的論述中，殖民地單單成爲資本主義矛盾解決的因素。而我們知道，這移爲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的最重要的，殖民地作用，以及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壓榨的絕不能消滅的革命鬥爭，還有，殖民地國民在全般革命中自由解放運動的地位，以及「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普羅列塔里亞運動中和殖民地國民解放鬥爭相聯合的任務」——一切還在魯森堡的概念中，全被塗沒了。她無視那被榨取國民解放鬥爭的作用

用，否認那國民自決的法律，而且不將資本主義破產和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鬥爭——這種鬥爭是和被壓迫的國家相聯結的——聯繫在一起，而將資本主義倒壞和非資本主義環境的自動的完成相聯結，這樣完全地歪曲了那在帝國主義強國對於世界分割基礎上所形成的關係。

爲着要反對全布爾喬亞和機會主義理論伊里奇主義，強調：在帝國主義時期，世界被區分爲二個陣營——即區區少數「文明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多數的被榨取的殖民地國家，殖民地成爲帝國主義最重要的預備品，同時牠體受了難耐獨占的壓榨，這種的壓榨乃付給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壓制——這是解放的唯一手段——以條件。伊里奇主義也說明：殖民地革命的國民解放鬥爭，成爲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的勢力源泉和最大的預備軍；在普羅列塔里亞運動上，以及殖民地的國民解放運動上的利益關係，使這二種形態的革命運動，在對於一切敵人，反對帝國主義的全線上，聯合起來，也強調：那在發展了的國家中的勞動階級的勝利，以及被壓迫國民從帝國主義束縛中的解放，如果沒有各革命陣線的形成和鞏固，是不可能的。」（約瑟夫）

第三節 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

世界的分割，在二十世紀初，就已非常不均衡。英國占領了非常大的面積，很大的領土，也屬於法國的支配之下，但是，那些年青的帝國主義國家——如德國、美國、日本等等——在那時竟被遺漏了。當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大戰時，在英國的人口中，其殖民地的人口要占八·六之多。荷蘭殖民地的人口，占其全國人民的七·五，法國是一·二，德國是零·二，美國是零·一。世界分割的極其不均衡，是以這樣的形態來表現，因此，乃在這種形態上，展開了爲着世界再分割的鬥爭。但是，帝國主義的勢力關係是不斷地變化着的，每一次這樣的變化；都不能不成爲那爲着殖民領土爭奪的銳化底原因，也不能不招來衝突和戰爭。

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是從獨占一般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因爲，支配及其相聯繫的暴力關係，是獨占的最特殊的性質。同時，這種軍國主義，是和世界再分割的鬥爭，而且也和布爾喬亞對普羅列塔里亞的階級鬥爭有着特別緊密的關聯。現在我們暫且把以上這兩個極其重要的要素的研究，擋在一邊，這裏讓我們先來考究帝國主義者世界再分割鬥爭的主要作用。同

時，這種世界再分割鬥爭，乃軍國主義的刺激和基礎（請參看圖表）。殖民地的再分割以及先進工業區的合併（如阿爾薩斯、勞倫的吞併等等）都完成於這些戰爭的過程中，因此，雖然牠們的確多半是用這種鬥爭方法來展開，但是這種戰爭，決不一定是爲着殖民地的掠奪上。全世界已經由帝國主義國家被分割的這種事實，使得世界再分割的武裝鬥爭，成爲不可避免，同時也使得帝國主義的戰爭成爲必然。「戰爭乃成爲帝國主義的不可避免的東西，因爲，在每次戰爭以前的若干年間，帝國主義，已經把世界用舊的勢力標準（同時這種舊的勢力標準，也可用戰爭改訂的）來分割了。」（伊里奇）

在世界完全的分割，還沒有發生的很久以前，奪取殖民地的鬥爭及其相關聯的衝突和戰爭，早已存在了。但是僅僅從世界的分割被完成的時候開始，即僅僅在帝國主義的時期，才形成了武裝的世界再分割的必然性，同時才使這種世界的分割，不可避免地採取帝國主義戰爭的形態。帝國主義的全時期，都滿佈着不斷的國際衝突和戰爭。在過去的一九一四年，即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爭以前的二十年間，曾經發生了以下這些事件（這裏我們祇舉出其最重要的一）在一八九四年，曾經發生了和高麗的侵略相關聯的中日戰爭，在一八九六年，曾經發生

了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在一八九七年發生土德戰爭，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二年間，曾發生英波戰爭；在一九〇〇年，又發生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戰爭（即義和團的暴動），在一九〇四年曾經發生了英國和西藏的戰爭；在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間，發生了德國反對格勒路種族的戰爭，同時又發生了日俄戰爭；在一九〇七年，發生了日美的衝突；在一九〇八年發生了波斯尼亞和匈牙利的合併；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二年，發生了土意戰爭；在一九一二年，發生了巴爾幹戰爭。

以上所引出的這些事件，明白地表明了帝國主義特徵的發展的特別衝突。這個衝突，不消說是從帝國主義的本質產生出來的，並且和世界最後的分割，有直接的關聯。這種冷酷的衝突，是構成於強國之間，對於世界分割的基礎上，並且帝國主義戰爭是這些矛盾的運動底必然形態。

在我們以上所引出的這些重要的衝突，以及戰前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爭中，我們可以找出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國民的戰爭，（例如德國反對格勒路的戰爭）也可以找到帝國主義對於半殖民地的戰爭（例如一九〇〇年中國的戰爭），我們也可以找到帝國主義者之間為着殖民

地的戰爭（例如美西戰爭）同時也可以找出帝國主義強國在他們的保護國之間，由於他們指示而發生的等等戰爭（例如巴爾幹戰爭），帝國主義的衝突，用許多不同的方向來展開，其中也包含着圍繞那些非殖民地的領域的衝突。但是這一切的方向，都一塊兒融合於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世界帝國戰爭中。

在戰後資本主義的時期，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比戰前來得更加銳化了，同樣地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之間競爭，也比戰前來得更加尖銳。這裏，爲着要更加詳細地去敘述那帝國主義，許多矛盾的最重要的徵結，所以我們特別指出以下數點：第一、是英美的矛盾巨大的發展，這個矛盾是最大的，以及最主要的一個帝國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於那些奪取拉丁美洲、加拿大、中國的鬥爭上，而且也表現於石油的競爭，以及關稅的鬥爭上；第二、是那建築在凡爾賽和約基礎上，即建築在他們所制定的那些對於戰敗國的掠奪制度的基礎上的，戰勝國和戰敗國間的尖銳的矛盾；第三、是太平洋對立的複雜的結子，這個結子首先擴佈於美國，日本和英國之間，而且也把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也拖入到自己的漩窩中；第四、是英法的矛盾；第五、是法意的矛盾等等。在其他的方面，那些在歐洲大戰期

間，吃了敗仗的國家，都被強制地去屈從軍備的限制，但是在最近幾年來，又重新地向着祕密擴大的武裝勢力的標準了。而且也率直地要求一般和平條約的修改，尤其是在條約中的武裝限制的這一點上。

隨着國際帝國主義對立，以及從這個對立中產生出來的衝突的發展，同時帝國主義國家間，以及帝國主義和殖民地間，還有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間的一切新衝突，遂擴散於整個戰後的時期中。例如；英帝國主義在阿富汗的戰爭，法帝國主義在摩洛哥、敘利亞、安南等地的戰爭，美帝國主義在尼加拉瓜的鬪爭，日帝國主義在滿洲、華中和華西等地的侵佔等等，都是屬於後一類的戰爭。還有那些帝國主義者們，利用他們的保護國來處理自己的利益所發生的特殊的戰爭形態，正表現於那些正在進行的玻利維亞和巴拉圭間哥倫比亞和祕魯間的戰爭中。戰後帝國主義矛盾的銳化，以及對蘇聯干涉的準備的強化，更加招來海陸空的瘋狂的增大，又因為那最新的戰鬪手段的發展（即飛機、化學、坦克、戰爭的細菌等等）也因為舊的軍隊的戰鬪力的提高，因此促成了軍隊和軍艦的戰鬪力的質的迅的增大。同時這種一般戰鬪力的增大，乃成為戰後的特性。

階級矛盾的銳化，以及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運動的昂揚，使帝國主義者，一方面，不得不以社會法西斯的支持，而向那些軍縮會議或者和平會議（例如華盛頓會議和日內瓦會議）求助，請他們幫忙去撲滅普羅列里亞的革命的昂揚，另一方面，不得不求助於階級軍隊的創成，這種軍隊，首先以那些布爾喬亞，最能夠信賴的法西斯軍事組織的形態來表現。但是因為那大量的軍隊的軍事管理，需要着大量的費用，又因為那些從勞働者，農民和都市的小布爾喬亞所組成的軍隊，是不可靠的緣故，因此形成了和帝國主義國家海陸軍建設相衝突的一個基本的矛盾，即使帝國主義的戰爭，容易轉化為內戰，容易把海陸軍利用到革命方面去的這樣的矛盾。

這裏必需託載那當作戰艦的豫備品來應用的，即當作那為世界支配權的戰爭工具來應用的商船的意義。雖然在交通手段的生產過剩的時期中，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的時候，差不多一千三百五十萬噸的海洋船隻都停業了，但是他們仍然繼續不斷的在那裏建造新的迅速的以及巨大的船隻，而且，由於資本主義的國家給他們以金錢上的補助。同時參謀本部，還要求他們去承認這些似乎是為着純商業而應用的，而且正在建造中的新的巨船的計劃

和設計，這些矛盾的事情，僅僅只能用以上這個意義（即把商船來當作戰艦的預備品來用的這個意義）來說明。

帝國主義的這個本質，明白地表現於那些爲着航路以及海軍根據地的創設的鬥爭上，例如英國爲着保證印度航路的鬥爭，以及在新加波的海軍根據地的創設，美國對於巴拿馬運河的開鑿，以及從巴拿馬共和國奪取「永久的」租借地，德國對於基爾運河的開鑿，法國和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鬥爭，太平洋上爲着軍事區域的鬥爭（這個鬥爭首先在日本和美國之間）等等。

因此，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的分割，同時也成爲統治國和殖民地間的鬥爭銳化的基礎，也成爲統治國本身間強力的對敵的基礎，同時也成爲普羅列塔里和布爾喬亞之間階級鬥爭的強化的因素。

第六章 不平衡發展的法則

當世界領土的分割被完成，而且開始了世界的經濟分割的時候，而且也因為資本主義的「和平的一展開」，以及牠向那「自由」領土的擴大，經過了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再分割，而不得不以飛躍的發展來代替的結果，不規則的發展法則，乃成為尖銳化，而且得到重要的意義。帝國主義時代這種不規則的發展法則，被伊里奇所解明，而且被約瑟夫展開了。

第一節 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發展法則的本質

某些企業，某些部門，甚至於某些國家的發展的不平衡律，也存在於先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中，不規則的發展法則，是資本主義絕對的法則，而且，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構機和矛盾的必然產物。假如，資本主義一般的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私的占有形態間的矛盾——以及那從這個矛盾中所發生出來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牠的不可抵抗

的程，是存在的話，那麼不規則的發展，也必隨着牠而存在。但是，這種矛盾，祇不過是不規則發展的經濟基礎上最重要的，和一般的特徵。不規則發展的更加密切的，以及直接的原因，是資本蓄積的各種不同速度之所致，同時，這種資本蓄積的速度，乃由於經濟的原因，和非經濟的原因來確定的。剩餘價值率的不同，資本流通速度的不同，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不同，都表現於某一資本的各種不同的利潤率上，同時利潤率的不同，也確定了蓄積速度的不同。因此，說到蓄積底純經濟的要因的時候，我們在馬克斯的資本論中所理解的前提之下，知道牠是利潤率的不同之所致。因為，這種利潤率的不同，是不規則發展的最密接的經濟基礎。——但是在從抽象到具體的漸次上升的階段上，我們必須也要考慮到某些國家，或某些部門中的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的作用，尤其是要考慮那在牠的封建發展上的比重和作用等等。例如，在美國的迅速的發展上，下面這些條件，演着重大的作用，即封建要素的稀薄性和輕微性，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多年以前，自由的土地的仍然存在，以及絕對地租之不存等等。所以在以上所舉出的那些社會經濟的條件仍然存在的場合上，發展的不規則性，能夠由自然的要素（例如，財富的積儲等等）和技術的進步所促進。

因為技術的進步，能夠爲勞働支出的減低創造出物質的基礎，所以對於某些企業和部門中的利潤率和蓄積，都給與非常大的影響。因爲，牠們能夠利用這種進步技術的良好條件的緣故，所以出現了許多更加組織化的企業和新的生產部門。這種現象，同樣也發生於那些從時間上來說，比較青年的，但是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工業發展道路的國家中。這樣的國家，在技術上，保有着設備最新的固定資本的可能性，而且使牠能夠利用本身的優越，而拼命地向前。

在蓄積的非經濟的原因之下，我們也把殖民地的掠奪，強盜式的戰爭，租借地，以及租界等等放在致慮中。這些原因，在保證蓄積的迅速的速度上，有着特別的意義。這種迅速的程度，往往使某些國家的工業發展達到了飛躍的程度，這種飛躍，使這些國能夠飛快地向前，而且去追越其他比較更先進的國家。例如，差不多做了二百年左右的工業強國的英吉利的重要作用，不能夠單單在不列顛的內部工業的蓄積的分析基礎上去理會。因爲從那些被英國所奪取來的一切殖民地中，所榨出的追加資本，也有很重大的作用，而且這種蓄積也助長了英國工業迅速的成長。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左右，在德國的工業發展上，發生了飛躍，德國

遂成爲第一流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在爭取世界經濟的領導權的鬥爭上，乃成爲英國主要的競爭者。在一八五〇年，英國生產了二百三十萬噸的鑄鐵，而德國祇產了四十萬二千噸。但是在一九〇〇年，英國製造了九百萬噸精煉鐵，德國製造八百五十萬噸。鋼鐵部門中的發展的不規則性，表現得更加尖銳。在一八六五年，英國生產了二十萬噸，而德國只生產了十萬噸，但是到了一九〇〇年，英國祇生產了四千九百萬噸，而德國竟超過了六千三百萬噸。在普法戰爭中，法國敗退的結果，德國從法國所獲得的五萬萬的賠款，助長了德國的蓄積，而且在德國工業的飛躍的發展上有着重大的作用。一九一四年一八年的戰爭的結果，法國努力把德國的賠款做爲工業發展上的飛躍的基礎。正因爲法國的工業，曾經從外國——即從德國——流入了資本的緣故，所以法國，比其他國家更遲陷入那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的軌道中。

因此，當我們全面地地考察了這些決定資本蓄積速度的一切要素的原因以後，同時發現了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的各種原因。這一切都使資本主義下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的不平衡律，以更大的力量和銳化，作用於帝國主義的時代，但是牠們並不決定那爲帝國主義時

代的特徵的特別新的（變質了的）不平衡發展法則的重要內容。

大體說來，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的不平衡律，是不是以下面這種方法來進行呢？即一個國家在經濟的狀態上，是不是以普通的方法，即以沒有飛躍的，沒有戰爭慘禍的，沒有已經分割的世界的再分割的，所謂漸進的方法，來追趕超越其他的國家呢？不，不，絕不是這樣。如上的不規則性，的確曾經在先獨占的資本主義時代中存在（正如馬克斯所意味，如伊里奇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口所寫的一樣）那時候，資本主義的確是以稍稍平坦的，稍稍漸進的方法來進行的，而且那時一個國家，的確，可以恆着長久的時期，沒有飛躍的沒有世界式的武裝衝突，而超越其他的國家。但是今日這種不平衡律，絕不是這樣了。」（約瑟夫）

獨占結合的支配作用，是帝國主義的最基本的特徵。當獨占把許多物質原料集中於自己手中的時候，當牠支配着許多商品市場的時候，牠的支配地位，乃更為強化和耐久。原料源泉的占有，投資範圍和商品販賣市場的獲得，以及那些有着經濟的，或者軍事作用的殖民地的占領等等，對於那些為經濟領導權而行着鬥爭的獨占資本的列強，有非常大的意義。

在二十世紀的初，全世界都被瓜分了。「自由的」領土在地球上，已經不存在了。因此，

假使那些以發展的不規則性而向前前進的國家，一定要確保那些原料源泉和投資範圍，以及商品販賣市場的安全的話，那就非把其他從前保護着這些原料源泉投資範圍等等的安全的資本主義國家，驅逐出去不可。

因為，更加飛躍的發展的可能性，也祇有以驅逐競爭者爲犧牲才能夠保證，所以這些帝國主義陣營中的一切勢力關係的變化，都鼓動牠們去實行爲着市場、爲着原料、爲着世界的新分割的絕死的鬥爭。在這個分割下，帝國主義國家，「把自己的手，向着整個地球伸出來。」

然而，獨占的支配，恰恰招來了勢力關係非常迅速的、和激烈的变化。一方面。獨占強化了資本蓄積，而且，蓄積又爲那迅速的前進，創造出條件，但是，另一方面，這種由於獨占而發生的根本傾向，也招來了某些向前前進了的獨占資本的國家，或者獨占部門的頽廢。那些打碎了大競爭者，而向前前進的獨占，顯出障礙技術進步的傾向，而且這種障礙，也招來了一切進步的阻碍。殖民地獨占以及由於資本輸出而發生的利子階層的擴大，也同樣招來許多國家的頽廢。獨占隨着競爭而存在，並且存在於競爭之上的這個事實，必然使發展和頽

廢的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相互的結合，而且相互的交替。同一生產部門（這些生產部門都是依存於獨占的結合在這些個部門中所占的地位的）有時強力地發展，有時則可怕地衰頹了。這種事實在同一的時期，既在許多特定的部門內部，也在各種不同的部門，和國家中被遵守着：換句話去說：當一個企業，一個部門，或者一個國家，顯出頗廢傾向的時候，其他企業部門和國家，則正在強力地發展。因此，這非常強化的發展的不平衡律，乃實行於這種頗廢和成長交織的結果上，同時也招來勢力關係部份的激烈變化，當世界的分割完成的時候，這種不平衡，必然地招來矛盾的銳化，招來衝突和破局。

因此，發展的不平衡，招來世界再分割的鬥爭，也招來帝國主義戰爭。例如：英國和德國的不平衡的發展確定了一九一四年——一八年的戰爭的基本矛盾。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期中，以及戰後，美國和日本遂迅速地前進了，他們在這個戰爭的時期中，以那些歐洲的國家為犧牲，而獲得了非常多的的利益。美國經濟的成長，在德國敗北以後使得美國成為英國的主要的競爭者（即為世界爭霸的鬥爭上的競爭者）。在戰後的時期，美國在那世界支配的鬥爭中把英國從牠的市場中，驅逐出去了。美國的輸出數量，在一九二八年，超過戰前水準的百

份之六十四，同時，英國輸出的數量，却比戰前低落了百份之二十。美國，大規模地增強了自己的資本輸出，而且利用這種輸出，來做爲牠在反對英國權力的鬥爭上的工具。美國向英國屬地投資的增大（例如美國資本，向加拿大的投入，在一九一二年祇不過是四億美金，而是到一九三〇年，竟增大到三十九億四千四百萬美金）正可以證明美利堅和不列顛帝國主義爲着市場投資範圍，原料源泉的再分割，以及世界的再分割的鬥爭的銳化。正因爲技術的經濟狀態比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得落後的這件事實是英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徵的緣故，所以使英美的矛盾和世界再分割的鬥爭，更加獲得尖銳的性質。

戰時和戰後日本工業發展上的飛躍，也招來了帝國主義矛盾和太平洋流域上鬥爭的激烈強化。爲着地球的這一部份的世界再分割的鬥爭，已經暴發戰爭了。日本對於滿洲的侵佔，以及日本向中國的侵略，恰恰是日本帝國主義，爲着世界的分割的戰鬥的表現。這種侵略是建築於某些帝國主義國家勢力關係變化的基礎上，同時也是爲着要創造對於蘇聯的干涉的根據地。

「在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法則，是表示一個國家，越過其他國家的突變式的發

展，表示一個國家，把其他國家從世界市場中，機敏地驅逐出去；也表示已經分割的世界，以武裝衝突和戰禍的方法，而遂定期的再分割，也意味着帝國主義的陣營內衝突的銳化和加深，而且也意味着世界資本主義陣線的削弱，以及某些國家的普羅列塔里亞，粉碎這種陣線的可能性，同時也即是說某些國家中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

「但是，在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律的基本的要素，由什麼東西來組織成的呢？」

「第一：因為世界已經在帝國主集團間被分割完了，而且在世界上，「自由的」，和沒有被侵佔的領土，已經不存在，所以爲着侵奪和擴張新市場和原料源泉，就不得不以武力來侵奪其他國家手中的領土。

「第二：技術的空前發展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均化，使一個國家飛躍式地超越其他國家成爲可能而容易。同時也使那些不大強盛的但是迅速發展的國家，得以排斥比較強盛的國家。

「第三：在某些帝國主義集團間舊的勢力範圍的分配，往往和世界市場上的新的勢力關係，發生了衝突，所以爲着要在舊的勢力範圍分配之間和新的勢力關係之間，設法「均衡」，

那就不得不用帝國主義戰爭方法，來行着世界的週期的再分割。」（約瑟夫）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平衡律發展法則的特質，包含着這種作用的破局和衝突，同時這種衝突和破局，乃使資本主義更為不安定，而且由於這種不安定，乃使某一國家中社會主義勝利成為可能。帝國主義的發展的不平衡律，轉化為帝國主義發展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成爲資本主義破滅的重要力量。

帝國主義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的不平衡的銳化，喚起了一個國家，爲要驅逐其他的國家而發生的不斷的鬥爭，而且銳化了資本主義的陣營中的一切鬥爭和矛盾，同時，招來帝國主義者的薄弱，而且，使普羅列塔里亞能夠在薄弱的鍵鎖上把資本的陣線突破。首先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國家集團中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正是發生從這個帝國主義下的不規則發展的銳化中。由於這個勝利的結果，全世界，分裂爲二個制度——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同時使某些國家和國家集團從資本主義制度而分離，並且和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這個事實，使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更進一步地發展。

第二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發展的不平衡法則，以及從這個法則中所發生出來的，一個國家中社會主義社會勝利的可能性，被約瑟夫，在那反對反革命的托羅茨基主義的鬥爭上，大大地發展了。

上面已經說過，托羅茨基以為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間關聯的成長和鞏固，以及他們向着更加前進發展水平的進展，能夠鞏固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他的發展不平衡法則的理論，正是從這種原理中發生出來的。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水平的不平衡，並不表示發展不平衡作用的銳化（這個根據托氏的意見則是全人類歷史的「永久」法則），反而是不平衡作用的減弱。因此，托羅茨基把這個由於各國發展速度之不同——這種發展底速度的不同，正是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方法——所生成的發展不平衡律，歸結到水準上的不同，即不是運動上的不同，而是在資本主義工業生產時期上的不同。在發展水平上的不平衡，根據托羅茨基的見解——則是發展不平衡的減低和衰弱的表現，而且引導向世界資本關聯的強化，甚至破碎了一個國家中的關聯，隨而，也引導向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勝利的不可能。

實際上，「這些不平衡律，是發展不平衡的背景和根基，在這個不平衡的基礎上，能夠強化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律的作用……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落後的國家強化了自己的發展，而且超越其他的國家，因此銳化了某一個國家因為被其他國家所超越的鬥爭，而且使一個國家得以超越其他國家，而且使能夠把其他國家從市場中驅逐出去。這樣為武裝衝突，為世界資本主義陣線的削弱，為各國的普羅列塔里亞粉碎這個陣線，創造了前提。（約瑟夫）

水準的不平衡，是發展速度不平衡強化的結果，也是落後國家發展速度加速的結果。但是不平衡其本身也銳化了不平衡法則，而且引導向衝突和破局，因此引起了那和新的勢力關係相適應的，世界再分割的問題，銳化了一個國家被其他國家超越所以發生的鬥爭。因此我們知道，發展不平衡性的確是占主要作用。

下面這些統計，表示：在英國和德國實例上發展的不平衡性，德國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超出了英國鋼鐵生產的水準，在一九〇〇年超出了英國的鐵的生產水準，但是發展的不平衡性，絕不因此而減低，反而被這所銳化了，在德國鐵的加工和鋼的生產，仍然比英國來得更加迅速。在一八九〇年德國生產了二百二千萬噸鋼，英國生產了三百八十九萬噸，

但是到了一九〇〇年德國已經生產六百三十萬噸，而英國只不過生產四百九十萬，在一九一三年德國所生產的，是一千七百萬，而英國祇是七百七十萬。在英國鋼鐵生產上，其每年增加的速度，在一八九〇年前十年間是一〇·七%，在一九〇〇年前十年間是三·一%，而在一九一三年以前則是三·五%，德國鋼鐵生產上，每年增加速度，在一八九〇年前十年間，是一三·九%，一九〇〇年前十年間是一一·一%，一九一三年前是八·一%。鐵的水準也同樣是如此。若果在德國的鐵的加工水準，在一九〇〇年是八百五十萬噸，而英國是九百萬噸，則在一九一三年，在德國所加工的鐵，是一千六百五十萬噸，而英國祇是一千萬零三十噸。每年增高速度，德國在一九〇〇年前十年間，是六·二%，一九一三年前是五·二%，而英國，在一九〇〇年前是一·三%，一九一三年前是一·〇%。

日本迅速地超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水準的國家。托羅茨基爲要創立自己發展不平衡法則的理論，曾經引出過這個日本的例子，但是，這個日本的例子，正駁倒了托羅茨基的這種論述，因爲在一九一四年——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以後，日美的矛盾是一天天地強化了。托羅茨基的發展不平衡的論述，否認帝國主義時期矛盾的銳化，牠的理論是考茨基關

於資本主義矛盾消滅，以及獨占資本主義組織化的平和發展的可能性理論的變相。托羅茨基對於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性的銳化和強化的否認，和他對於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的否認，有着難分的關聯。

伊里奇說：「帝國主義批評的中心問題，是在能不能夠用改良的方法來變更帝國主義的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是在承認帝國主義更進地銳化或深化這個從牠所發生的矛盾呢？抑或承認帝國主義矛盾已經消退這兩個問題上」。（伊里奇）伊里奇的發展不平衡法則，說明帝國主義的轉動必然走向一切矛盾銳化的方面。——爲帝國主義直接辯論的考茨基的理論「超帝國主義」，伊里奇在帝國主義不平衡發展的分析上，脫下了牠的僧衣，他以爲金融資本的支配，會削弱全世界經濟內部的矛盾和不平衡性。

根據考茨基的見解，則國際加特兒和托拉斯，以及金融資本的國際組織，都是削弱矛盾的因素，也是使帝國主義國家的外部政策走向衝突的減少方向去的原因，同時也是解決衝突方法——例如戰爭——成爲不必要的因素。然而在經濟上的獨占，並不和那政策上的平和的，非掠奪式的方法相一致，因此，發展不平衡律，引導向國際資本家集團的參加者勢力關

係的變動，因此帶來那爲着市場再分割鬥爭的銳化和這些財團的解體。

「在資本主義實際作用上的，——而不是在英國僧侶，或者德國的馬克斯主義者考茨基那樣卑俾市民的空想上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同盟，或者超帝國主義同盟——不論在什麼形態上，即不論是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同盟，或者是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總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僅僅是戰爭中的一時的休戰而已。」（伊里奇）

國聯企圖以軍縮會議的長期的拖延，來延遲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準備的這一種嘗試，正說明了以上所說的這種特性。

第七章 帝國主義和勞動階級

帝國主義，招來了勞動階級的社會的、生產的、以及物質地位上的本質的變化，也招來普羅列塔里亞階級鬥爭的規模，階段和形態上顯着的進展，因此在這種重要的狀態上，表露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

爲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即受着頽廢傾向，市場容量的狹窄，發展不規則性等等的影響的時代）所特化的蓄積條件上的變化，非常地銳化了一切資本主義蓄積法則的作用、這種蓄積法則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普羅列塔里亞的地位。普羅列塔里亞的絕對的，和相對的貧窮，在帝國主義時期，達到了非常大的程度，這種程度，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所決不能看到的現象，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上，資本的蓄積，對於勞動階級的地位，是有很大影響的，這個事實非常明晰地表現於如下這些狀態上，即在勞動力充塞的狀態上；生產上勞動力的榨取狀態上，普羅列塔里亞構成的變化情形上，以及工資變動的情形，

勞動和資本的鬥爭規模，以及組成的變化等等的狀態上表現出來

第一節 帝國主義下勞動階段的狀況。

(一) 帝國主義時期勞動力的充塞

資本的有機構成，和技術構成的成長，以及對於勞動力需要的相對的縮小，還有，相對的勞動過剩的形，都是資本主義蓄積的一般的、和難免的特性，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蓄積的這種方向，以極尖銳的形態表現出來。帝國主義意味着資本主義榨取的特別的強化。牠不僅僅大大地的發展了相對剩餘價值一切生產方法，而且也激烈地強化了絕對的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因而，帝國主義是對於小商品生產者（尤其是殖民地的小商品生產者）行着擴大的、和非常激烈的榨取的時期。在這些條件之下，帝國主義時期勞動者的相對過剩的形態——即流動以隱蔽的，停止的形態——非常明顯地被表現出來。國際勞動力的流動性的增大是帝國主義時期相對人口過剩的一個明白的表現。在二十世紀的最初的十五年間，差不多有一千七百萬人口從歐洲向海外的國家（即美國、加拿大、澳洲利等地）從十三個歐洲的國家中

（其中除了俄羅斯、法國、巴爾幹半島的國家以外）每年居民流動，在一八八一年——一八九〇年每年平均是六十四萬八千人；在一八九一——一九〇〇年間每年平均是五十三萬千人，從一九〇一——一〇年，平均是九十九萬八千人；在一九一一——一三年是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人，跟這種海外移民同時，在歐洲內部，也不斷地發生大量的居民的移動——即農業居民——各個國家的都市中，農業國家的人民（如波蘭、匈牙利、巴爾幹的國家中的住民）遷移到工業國家（即德國、法國）從亞洲的人口過剩的國家中（即中國、日本、印度）的殖民，渡過了大洋，向着歐州，向着印度羣島，不斷的流出，這種移民流出的增大，和連續性，以及擴大性，表明了農業的、半工業的、以及工業的國家和區域中，大量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

勞働力充塞的狀態上的更進一層的大變化，是戰後帝國主義時代（即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在這一切形態上的相對人口過剩，到處都激烈地增加了（參看第九章資本主義總危機）。在這些的條件下，帝國主義布爾喬亞，直接地採用了移民的強制的調節政策例如美國、和英國的自治領加拿大、澳洲利等等。英美等國反對僑民移入的法

律，差不多完全禁止了那些從地球上人口最過剩的地方（如歐洲的東南和亞洲等等），向這些國家移入。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從歐洲國家中，向海外的移民，從九十九萬八千人（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一〇年的每年的平均數）減少到四十四萬九千人。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獨占資本，採用了對於落後國家過剩居民的公開封鎖的方法，並且關閉了門戶，不讓那些貧窮漢進來。

（二）在生產中榨取勞働的狀況。

帝國主義是意味着對於勞働階級榨取的非常強化，牠首先表現於生產的過程中——即表現於那為使用價值的勞働力的榨取中。勞働生產力的特別提高，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

帝國主義，特別擴大地發展，而且提高了勞働強度。勞働強化的提高傾向，常常是資本主義的特徵，但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生產大大的集中，獨占的成長，以及那由於這些所制約的、大量生產等等，使資本家得以利用技術進步，去強制勞働者去遂行向那非常緊張的勞働（他們利用自動的生產和生產自動化等等方法）。因而獨佔的支配，同樣也援助資本家去採用那些刺激勞働者去進行那非常緊張勞働的工資制度，迅速的機械的轉動，傳送機，生產

的自動化，勞働量的計算法，賞金制度，必需勞働時間的判定等等，都使勞働強度的驚人地提高了。以下這個的統計正可以作為勞働強度迅速增大的一個間接的表示：美國在一九二二到二五年間，所採用的機械的動力，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勞働者製造品，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第二和第一的數字間的差異，非常顯明地是勞働強度增大的結果。根據國際勞働委員會，關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統計，從那些能夠使勞働生產性增大的許多因素中，在勞働生產力的增大中，企業構成的作用被測定為百分之六十；實備的改善作用，是百分之五十九，勞働力的「合理的」利用的作用，是百分之七百。勞働強度是主要作用的這個事實，在這裏非常明晰地被表現出來了。不幸和死亡的事件的統計，也非常明白地指示出帝國主義下勞働強度的激烈昇高。

在帝國主義之下，不單單祇激烈地增大了勞働強度和勞働生產力，而且也激烈地惡化了勞働的一般條件。勞働技術的保護，勞働衛生設備，生產的安全等——在和改善了的生產狀況相比較之下，是非常地絕望，那裏祇是企業上的疾病，不幸的意外事件，爆炸死亡等等比例的增大。在德國的一千個保險事件之中：不幸的事件，在一九一〇是二百二十四，在一

九一一年是二百二十五，在一九一三年，是二百六十一件。美國的鐵道事業上，每年要傷害二萬人左右。這個要比克里斯尼亞戰爭中，英國的損害的數字更加大了。

(三) 普羅列塔里亞構成的變化

如同在上面已經說過的一樣，生產巨大的集中，獨占的增大，以及由於這些所制約的大量的生產，使帝國主義時期的技術的進展，獲得了新的性質。而且使那些傳送的裝置，和自動工作臺等擴大的應用，成為可能。這一切都招來了普羅列塔里亞的構成上很大的本質的變化：即熟練勞働者的比例的減少，和不熟練勞働者以及半熟練勞働者比例的增加，熟練的水準——即普羅列塔里亞生活水準，也昇進到某一個階段。英國的半熟練勞働者，在一八八六年和一九二六年的比例，在汽車工業上是六十五和七十四，在機械製造上是七十五和八十五，在連輸上是七十和七十五，不熟練勞働者的比例在建築工業上在六十二和七十七等等。德國于二十世紀初在一百個男子之中，百份之十二·三是學徒；在一九〇七年——百份之九·五·更遲——則更少。根據美國一九二〇年的調查資料，在那些受了調查的三千二百萬的勞働者中，是如下地分配：即最熟練的勞働者，是百份之四·九；熟練的勞働者是百分之十

五；稍稍有知識的是百份之十五點九；筋內勞働者是百份之三十四·一一等等。大量婦女勞働，加入了生產，也是帝國主義時期（尤其是戰後帝國主義時期）的特徵。在最近全世界的勞働軍中的婦女，占三分之一；在美國的三千萬勞働者中，婦女是占了一千萬，英國在一千万萬的勞働者中，婦女占四百萬；德國婦女的勞働，是勞働者總數的百份之三十七，法國是百份之四十，婦女勞動今日，還沒有被組織起來（在婦女勞働之中沒有被組織起來的，在德國是百份之七十五，英國是百份之八十，波斯是百份之八十八，意大利是百份之九十七，法國是百份之九十七，日本是百份之十九）因為在經濟的鬥爭上，他們比較安定，而且工錢又便宜，所以是資本家榨取的良好的對象。女孩和男孩的勞働，在帝國主義之下，同樣也是很好的榨取對象。雖然有着許多關於兒童勞働的保護，和兒童勞働使用限制的偽善的法律，但是兒童勞働，仍然是大量剩餘價值的一個源泉，而且仍然向着增多的傾向。這種情形尤其是在那些從屬國和殖民地的國家中更是如此。因為勞働的熟練程度的低下，因為完全價值的勞働力，以不完全價值的勞働力來代替的，所以在帝國主義之下，勞働力急速地消耗的過程，勞働者的正常的工作期間，短縮到平均的工作期間以下的這些事實，以及勞働者「消

耗」等等，都成爲特別地尖銳。勞働強度的增加，招來了這種的結果：即使勞働力，就是在某種程度上的成長狀況之下，也已經不能夠恢復那有着正常勞働力機能的那樣的力量。在帝國主義這樣的條件之下，勞働強度的驚人的增大，通常是在不變的工資之下而進行的，但是屢屢也在低落的工資之下進行着。因爲這個緣故，爲勞働者完全的勞働力而工作的時期，乃激烈地縮小了；還在平均成長着的時期中的勞働者，就已轉化爲不能服務者。普通說起來，三十五歲的近代的勞働者，就成爲已經完全破舊的人物，假使說，在從前勞働者的工資一直增加到四十五歲，在四十五歲到了六十歲之間，是保持着平線，僅僅在六十歲以後，才開始低落的話，那麼，在今日勞働者的工資，僅僅祇能夠增加到二十五歲，而且到了三十五歲，就開始特定的低落，四十歲以上的勞働者（在近代的條件上）就已經成爲「沒有用」而且從生產而被拋出。在勞働力的勞働能力低下的基礎上，在相對人口過剩大大地增大的基礎上，也在企業上的榨取的強化的基礎上，帝國主義激烈強化了勞働的流動性。

和辯護者遜巴特以及維利拉所說的關於普羅列塔里亞不斷的「貴族化」的話，正正反相，帝國主義時代，給與我們的祇是勞働力低流動性的增大的景況。例如，在美國的福特工廠中

從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三年十月雇用了五萬四千的勞働者，而在那兒工作着的，只是一萬二千人，即勞働力的流動性，達到了百份之四百五十。

隨着沒有知識的以及半熟練勞働者比例的增大，以及熟練勞働者階層的減少，同時在這種熟練階層的內部，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盡了改良那複雜機器設備機能的這個階層的一部份，得到了某種特權的地位。他們乃被勞働貴族資本家，用獨占超利潤的一部來養育和收買。

(四) 帝國主義下的工資

在帝國主義時期，即當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極度強化的時候，那被馬克斯所制定的，與工資的相對和絕對的低廉傾向，特別明白地表現出來。獨占價格的增加，不熟練和半熟練勞働力比例，以及勞働強度的增大，勞働預備軍的增大，以及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大量的、與不斷的失業的出現等——一切這都銳化了。使工資成為相對的以及絕對的低落傾向。伊里奇非常辛辣地指出帝國主義這種性質，並且他也指出了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斯的辯護者們所說的關於資本主義下普羅列塔里亞幸福的增進的歪曲的話。伊里奇在一九一二年，曾經這

樣地談「在最近幾年來，一切類似的，肯定的欺騙，非常明顯地打開在大眾的面前，生活程度大大的增進了，雖然在勞働者們的頑固的和成功的罷工鬥爭之下，工資的增加，仍然比勞働力所必需的費用要來得緩慢，而且，跟着這一切同時資本家的財富，增大得瞬目似的迅速，依據那立腳於政府方面的布爾喬亞社會行政的統計，德國勞働者的工資，在最近三十年間，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生活程度至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重要的生產物，衣服燃料，住宅等完全都漲價，勞働者成爲絕對的貧窮即成爲比從來一切時期，都要露骨的貧窮，而且不得不更壞地生活着，不得不更加貧窮地呻吟着，餓着，不得不居住在地下室和閣樓裏面。」

國民收入上的工資的部份，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減低了。美國的工資（職員之工資也在內）和國民經濟的比例，在一八九〇年是百份之五三·五，在一九〇〇年是百份之四十八·三，在一九一〇年是百份之四十六·九。（以上是根據經谷的統計。）根據古維拉的統計則美國的工資（職工俸給不在內）在一九一三年，是百份之三十七；在一九二五年，是百份之三十八；在一九二八年，是百份之三十六·一。英國在國民收入上工資的部份，在

一八九一年，是百份之四十二·七，在一九〇三年，是百份之三十八·三，在一九〇五年是百份之三十八等等，類似的景況，也表現于其他的國家中。在英國，四十七個職業的實際的工資，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低落了百份之十。在美國（根據包已汀斯克的統計）分成各種價格的每日的工資，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二年，低落了百份之十四·七。在德國（由於提斯加的計算）實際工資，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二年，低落了百份之三十。因此，正正和布爾喬亞和社會法西斯的辯護者，關於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尤其是在帝國主義階段上，實際工資增大的問題的呼聲，正正相反。實際的工資，在帝國主義之下低落了。這裏是必需注意的，是工資的實際的低落，比所引證的計算，還要顯著，加大！因為這些政府和布爾喬亞的計算通常只是採用平均的數字，而且更壞的，是他們統計那些普羅列塔里亞中拿高級薪水的階層；同時這些數字，往往和勞働的程度，失業的規模，勞働的利用狀態等等相分離。戰後帝國主義是實際工資水準低降的動向，更為尖銳，而且獲得直接破局的性質。

帝國主義的時期，尤其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帶來了危機對於普羅列塔里亞壓迫的增大：即失業的激烈的增大，對於工作着的勞働者榨取的強化，勞資的異常的低落，勞働者

使用的非常的縮小，死亡和疾病的增多——這一切都使帝國主義危機時代的現象，獲得了未曾有的銳化。隨而，在帝國主義條件上，因為獨占支配勢力的牢固，因為景氣衰退傾向的緣故，而且也因為景氣長期延續消失了的緣故，所以就是在景氣時期，勞動者們也不能夠享受到像先獨占資本主義時期中所成就的那樣一時的和部份的福利。美國在一九二八年所支出的工資的數目，僅僅是支出於一九二三年的百份之九十八。依據勞動調查研究所的統計，英國的實際的工資，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八年間，每年的比例，以如下的形態表現出來，即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九十二·七，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一·五；百分之九十二，百分之九十六，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百·五，百分之九十九。

因此普羅列塔里亞被壓迫大眾的地位在帝國主義之下，循環式地被惡化的這個事實，是帝國主義一般的特徵。而且這種向着景氣時期傾向的減少，在獨占帝國主義上，通常是更被表現出來，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勞動階級更少地享有景氣時期的相對利益，但是更多的體驗到危機增多的痛苦。

第二節 帝國主義下勞動和資本的鬥爭

在帝國主義的時期，那些特別爲着反對勞動階級的組織急速的成長了，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特徵，同時，這些組織獲得了國際性質這件事，也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例如，一九〇七年在倫敦的航業公司會議，以及一九〇九年的國際航業主聯盟等等。）

兩個基本階層之間的關係——即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之間的關係——在帝國主義時代因而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和進展。這兩個敵對階級的構成，和他們相互的鬥爭形態和方法，以及他們間的階級鬥爭的緊張程度和規模，都起了非常大的變化。帝國主義是生產手段向那些國家和國際金融寡頭政治的手中，驚人積集和集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布爾喬亞的經濟權大大地增大地了，他們的政治力量（即官僚政治和軍國主義等）也極其強化了。在這時期中，布爾喬亞爲了自身，造出了大量的和最強力的組織。生產的獨占，銀行的獨占、金融的獨占，在資本輸出上的獨占，殖民地金融的獨占，國際的獨占等等，都表現出資本家階級指導的成長，這些獨占，不單單祇是用來反對其他資本家的強力鐵拳，而且也是和勞動階級有

鬥爭的得力的工具。托拉斯資本增大了那些反對勞働階級的力量。

但是，這種強化了布爾喬亞的經濟權力和政治勢力，而且又喚起了他們組織成長的過程，同時也招來了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能力，和他們階級組成的驚人成長，而且也招來了階級矛盾激烈地尖銳化，以及巨大的階級鬥爭的成長。隨着那些大資本家（即獨占着這一切變動過程的利益的資本家）數目不斷地減少，同時那些窮乏、壓迫、隸從、頹廢榨取等等的量也益益地增大了，而且，隨之那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所結合、所組織，而且不斷地膨大着的勞働階級的反抗，也隨着增大了。」（資本論第二十四章）馬克斯的這種天才的肯定，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明白地表現出來。生產的集積，和獨占的增大，不單招來勞働大眾貧乏的強化，而且也使牠們和那些大企業的聯合，也被強化而且擴大了。這些聯合，是直接或間接地和勞働階級相鬥爭爲目的，而且是以擊退那些相從布爾喬亞那裏獲得某種讓步的勞働階級的嘗試爲目的，例如德國，已經在一九〇〇年有着許多的企業者的聯盟。全帝國企業聯盟，是二十二個，州省的企業聯盟，是七十四個，地方的企業聯盟是二百零七個。在最近幾年來，這些聯盟的勢力更加大大地增長了。爲着圖謀自己能力的強化，

爲着在確保反對勞働者的統一戰線，許多企業者的聯合，乃結合成一個大聯盟。在一九一三年春，德國成立了德國企業主同盟的結合；在一九一八年，這個結合獲得了七十三個大聯盟和三百三十八個小聯盟，以及七百三十四個地方集團，這個大結合的會員的數目，幾乎超過了四萬人，而且在這些企業中，有二千四百萬的從業勞働者，在一九二〇年，加入這個結合的，已經有一百八十九個大聯盟，和一千三百五十個小聯盟，而且管理着一百萬企業，和六千七百萬的從業勞働者。從十九世紀的最後的三十年開始，尤其是從二十世紀開始，勞働階級且創設了大量的勞働組織：例如，工會、合作社、以及勞働政黨等等。

英國，在一九〇〇年到〇一年間，有四十一個工會和三十五萬三千的會員；在一九〇五年到〇六年，有一百五十八個工會和九十萬四千名的會員，到了一九一〇年，有一百五十一個工會和一百三十九萬四千名會員，在一九一七年有一百二十三個工會和二百四十一萬五千的會員，到一九二五年，有一百〇六個工會和三百三十七萬三千人名會員。在美國，美國工會在一八八六年，有七十萬名會員，在一九〇四年有一百七〇萬名會員，在一九一七年有二百三十七萬一千名會員，在一九二二年有三百十九萬五千的會員。在德國，德國的總工會在一

一九一〇年，有二百萬名會員，在一九二三年有五十七萬名會員。帝國主義用全力把一切部門和一切國家——不論是先進或者落後的——都誘入世界經濟制度裏面去。資本的輸出，是極其一般的，而且為帝國主義時代所特徵的某些國家之間的聯結，但是也是對於落後國家的最完全的和最新的榨取方法，低廉的勞働力從落後的農業國家遷移到那先進工業國家的這一件事，使這些勞働力也投入到帝國主義榨取的鍋中。一切剩餘價值生產的方法——勞働日的延長，勞働強度的提高，勞働生產力的提高，工資落到價值之下低落等等——在帝國主義的時代，擴大地而且強化地被國際化了。

榨取方法的國際化，資本的移植，勞働人民的遷移等等，非常可觀地把勞働和資本的鬥爭轉化為世界普羅列塔利亞和世界資本的鬥爭。因此，這個新的時代，不單單祇促成了大衆多數的勞働者組織起來，而且也使勞働組織，成為國際化，或者，使那些各個國家的勞働組織，成為非常大的國際聯結。自從英國工會（在一八八八年）最初組成了國際勞働會議以後，又經過了那最初的國際鏟夫會議，一八九〇年，更經過那第四次國際會議（在一九〇五年，這次會議為國際普羅列塔里亞鬥爭，造成了起始的基石），而且再經過第六次國際會議（在一

這次會議中分配這個國際會議的祕書），這樣，一直到了一九一三年的第八次國際會議的時候，國際的勞働運動至此乃獲得了永久的組織——即國際工會聯合會。在當時，國際工會聯盟獲得了十九國的代表，和七十三萬的會員。隨着全國國際勞働中心的成立，許多工會同樣也獲得而且擴大爲國際的關聯。

勞働和資本相鬥爭的規模和方法，在帝國主義之下，也被本質地變化了，這種鬥爭更加常常超越了一個企業、一個部門、一個區域的範圍。強力地把一切方面，都引入到鬥爭中去。

德國，在一八九六年曾經發生了三百八十四次罷工運動，參加人數大概是三萬九千人。在一九〇〇年發生了一千四百五十三次，參加人數，是三十萬左右，在一九〇五年發生了二千四百〇三次，參加人數是七十七萬七千人，在一九一二年發生了二千五百〇十次，參加的人數是八十八萬七千人。英國在一八九九年，發生了七百十九次的罷工運動，參加人數是十八萬，而且因為罷工損失了二千五百萬勞働日。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的三年間，爭議的次數，是一千〇八十五次，參加的人數是一百〇三萬七千，而且所損失的勞働時間是二億

○九百萬日。隨之，他們間鬥爭的方法也變更了。這些結合着的，而且強有力的獨占資本，開始採用攻擊的方法，工場鎖閉乃成爲他們最好的方法。在這些經濟衝突的一般方法中，工場鎖閉的數目，在帝國主義時代顯著地增多了，例如德國，工場閉鎖的比例，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三年是百分之十三·六，在一九〇四到〇八年是百分之二十四·六，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三年，是百分之三十一。

但是，因爲獨占資本勢力的成長，以及他們對於勞働階級攻擊的強化，並沒有削弱普羅列塔里亞以及他們和資本相鬥爭的勢力。相反的，勞働階級的階級戰鬥力的驚人成長，以及他們的活動力、戰鬥力、攻擊的士氣的激昂等，都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那些已經成長到廣大和深處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經濟鬥爭，遂緊密地和政治鬥爭結聯起來了。

在帝國主義時代，普羅列塔里亞的經濟鬥爭，成長爲政治鬥爭這件事實，乃是由於以下這兩個原因所促成，即因爲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即在階級矛盾，獨占的榨取，政治的反動，以及對於國民的迫害等等，達到了最高頂的狀態之下——所以，這一切革命式的，大衆罷工運動，必然地和自己經濟的以及政治的鬥爭相結合」（伊里奇）而且，也因爲布爾喬亞

本身，當自己收買來的這些勞働貴族和走狗，不能夠再去制止那些大眾的力量的時候，因此乃用出了其所有國家機關的力量、警察、軍隊、法庭、牢獄等等，即使是經濟的衝突，帶上了明白的政治色彩。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單單祇發生了普羅列塔里亞經濟鬥爭向着政治鬥爭的成長，而且在普羅列塔里亞的本身的政治鬥爭當中，遂非常頑固地提出那些革命的根本問題——即關於政權的問題。

「帝國主義，是獨占托拉斯和新迪克，以及那些在工業國家中的，銀行和金融寡頭政治的全能時代。在和這些力量鬥爭中，勞働階級普通的方法——即工會、合作運動、議會的政黨、議會的鬥爭等等——都表現出非常地不完全。帝國主義，在幾百萬的普羅列塔里亞前，提出了以下這幾個問題，假使你們不願意降伏而求資本的慈悲，不願意如舊地戰慄地低下頭，那麼就要拿起新的武器來，帝國主義把勞働階級引導向革命化。」（約瑟夫）

因此，在勞働運動的範圍中，鬥爭從低級的形態，向高度的形態的轉移，經濟的鬥爭向政治的鬥爭的成長，鬥爭向着革命方法的轉移，以及革命的成熟等等，都是帝國主義的特。但是，縱令普羅列塔里亞大眾組織實際數量的增大，縱令勞働階級戰鬥力的提高，縱令

經濟的鬥爭向政治鬥爭的強力的成長，帝國主義之下的普羅列塔里亞的運動，也被機會主義，減低了自己的勢力。因為帝國主義，強化了對於普羅列塔里亞的榨取，因為牠把最落後的，並且受了很少的工賤的勞動階層，也拖入到榨取的鍋中。同時，也因為牠也把落後的以及殖民地的國家的勞動也投入到資本的軌道中的緣故，所以為收買先進國家中的勞動階級的少數上層，創造了可能性，而且也為那些勞動貴族即勞動運動中的布爾喬亞的支柱的紅利創造了可能性（請參看第八章）。這些勞動貴族，是勞動運動中機會主義的保持者和根基，而且，也是布爾喬亞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們，在這個手段的援助之下，為自己確保了那對於殖民地的勞動大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的普羅列塔里亞被壓迫大眾拚命地榨取的可能性同時這種勞動貴族，也是用來掃除普羅列塔里亞和勞動者革命運動的一個工具。社會德謨克拉西，和工會的領袖們非常不完全地把勞動階級（即在國家和國際範圍中勞動階級）結合而且組織起來：他們祇在那些優越的，而且受着很高的薪俸的勞動階層的範圍中，去募集他們的會員，這些階層，往往只是全勞動階級的五份之一——六份之一左右，另一方面，這種募集的範圍，也祇限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普羅列塔里亞。他們把勞動大眾

組織起來，同時又努力地剝奪這些組織的獨立性（即，從布爾喬亞方面的獨立性質），而且把這些組織，轉化為布爾喬亞的柱石。無論在戰時和戰後，這樣的事實非常明白地表現於第二國際和安阿姆斯特登斯國際工會的一切實踐上。而且這種政策就是在戰前，也會經被他們採用過。

就是，在這個階段以前，這種工會和政黨的組織，就已經轉化為勞動大眾革命意志的撲滅者，和布爾喬亞的助手了。以上這句話可以從下面的統計中，表現出來：在那些屬於全德國的改良主義派的工會的工會收支表中，為着支持勞動者罷工鬥爭所支出的費用，在一八九一年，是百份之六十六，在一九一二年，是百份之二十三，在一九二八年是百份之十七，在一九二九年是百份之六·五，在一九三〇年是百份之四，另一方面那些支付給勞動貴族們的費用，漸次地增大了。在德國工會的收支上，這些費用從五億八千五百萬馬克（一九二九）增加到六億零六百萬馬克（一九三〇）。以上這些所引用的數字即是說：勞動貴族已經從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努力地把那從勞動階級的武器所組織成的工會，轉化為調整勞動力販賣的、平和的、無恥地組織了。而且，就是在罷工的場合，也祇是努力地和企業主，談判關於協定

的問題。

機會主義者，在勞動運動上的勝利，以及改良主義者的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指導，轉移到布爾喬亞方面去的這些事實，使勞動運動成為特別的困難，但是牠們決不能轉變那帝國主義時代的一般性質，我們知道這個帝國主義時代，是充滿着成長了的階級鬥爭的時代。

伊里奇考究了普羅列塔里亞運動的歷史以後，把牠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一八四八年革命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第二個時期，是從巴黎公社到俄國革命；第三個時期是俄國革命以後。假使說第一個時期的特質，是小布爾喬亞在勞動運動中占着支配，而第二個時期的特徵，是普羅列塔里亞大眾組織的創立和革命的暫時停止（因為在西方布爾喬亞革命已經終止，在東方他還沒有成長）那麼，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以及那些在牠以後的波斯革命，土耳其革命，中國革命都可以說是發展平和的波浪的終結，在這個時期，不單東方醒來了，而且那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運動，也呈露出新的性質。差不多有一萬人左右參加的英國的礦工罷工運動（一九一二年），瑞士的罷工（一九一二年），以及美國向大量勞動運動的轉移，德國大眾罷工運動的復活等等，都證明了這種勞動運動，打破了那平和的時

代，破棄了那從前的鬥爭方法，而且轉移向新的方向。

伊里奇說「普羅列塔里亞和布爾喬亞鬥爭的銳化，被發現於一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這兩個敵對的陣營，緩慢地，但是不屈地強化自己的勢力，鞏固自己的組織，而且更加尖銳地相互敵對於一切社會生活中，沉默地準備着，準備着將來的革命的鬥爭。」伊里奇努力地證明，帝國主義是普羅列塔里亞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直接地把人類引導向大革命的衝突和鬥爭的時代去。

偉大的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創立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打開了普羅列塔里亞革命的紀元，同時牠完全證明了伊里奇理論的正確，說：帝國主義時代不單單創立了機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且也鍛鍊出了強有力的而且充實了的革命勢力（例如，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働者的熟練的活動能力，以及殖民地國民革命運動的成長），同時這種成長了的革命勢力，在許多革命鬥爭中根絕了那些資本主義、和機會主義，布爾塞維克，表現為帝國主義時代的實際革命運動的擔負者，布爾塞維克從自己的發生，就開始宣告和國際機會主義的無慈悲的鬥爭，而且在鬥爭的過程中，乃轉化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的決定力。

第八章 帝國主義是頹廢着的和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

第一節 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和頹廢

在十九世紀末葉，伊里奇就已經這樣地指摘出：即，「資本主義進步作用的特徵，並不和資本主義的消極的以及黑暗方面的一切特徵相對立，也並不和這種爲資本主義的不可避免的性質的、深刻的、全面的社會矛盾的特徵相衝突，同時這種社會的矛盾，正闡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歷史性質。」（伊里奇）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這種歷史的性質，非常明白地被表現出來，因此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也成爲非常地完全。「能夠把資本主義進步的歷史作用，概括爲二個簡略的狀態，即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社會化。」（伊里奇）勞働的社會化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帝國主義下達到了非常大的規模，而且牠們的更進一層的發展，遂遇着了那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所發生出來的，難於克服的障礙。因此，資本主義歷

（伊里奇）

假使，帝國主義時期的獨占支配，是出現于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之中，那麼每一個獨占
的出現都一定招來寄生和頹廢。

那些從資本集中而發生出來的帝國主義的獨占結合，以及一切的獨占，都不可避免地產生
出停滯和頹廢的傾向。「因爲獨占價格（雖然是一時的）一被制定，到了某一階段，就會
排除掉那些對於技術進步，以及對於一切其他進步，對於前進運動的刺激，而且也就發生出
那些人爲地阻止技術進步的經濟的可能性。」（伊里奇）對於原料源泉獨占的占領，或者若
干祕密方法（或者祕密機械）的利用，都同樣招來這樣的結果。

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政治，從自己本身的性質，而招來反動和腐化。以下這幾句話是伊

里奇給與金融寡頭政治支配的特徵：「全面的政治反動，是帝國主義的性質。大規模的揩油和賄賂，各種形態的欺詐。」（伊里奇）

資本的輸出，據伊里奇所給的明白的定義來說，則是意味着寄生主義的增加。「……資本主義，創出了少數的特別富強的國家（這些少數國家祇占着全地球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下，這個數目，往往被他們所『詐稱』和誇大爲五分之一）這些國家『剪息票』似的，把全世界掠奪了。資本的輸出，依布爾喬亞的統計，每年得到八億——十億左右的法郎（照戰前的價格）。如今，不消說是更多。」（伊里奇）資本輸出招來資本的移植，這些資本，往往是這些國家本身的工業發展所必需的費用，因此必然地引導向停滯和頹廢。伊里奇寫着：「這種輸出（即資本的輸出——著者註）自然地招來資本輸出國中若干發展的停滯。」

帝國主義的獨占的第四個現象，是資本家聯盟間對於世界的分割，這個世界分割乃招來「超獨占利潤」的形成，「超獨占」是從國際獨占的成長，關稅的成長，價格的提高等等中所發生，這些更加助長了資本主義的舊化。同時獨占的第五個現象——即強國間的世界分割——是體味的對於「被壓迫國家的榨取，尤其是那些少數的「強國」對於殖民地的榨取，同

時這種榨取，是和吞併有著不可分的關聯，而且牠把這「文明的」世界，轉化為那些存在於數百萬的非文明國民身上的，寄生蟲。」（伊里奇）

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更進一層發展的抑止傾向，是從獨占的本質中所發生的，由此「在某一時期間却一點也沒有，排除那在某一生產部門、某一國家中、資本主義的驚人迅速的發展。」（伊里奇）獨占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至此乃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只有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才能夠打破這種束縛。

第一節 穢廢和寄生主義的形態

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生產力發展的停滯在如下這些事實中，表現出來：即，第一、在獨占對於技術進步的人工地抑止上表現出來；第二、在生產力的破壞式的利用上表現出來；第三、在不生產費用的增大上；第四、在寄生國和寄生階層的增大上表現出來；第五、在發展速度的抑止，以及生產力的浪費上表現出來；第六、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生產力的抑止上，表現出來；第七、在軍事費用的增大，以及從帝國主義戰爭所

發生的巨大損失上，同樣也在那自給自足傾向的成長而發生的巨大損失上表現出來。

(一) 對於技術進步的發展上的抑止，存在於以下兩點：第一、那些完成於最大資本主義獨占的研究室中的發明，嚴密地保守祕密，而且獨占支配的這個事實，使牠們並不努力去利用這種發明的；第二、各個獨占結合，努力地收買那些新發明品的特許權，但是他們並不去利用牠，這樣做，祇是防止其他企業占有牠的緣故。這一切現象，也曾經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前階段上存在過，但是那時，牠們僅僅是散在的現象——在獨占資本主義時代牠乃成為普通的現象。根據斯提厄他·查伊沙的證明，「一個工業部門，把二十年以後的特許權，以非常便宜的價錢，都買來了」；第三、假使這種新的發明會使大量舊的投資的價值，成為暴落的時候，他們有意識地阻止那新的改善了的，技術的使用。

例如，美孚油公司雖然獲得了別爾基德沙發明的特許權，即，從煤炭採取混合石油的發明的特許權，但是他們並不普遍的地去利用這種發明，爲的是防避和天然石油的競爭；美國的銅製品新迪克，毀壞了亞爾巴特 Alberta（加拿大）巨大的製鉛工場，這個工場，每年能夠生產二百萬噸的生產物，毀壞牠的目的，是預防那世界銅器市場上，自己地位的衰頽；克羅

之所以對於那技術的不銹鐵生產可能性的防止，爲的是關心那鋼和鐵，每年要縮小一千萬噸的緣故——像這一類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這一切，都證明了那頹廢着的資本主義沒有能力去應用這種從他自身所「懷孕」的技術革命。

(二) 這種爲資本主義的一般特徵的、生產力的破壞式的利用，更加被獨占的支配所強化了。獨占的結合，是要追求利潤的這個事實，不可避免地使他們去採用那對於有機原料、有用礦物等等的破壞式的方法。金融資本的「天才」們所關心的是「榨取」和能不能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這兩件事。結果「使每採掘一噸煤的時候，必讓一噸煤仍然殘存於礦中」的這個事實發生了(以上那個事實是由於一個有經驗的美國技師所證明)。另外兩個技師志里伯和波谷，同樣也證實了以下這句話即「那些在生產過程中所沉沒的一部份的價格要等於那些所生產出來的，大部份煤炭。」斯提厄·查伊斯說，「非常大的掠奪，也在石油的產額中，被表現出來，從所生產出來的，四樽石油中，要損失去三樽。」我們知道，技術的發明、和提高，同樣也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開始侵入到農業經濟中，但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農業經濟仍然比工業「絕望的落後」(伊里奇)。

依據美國經濟學者米達和沃斯托連克的統計，農業生產，因為受了近代技術普及的影響，所以必需要縮小了牠們耕地面積的三份之一，才能夠維持小麥現在的產量。若果用更好的照顧和飼料來增加牛乳，那麼，則能夠把美國乳牛的數目，從二千一百萬減少到一千三百萬。雖然這樣，牛乳對於居民的供給，並沒有減少。依照這本書的計算，則投入美國農村中的過剩資本，達到了六億六百萬元。若果努力地而且更加科學地把美國的經濟組織起來，那麼，能夠從牠之中，解放出三百五十萬的勞働者和大量的財富，並且可以把這種財富，利用為美國經濟的更進一層的發展。牠之所以不能夠實現者乃是因為那些毫不關心於這方面的獨占資本主義，支配着美國的緣故。

(三) 在資本主義獨占支配的時代，即當那新的形態的競爭戰被銳化的時候，當那為着販賣市場的鬥爭，達到更加銳化的時候，當資本主義「貪慾的法則」，達到了自己最高的現象形態的時候，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生產費用(*Faux Frais*)，遂數百倍地增大了。生產上的損失增大了，流通費用、奢侈品上的費用、海陸軍維持上的費用、生產物人工的毀滅等等都增

在販賣的困難性加大的情形之下，商業的費用也增大了。西得尼爾伊 A 坡福，給我們以如下的表，指示出美國的生產價值與商業費用的相對關係：

年 代	生 產 費 用 (%)	流 通 費 用 (%)	%
一八九〇	六三·三	三六·七	一〇〇
一九〇〇	五九·九	四〇·一	一〇〇
一九一〇	五三·五	四六·五	一〇〇
一九二〇	四九·六	五〇·四	一〇〇

從以上所引用的表中，非常明白地表示出：在資本主義獨占支配的時代，那流通費用，是不斷地增大，而且到了戰後，還超過了生產的費用。依據阿得加拉卜克的統計，美國每年的廣告費用，是十二億九千八百萬美金。同時，那些不生產階級，對於華麗品的費用，也同樣大大地增多。在一九一九年，美國國家收入額，大約是六十六億美金，而從奢侈品得到的，是二億二千七百萬美金，即占全國收入的三份之一以下。而且，人工地將生產物來毀壞

的這種事實更是未開化人的野蠻的舉動。這個事實，在戰後，因為價格的未曾有的低落、和世界危機不斷的深化故，所以特別廣泛地被採用了。對於生產物的毀壞，是以提高價格為目的，這種事實雖然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也會經不止一次地被應用過，但是絕沒有達到像牠在帝國主義之下，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這樣大的規模。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的時代，那些從生產機關的慢性倒閉中，以及對於資本主義企業的增大的能力的利用的不可能性中，所發生出來的損失，特別地增大了。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到二六年，美國的熔鑄爐，平均所做的工作，比自己生產能力要小到百份之六十六以下；馬特諾夫式的鑄爐（在同年）——比自己生產能力要小到百份之七十一·三；比沙姆式的製銅爐——小到百份之六十五·八，電器爐——百份之三十九·三。同樣的景況，也發生於德國。德國的熔鑄爐平均一晝夜的生產率，祇是自己生產能力的百份之五十八（在一九二五年），在一九二六年，是百份之五十，一九二七年是百份之七〇，一九二八年是百份之六十。生產機關不能夠利用其自己的生產能力的事實，同樣也表現於木棉工業中，在戰後這個工業部門，不能夠馬上達到自己戰前的工作水準。例如，在法國，一架紡織機在一晝夜所生

產的紡絲，把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等拿來和一九一三年對比的話，造成了如下這些比例；在一九二五年是百份之六十二·二，在一九二六年是百份之六十四·一，一九二七年是百份之六十一，一九二八年是百份之六十五·七。德國的木棉工業的生產指數：在一九二五年是百分之八十六·八，在一九二七年是百分之九十二·二，在一九二九年是百分之六十八·七。在最近世界危機的時候，企業工作能力，特別激烈地，未曾有地減低了。例如，在一九三二年，美國採礦工業中，所做出的工作，祇是其自身生產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二，在汽車工業上，是總能力的百分之十五；在英國的造船業上，牠僅僅是百分之六；在德國的機械製造工業和採礦工業被利用的，大概還不到百分之三十。

同時，資本主義的頹廢，也在那最重要的生產力——即勞動力上的不應用上，被表現出來。戰後的失業，獲得了緩慢的性質和未曾有的規模，這種失業規模是由於對勞動力未曾有的浪費所引起（請參看第九章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四) 資本主義獨占的本質，必然地招來那些存在於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於世界經濟中的，資本家寄生階層、和寄生國家的增多。因為，那些蓄積了大量財富的某些資本

家，能夠從生產遠離，而且靠着自己的資本，所得到的收入而生活，那麼，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由於某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大量財富的不平衡蓄積的影響，某些獨占（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夠用資本輸出的方法，來獲得巨額的利潤，這種所獲得的利潤，比用自己的生產和商品流通更進的方法所獲得的要多得多。資本所有者，和資本機能的分離，即投資和企業經營者的分離，是資本主義一般的特性。在帝國主義時期，這種資本和資本家的分離，達到了非常大的規模，而且在利子階層和利子國家上，獲得了自己表現。戰前的法國，喜歡把自己的資本向國外輸出，更加勝過把自己的資本，投到國家內部的工業中，這種輸出，給與牠更大的收入。這個事實，同樣也存在於大不列顛帝國中。我們知道，英國在十九世紀時代，外部商業是保守着第一位的。依據希忽拿的調查統計，英國在一八九九年度的收入，是一千八百萬鎊。這個的確已經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但是，同時，那些從外國的投資所得到的收入，平均是九千萬到一億金鎊。「那些所謂世界商業國家中，從利子所得到的收入，反而五倍地超凌那些從外部商業所得到的收入。這是帝國主義的本質，和帝國主義的寄生狀態。」（伊里奇）

在一九二五年，英國從外部商業，祇獲得一萬萬鎊左右，但是從資本輸出和其他銀行事業所得到的收入，平均是四億二千萬鎊。在一九二六年，英國發生了大罷工，這個罷工使全英國的經濟組織，獲得了巨大的損失，依據英國的雜誌經濟學者的統計，在這一年間，一千五百個股份公司的利益分配金，平均是百分之一十一·八，而在一九二五年，即大罷工的前一年，這一年英國從沒有發生過一次罷工，但是，這年的利益分配金，反而減少了，即是，百分之十·五，即是說，在罷工的年間，牠們的利益分配金反而大了。這種現象證明：英國資本的主要利潤，並不是從英國的工業中，而是從殖民地的原料生產物中——（例如樹膠、石油、茶等等——）而得到的。這種意義同樣可以在一個最大的英國銀行家斯特姆和一個德國教授和經濟學者基爾蘇的談話中表示出來。他說：「我們在二三個原料獨占上所得到的，比那些在全英國工業中所得到的，更要大得多。」因此，我們很明白地看到英國轉化為金利國家的這一件事實。在戰後發展的結果上，美國也同樣發生了這種事實，牠在戰後，也轉化為金利國家，而且在那裏，那些金利的階層狀態也驚人地成長了。在一九二六年，美國的利息、利息、和紅利成為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一。

「因為某些寄生國家中寄生狀態的發生，因此，國民經濟的性質，也漸次相應地變化了。生產手段的生產，以及重工業等的發展，都相對地發生了遲滯，這樣常常強力地增大了消費的生產品和消費部門等的比重，尤其是增大了那奢侈品的生產。例如，英國在一九二八年，向各部中投資的分配是這樣的情形：即，1 那些投入到菜館和娛樂場中的資本，是一千九百萬鎊；2 投入到啤酒工場中的資本，是一千萬鎊；3 商業，是一千萬鎊；4 煤炭工業是七百萬鎊；5 黑色金屬和機械製造工業，是七百萬鎊；6 軍港、航業和造船是三百萬鎊。

勞動階級的構成，同樣也相應地變化了；例如，在英國，那些從事於生產手段生產的工業部門的勞動者的比重，（把一九二三和一九二九年來比較）是低下了，而那些銀行，交易所中服務的人員的比重，却增大了。

各種工人 的比重 年 代	一九二三	一九二九
炭坑夫的比重從	一一・五%	低落至
金屬工人的比重從	一九・二%	八・〇%
勤務員的比重從	一〇・二%	增加到 一三・四%

(五)資本主義的頽廢，並不完全意味着生產力發展上的全部的停滯和後退。「如果，以爲這種頽廢的傾向，會消除資本主義迅速的發展，則是錯誤的；絕不是這樣，某些工業部門，某些布爾喬亞階層，某些國家，在帝國主義時代，是更加強力地呈示出這兩種傾向中的任何的一個（即發展和頽廢——譯者註）。大體說來，資本主義是比以前更加迅速地發展了，但是這種發展，一般說來不單單都成爲更加不均衡，而且這種不規則性特別在那些有着最強力資本的國家的頽廢上，被表現出來。」（伊里奇）這種不規則性，在以下這個情形上表現出來：即當那些年青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加拿大、日本等等）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工業增速度被提高的時候，那些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乃呈露出低落的傾向。

例如，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二五年年間，英國的生產物至少增加了百份之二十五。但是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九年間，牠一點也沒有增進，僅僅到了一九二九年，英國的工業生產物才恢復到戰前的水準（即百份之九十八）。但是，因爲受了正在開始的危機的影響，牠又重新激烈地低落了。——德國的生產物在戰前的十八年間，至少增大了百份之六十。在最近的十六年間，牠祇增大了百份之七。生產物的指數，在一八二九年平均是百份之一百〇五，而

從戰爭一直到現在，其最大的指數平均也不過祇是百份之一百〇七（從一八一三年開始）。

——美國的發展速度，雖然不是十分顯著，但是這種低落，也同樣存在着。加工工業，平均每年的增大，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一三年是百份之四·五，但是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九僅僅是百份之三·一，即說明了：美國的發展速度，也一·五倍地低落了。機械動力的成長速度的低下，以如下的比例表現出來（即，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是百份之三·六，但是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一四年，則是百份之五·五）。因此，這個開始於帝國主義大戰時代以前的獨占國家發展速度的停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更加激烈地呈露出來。的確，若果將某種期間的增大，在絕對數上來比較的話，則就是在低廉利子的場合上，那絕對數上的增大規模，也能夠比普通的，即不低落的利子的場合更加高，因為有了大的絕對額，就是低的利息，也能夠以大的絕對數來表現出來。但是若果知道：成長着的絕對水準，是說明增大了的生產能力以後，則不得不承認這種已經低落了的增加率的更加低落，祇是說明：對於生產能力利用程度的低落，即說明了生產能力增大率度的低下。

(六)殖民地的頹廢過程，同樣也是帝國主義的特徵。金利王國的成長，殖民國的增

大，都招來牠們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落後國家的榨取和掠奪的特別強化。因為牠們得到了那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和指導權，因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政府，對於公債的引受，而且也因為各種買佔，強盜式的契約，軍事的暴力和其他等等方法的影響，那些占着支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有意識地阻礙了這些從屬國的發展。帝國主義者們，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絞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而且在停滯、貧窮、頽廢上，豫定了他們的命運。中國的四萬萬大眾苟延殘喘地頽廢着。印度因為受着英帝國主義寄生的支配，而成為頽廢的國家。

不消說，這並不意味着資本主義不發展於殖民地的國家中，牠是特殊地，即以特別的形態去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是完成於原料生產的部門或輕工業部門中。原料的加工大概都在殖民地的內部進行。因為這些占着支配的帝國主義國家，非常顯著地從殖民地中絞取剩餘價值（用公債或者投資收入等各種支出的形態）。所以，並不能使這些國家經濟成為結實。殖民地，不斷地轉化為統治國農業原料的附加品，轉化為金融寡頭政治集團的進貢者，而且在停滯上，在緩慢的、和不健全的發展上，被制定了自己的命運，這種不健全的發展，

是那些統治國的全能的金融資本，對於那些被壓迫國家，實行了非常大的壓迫所發生出來的結果。

(七)因為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的深化，也因為那爲着對於分割了的世界行再分割的鬥爭的強化，所以那些爲着戰爭目的的費用，也跟着增大了。對於軍事和軍艦的支出，達到了未曾有的規模，大部份的生產人民，都被邀去履行軍隊上的各種任務，戰爭時候的損失，也達到了巨大的數目。資本主義的獨占，擴大地利用本國的內部市場，來獲取獨佔的超利潤，同時獨占，努力地驅逐外部競爭者，帝國主義國家，也努力地保證自己在戰爭場合上，所必須的一切用品。這一切的事實，都招來資本主義國家中自給自足傾向的發展，換句話來說即招來了對外貿易關係和經濟的形成，而且以牠來使國家的最重要消費，首先原料上的一切的消費，能夠由於自己的生產來供給。當生產力的發展水準，在帝國主義時期，已經使世界的一切經濟，都成爲相互關聯和相互制約，而且要求着相互關聯的巨大發展的時候，這種自給自足的傾向，必然地招來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資本主義的頹廢和寄生性，是勞働運動上機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由於資本輸出，獨占的

價格，殖民地的榨取，巨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資本集團，獲得了大量的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使資本家在一定期間，能夠以牠來買收勞動階級上層的一部。

爲着抽出馬克斯和恩格斯的信札中的要點，即恩格斯在研英國勞動運動上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資本發展的特性的關聯的信札上，伊里奇如下地寫着：「這明明地表露出原因和結果。原因（1）是英國對於全世界的榨取；（2）是世界市場上英國的獨占地位；（3）是牠的殖民地的獨占。結果（1）是英國普羅列塔里亞一部的布爾喬亞化；（2）那些被布爾喬亞所收買了的，而且從他們得到了很大收入的人，指導了一部份的勞動者。」（伊里奇：帝國主義論八章。）

同時伊里奇也由此闡明了第二國際頽廢的原因。那些大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階級大部份的上層份子和指導者們，以各種的形態（即國家機關上的收入一部，從有錢的資本家的贈物，以及在祖國前面的「績的高貴稱號」某些指導者們的政治意味的「廣告」等等的形態）而被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政治所收買。這是立在社會愛國主義，和社會熱心主義們觀點的基本上第二國際的基本幹部，他們的領袖，在戰後都轉化爲社會法西斯。

帝國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鏟除勞働運動上的機會主義。那表現出總危機的戰後資本主義，已經連對於勞働階級上層的收買，也幾乎不能夠現實了，大衆的地位，因為資本的合理化，慢性失業的增大，勞資的低下，而更為惡化。從此，下層不滿的波濤不可避免跟着增大，同時，這種增大，鏟除了資本主義國家勞働階級現在的指導者受了賄賂集團，而且引導向革命的勝利。

第三節 反伊里奇的理論

關於頽廢和寄生性的問題，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中是不存在的。對希爾芬汀的批評上，伊里奇曾經說過「馬克斯主義者希爾芬汀，在這一點上，比非馬克斯主義者哥布孫更一步後退，同時這也就是希爾芬汀的一個缺點，這一點即是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特有的寄生性」。（伊里奇帝國主義論）對於考茨基的批評上，伊里奇也曾經如下這樣說過：「考茨基，在他自己的帝國主義的「理解」上——這個理解等於塗飾帝國主義——不僅比不上希爾芬汀的「金融資本論」，（無論希爾芬汀是這樣地熱心，但是都不外守護着的考茨基，並且和社

會排斥的愛國主義相一致），而且連社會自由主義者哥布係都比不上，這個英國經濟學者雖然在馬克斯主義者的地位上，並沒有半點的請求權，然而他們却更加深刻地確定了帝國主義，而且闡明牠的矛盾……。（伊里奇）至今，從伊里奇發表了以上這些言論以來，其中許多都轉變為社會民主黨了，對於帝國主義「頹廢」的否認，已經不是單純的缺點，已經變成「組織化資本主義」理論的基石了。

托羅茨基者（首先托羅茨基本身）展開了戰後資本主義生產力停滯的理論。例如，在一九二五年初，托羅茨基曾經說過：「從理論的觀點看來，社會主義是有現實的必要的，因為資本主義不能夠發展生產力……。如果資本主義能夠發展生產力，那麼，我們的基本的診斷就含有錯誤的了。……布爾喬亞不去說明，也不能說明這個。在歐洲，生產力，並沒有發展，而祇發生了動搖和破壞……。歐洲並沒有增大生產力……歐洲的生產力一點也沒有發展」。

帝國主義的頹廢——是不平衡地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過程。不消說「這種減低生產費用以及運用技術改良的方法來提高利潤這種的可能性會影響到改革的利益上（即技術的成長上

——著者註）。但是，這種獨占所特有的頹廢和停滯的傾向，都繼續地出現，而且在個個產業部門中，在各個國家中，在一定的時期間仍然佔着優勢。」（伊里奇帝國主義論）但是托羅茨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不理解這種發展不平衡法則，同樣也不理解伊里奇所說明的帝國主義的頹廢。

根據托羅茨基的理論，則戰後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是絕對地破壞和停頓了。他暫且祇在歐洲情狀上去說明這個問題，但是從他的一般見地看來，明白地表出「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生產力」的這個意見。這和帝國主義時代，生產力停滯（即絕對的停滯）的理論（這種理論是從前由於魯森堡所創成的）一樣，是機械主義的，是不正確的。普列沃勒錚斯基的理論同樣也在這種觀點上形成的，他在自己的資本主義沒落中，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在獨占時代的制度使那增大再生產的刺激，大大地被減低了。……這一切必然地非常銳化那些在危機以前就已經存在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危機以前就已經以很大的力量破壞了布爾喬亞社會，這個布爾喬亞社會在以前就已經存在在於頹廢和生產力發展的完全停頓的狀態。」（普列沃勒

布哈林也時時引出帝國主義時代生產絕對崩壞的。例如他，在過渡時期經濟一書中曾經指出：「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歐洲經濟上的具體狀態，明白地表示出這個崩壞時期的恢復，表示出舊的生產關係制度的更生，沒有半點希望。」伊里奇對於布哈林的這幾句話曾經說過：「已經有一點太多了。解釋得太多就等於一點也沒有說明。」——布哈林又說：「……在破產着的關係（即舊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基礎上，工業的復興是絕不可能的……。」伊里奇關於這點，伊里奇也會說過「問題是在普羅列塔里亞能不能夠在這行將破產的狀態的基礎上……把牠引導完全破產。」

這種機械論的論述，僅僅在不間斷地衰頹的形態上理解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的發展，而且必然地得出關於資本主義自動崩壞的結論。這種機械論同時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反伊里奇的，掩飾資本主義，而且直接替他行述辯護的論者，這一種論述，除了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以外，在那些美國革命政黨中的變節者跟前，即在布斯敦集團中發現自己最完全的表現。

這種參加者僅僅看到生產力的成長，和帝國主義下的新發明和技術的更進的發展。

伊里奇的理論是和生產力絕對的停滯理論、資本主義自動崩壞的理論，他的連續發展和

不停的成長理論不同，這些理論是不科學的，不正確的。

第四節 帝國主義是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的一切矛盾以後，伊里奇又說：「因此，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是行將沒落的資本主義，是向着社會主義的過渡；換句話來說，那從資本主義發生的獨占，已經表現出資本主義的死亡，並且牠也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礎，帝國主義的真的勞動社會化（這種社會化被辯護者們，被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稱之謂『合同』），也同樣有着這樣的意義。」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和社會法西斯的「超帝國主義論」之間的基本的不同，是在一個否認，或者承認這個爲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前夜的帝國主義上。

馬克斯在資本論中，以這樣的方法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社會，他說：資本主義在自己發展的過程上，爲那建築於新的基礎上的，社會的形成準備了物質的前提，而且爲那向着新的社會制度的過渡，準備了必然的條件。「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所組織、結合、以及訓練的勞動階級，乃成爲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當生產力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時，當生產力和牠的資

本主義的外殼，成爲勢不兩立的東西時，資本制的外殼破裂了……收奪者乃被收奪。」（資本論）所以，我們知道這種問題已經在馬克斯的資本論中就被提出的。伊里奇把牠具體化了，而且說明了爲什麼資本主義在獨占的階段才成爲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

獨占的資本主義，使生產手段的集中達到巨大的規模，但是牠們在各個所有者之間的占有，仍然和前一樣地不可抗力和不調和。的確勞動的社會化，由於獨占資本，而帶到最高的水準，而且在同時勞動生產的占有，仍然，從前一樣和保留着私的狀態。美國在一九二五年，全企業的百分之一六，佔有了全國工業價值的百分之一六十八。獨占的資本主義，「完備地招來生產一切方面的社會化，獨占把資本家們反對着他們的意志和意識而引入到一個新的社會秩序裏去，這種新的社會秩序是從完全的自由競爭向着完全的社會化的過渡。」（伊里奇）

獨占招來內部組織的變化，也招來資本主義組織的變質。「達到了生產社會化獲得了巨大的進步……。生產雖然成爲社會化，但是所有權依然保留私的形態。社會的生產手段，依然是少數個人的財產。」（伊里奇帝國主義論）同時牠也爲那新的生產關係，即向社會主義

關係的過渡，創造了具體的物質的前提。勞働社會化和生產的集中的更進一步的進展，在資本主義的範圍中，乃遇着了難於克服的阻礙（這種阻礙，是從獨占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中所發生出來的）的時候，這種事實乃成爲更加的客觀地必然。這種爲新的社會的組織，創造了物質的前題的、生產的巨大社會化，隨而也強化了那從私的占有的存在條件中發生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附給資本主義的條件。「……資本主義發展已進到了非常高度，結果，商品的生產雖然仍然是支配着，而且依然爲全經濟的基礎，但是事實上牠已經發生了空隙……。」（前揭書書第一章）

直接破產帝國主義的崩壞，是不可避免地從帝國主義的本質中發生出來的。這個結論，也是在這個結果上形成的。「當巨大的企業成爲巨大的規模，而且有計畫地以人類的需要的明確統計爲基礎，而把基本的原料的供給在數百萬人民的總需要的三分之二乃至四分之三的規模上組織起來的時候；而且當這種原料的運輸向許多最便利的中心地點（這種中心地互相距離得數百數千基羅的）有組織地組織起來的時候；也當那些原料加工的一切階段，一直到諸種製品的生產，都被一個單一的中心，所管理的時候；當這生產品能夠很有計劃地，拿來

分配給幾千萬消費者的時候（正好像美國的美孚煤油托拉斯在美國和德國販賣煤油一樣）那麼一種生產的社會化已明顯地擺在我們面前，而決不是單純的『合同』了：同時我們也明白現在形成這種生產的社會化的外殼的，祇不過是私有財產關係以及個人的經濟。這種外殼已不能適應牠的內容，所以如果不能夠人爲地去鏟除這種外殼的話，那麼牠不可避免地要成爲頽廢，——雖然這種外殼是能夠比較長久地保持着頽廢狀態。但是最後必然的要被排除掉的（不過要是不從事醫治機會主義膿腫的瘡癆，那就得到非常不好的結果，即會成爲更加長久時間的拖延）。」（伊里奇帝國主義論）

帝國主義一切基本的矛盾，首先在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里亞間的對立關係的強化中，獲得了帝國主義的階級表現，同時普羅列塔里亞不得不從「資本主義的奴隸」中，從那對於資本主義的掃除的鬥爭和自己的獨裁，在普羅列塔里亞獨裁的強化中，去發現自己的出路。「這種矛盾的強化，是歷史的過渡時代的最強的動力，同時這個時代，是從全世界的金融資本的最終勝利的時候開始的。」（伊里奇）

在帝國主義之下，資本家和勞働者間的鬥爭，無論什麼時候都擴大着，而且，一方面那

資本主義的掠奪者和地主之間的矛盾也深化了，另一方面掠奪者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同時獨占的國家本身上間的矛盾，還有，那高度發展了工業國家和落後的國家之間的矛盾，也都被強化了。這一切必然的都強制那些革命大眾表現出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行動。

資本主義的死亡和頽廢的本質，並不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自主的崩潰和頽廢中，如果是的話，那麼就會達到資本主義自動的崩壞的結論，羅森堡托羅茨基以及柏勒沃巴拉發斯的理論都是這樣。「資本主義死滅的本質乃是存在於以下這個原因中，即因為衝突性和破局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一階段上，達到了非常的尖銳，使人們感覺到有涯的『恐怖』比無涯的恐怖恐怕來得更加好。這是意味着，如果沒有那革命的普羅列塔里亞，為着政權和資本主義掃除的鬥爭，則資本主義是不能根絕的，當資本主義沒有『失墜』的時候，資本主義絕不能自行崩壞，因為帝國主義是衰老着的，但是並不是衰老了的資本主義，牠是行將死滅的，但是並不是死滅了的資本主義」（伊里奇）

因此，帝國主義為社會主義，為勝利的普羅列塔里亞掃盡資本主義支配創造了一切

必然的前提。「在帝國主義時代，因為發展的不規則性、破局性、飛躍性，由於階級鬥爭的未曾有的銳化，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矛盾的強化，武裝突衝和破局等等的存在社會主義革命遂成為現實的必然性。」（約瑟夫）但是資本主義革命地絕滅，並不是一時的事實，而是在世界的尺度上，現實於一定時期的過程中，這個時期，即是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時期。「伊里奇把帝國主義喚之為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帝國主義把資本主義的矛盾，引導到最後的性質，引導到最終的界限，而且在這個界限上開始了革命。」（約瑟夫）

第九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第一節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生及其三個時期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也是把資本主義引導到沒落的、革命和戰爭的時期，同時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資本主義總危機發生於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戰爭時代，並且那在十一月革命的瞬間所開始的經濟界的分裂——即向着兩個營壘，兩個鬥爭着的制度的分裂上——發現了自己的表現。戰爭是向着資本主義總危機成熟的過渡。牠使帝國主義矛盾的銳化，表現出非常尖銳的性質來，在這種尖銳的性質上，使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基礎成爲不可避免。但是，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是發生於戰爭時期的這一個事實，決不意味着戰爭其本身就是革命的原因。戰爭是成熟了的危機的表現，也是強化危機發展的因素。正如同共產國際的宣言中所記載的一樣，牠形成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而且也發展了危機。爲先前階段所特徵的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

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的私的占有形態之間的矛盾的極限銳化的反射），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生上，演着重大的作用。

由於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發展的不平衡律的銳化和強化世界帝國主義矛盾的未曾有的銳化，而且也招來帝國主義的更加動搖和頽廢，同時這種動搖和頽廢，使普羅列塔里亞革命能夠勝利，而且從某一國家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爲可能。因此，世界的經濟向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世界的分離，以及在從前的單一世界的經濟範圍內相互地展開鬥爭着的兩個敵對制度的出現，乃成爲總危機的基本表現，並且是危機的更加深化的最重要的因。「自從我們國家中的普羅列塔里亞得到勝利以後，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世界革命的時代，一個充滿了衝突和戰爭進攻和後退，勝利和敗北的時代，而且在那最重要的國家中招來普羅列塔里亞勝利的時代開始了。」（約瑟夫）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的銳化，招來世界經濟的某些部門中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這個不平衡性也喚起了「某些國家中，革命發生時期的不同。」（共產國際宣言）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展開於一切歷史時期的延續上。在這個時期間，革命經過各種發展階段而進行着。

「自從第一次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國際勞動者運動，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各種不同階段而體受各種歷史的發展局面。」

「第一個時期——即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最尖銳的時期，也是普羅列塔里亞直接革命地進攻時期。一九二一年，是革命的發展，達到了最高點的時代；這個時期，一方面由於蘇聯對於內部反革命，以及外部的干涉勢力的克服，由於普羅列塔里亞獨裁的鞏固，和共產國際的形成所終結，另一方面，由於西歐普羅列塔里亞的許多主要失敗，以及布爾喬亞的總進攻的開始所完成。一九二三年的德國普羅列塔里亞的失敗，是這個時期的最後的一環，這種失敗遂成爲第二時期的出發點——在這個時期中，資本主義制度不斷的呈現出部份的景氣，資本主義經濟，也呈現出復興的過程，這個時期，是資本進攻以及更進一層的防禦戰爭的擴大和發展的時期。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也是蘇聯迅速的復興過程，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大成功的時期，而且同樣，也是普羅列塔里亞大衆中，共產黨政治勢力成長的時期。最後，第三個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大體向着戰前水準推進的時期，而且蘇聯經濟的差不多同時也在這個水準上出現了（即被稱爲再建的時期開始，却在新的技術的根基上，開始了社會主義經

濟形態的更進一層成長）。因此，在世界上二個對立制度的分裂上，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狹隘狀況之下，在擴大着的殖民地運動和革命以及市場容量縮小等等的狀況之下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向着戰前水準的出現這個事實，不可避免地招來未曾有的世界經濟危機的迅速成長，招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重新銳化。右翼機會主義者們，把這第三個時期理解爲資本主義的新的興盛時期，爲『技術革命』的時期，這種理論的錯誤，已經由於第四次共產國際會議的決議所強調了；在這個決議中，他們曾經給與這個第三時期以一般的特徵。

「這個第三時期，特別激烈地銳化了生產力和市場的狹隘間的矛盾，同時使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反對蘇聯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以及巨大的階級鬥爭的新的延續，成爲不可避免。這個時期銳化了一切國際的矛盾，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間的矛盾，還有這個在實行瓜分中國的基礎上對於華中的武力侵略和帝國主義間的鬥爭等等都被銳化，而且也銳化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勞動階級大衆的左傾過程以及階級鬥爭的銳化等等），同時擴大了殖民地的運動（例如中國、印度、埃及、西里亞等等），這個時期因爲資本主義安定的矛盾更進一層發展，不可避免地招來資本主義安定的更進一層

崩潰，也招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激烈的銳化。」（約瑟夫）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這三個時期的特徵，尤其是第三個時期的特徵，在一九二八的秋天就已經被規定了。過去的幾年來，事實很好地證明了馬伊的理論對於第三時期傾向和性質的分析是正確的。在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資本主義以自己的一切本質、背景、以及銳敏，而進入了周期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未曾有的長久性的波潮。這個被展開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和範圍上的世界經濟危機，證明：牠是資本主義制的危機時代。同時，這種資本制的危機，又深化了這個總危機。在這個危機的時代，資本主義相對的安定終局了。——爲着要闡明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合法，所以我們必需詳細地攷研牠的性質和牠的發展過程。

第二節 世界經濟的分裂和二個制度的鬥爭

「世界經濟，向着資本主義國家，和正在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兩方面分裂了，這個事實是資本主義制最深刻危機的基本表現。」（共產國際宣言第五章）「爲國際革命策源地」的蘇聯，是有着種種的作用。蘇聯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着重要的意義。資本主義

世界和建設中的社會主義世界同時存在的這個事實，表現了資本主義的過熟，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危機。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凱旋以及由於凱旋所喚起的國家巨大的經濟的旺盛，表現了蘇維埃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為偉大的優越，以及資本主義全般的無組織性。這種二個制度的對立地成長，乃成為資本主義崩潰的最重要的因子，因為，牠鼓動了殖民地以及強國中民衆的革命，推動他們向那爲着政權的鬥爭，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榨取，帶來了一切經濟上和世界資本主義許多國家的、國際的、以及內部關係上的動搖和不安定的要素。在我們國家中普羅列塔里亞獨裁勝利的這個事實，以及在全世界的普羅列塔里亞的前面關於自己根絕這種資本主義組織問題的實際的成功，演了而且還在演着巨大的革命作用，而且把成熟了的革命引導向一定的道路邁進。

蘇聯對於殖民地世界的影響，也爲這許多條件所強化。首先，在亞細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友邦蘇維埃國家的出現是有着巨大的意義的，因為這個事實，使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成爲容易。若果，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等，仍然生存於帝俄的鐵鎚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鐵砧之間，那麼，在這些國家中民族解放鬥爭要非常地困難！

蘇聯對帝國主義國家鬥爭的勝利，以及對於他們不依存政策的勝利都給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以很大的影響，這些事實告訴殖民地國家從帝國主義的壓榨中解放出來的方法，而且使那些被帝國主義國家權力壓迫的國家，成為不安靜。蘇聯的民族問題的根本的解決，也有着重大的意義。蘇聯告訴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被榨取的少數民族，以及殖民地的國民，問題的確定的解決，祇能現實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上。

加之，世界經濟向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兩方面的分裂已經把地球上有着牠的自己的自然財富和人民，以及六分之一的部份，從資本主義的榨取中除外了。帝俄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的投資，商品販賣市場低廉的原料源泉等等，是曾經有過巨大的意味的。從投入到俄國的資本中資本主義每年獲得了大量的利潤。因此把地球六份之一的部份，從帝國主義的榨取範圍中，除外的這件事實，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是非常的不利，這個結果也增大了帝國主義的狹隘。帝國主義的伸張以及向着最後階段的資本主義的榨取範圍的狹隘，銳化了那些爲着地球的其餘的六份之五的鬥爭，而且使成長着的矛盾底全面的，和部份的解決，都成爲非常困難。

國際布爾喬亞，以及他們的經濟學者和政治的活動者，痛罵那由蘇聯的商品輸出，所創成的而且由於蘇聯投賣所發生的給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威脅。我們很容易用事實說明：這些反蘇聯的非難的一切亂說和難容的說話。我們知道：在一九一三年，帝俄在世界輸出上的比重，是百分之三·五，而在一九三一年，蘇聯在世界輸出上的比重，僅僅是二·八。在一九三〇年，所輸出的亦僅僅是戰前輸出的三分之一（用戰前的價格來計）。

這個並不是說：蘇聯對外的貿易，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銳化上一點也沒有作用。但是，不消說，這種輸出的作用並不和他們所想像的傾銷和輸出的規模，有什麼關聯，而是和牠的發展的具體條件和構成的特性有關的。許多年之間——即內戰爭在內戰後的一年間——蘇聯的輸出，差不多完全的停止。國家的競爭者們，在這個時候獲得了蘇聯在世界市場的地位。如果蘇聯不斷的恢復這種地位的時候，則必然使這些國家的某些經濟部門的競爭者，成為惡化。因此，蘇聯輸出的復興，正遇着而且遇着了資本主義集團的激怒和惡感。同時，蘇聯輸出構成的變化，也給與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以某種的影響，因為蘇聯的輸出，是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有着關聯，在帝俄時代工業輸出，僅僅是全輸出的四分之一，而在蘇聯最近幾年

間，則超過了全輸出品半數。

的確，蘇聯的輸入是成長在蘇聯輸出的基礎上，即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生產物的販賣市場而被擴大。但是，第一、這種輸入，在蘇聯外部商業獨占存在的影響之下，在資本主義國家方面並不能夠如同從前一樣地獲利；第二、向蘇聯的輸入的構成，在國家工業化的結果上，更加地被變化了，而且這種變化了的事實本身，替資本主義國家某些工業部門的競爭者，帶來了不安定的本質。

這裏必需更加指出：那作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深刻化要因的，蘇聯對外貿易的作用，並不能夠實現於現在的貿易額之下，要是將牠拿來和那些深刻化了的戰後資本主義的其他的條件，來比較的時候，將成為更加的明瞭。因此我們知道布爾喬亞，努力地將世界市場上競爭銳化的責任，轉嫁到蘇聯輸出的這件事實，不過祇是想要從那些隱藏在戰後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中，拉出勞動大眾的注意。

蘇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深刻化上的實際作用，並不完全在於「傾銷」、「宣傳」等等。他如凱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的存在，以及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不依存政策這些事實，都

演着重要的作用——因為蘇聯，是普羅列塔里亞獨裁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是勞動階級的巨大侵服地的國家，是勞動者和農民聯盟的國家，也是馬克斯主義旗下的新文化的新國家，所以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切被榨取階級的世界運動的策源地，成為國際革命的策源地，成為世界歷史的最重要的事實。」（共產國際宣言）

第三節 在總危機時期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特性

（一）國際革命過程

如下的這些事實，是總危機時期中的最重要的特性：即「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世界經濟的唯一的制度，因為隨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存在，那社會主義制度也同時隨着存在，後者成長着、進步着，而且和資本主義的制度相對立，牠用其本身存在的這個事實，來表示資本主義的腐敗，而且，以牠來使資本主義的基礎成為不安定。」（約瑟夫）

十月革命，為國際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建築了基礎，牠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所特徵的，革命連環中發端的最初的一環。世界資本主義，在自己的歷史上，曾經體受過許多革命的

波濤，但是在這些波濤中，牠從來沒有體受過像十月革命以後所發生的那樣緊張的革命波浪。

「在世界資本主義強烈動搖的基石上，也在階級鬥爭銳化的基礎上，而且因為普羅列塔里亞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所以無論在歐洲大陸，或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中，都發生了許多革命以及革命的表現，例如：一九一八年正月，在芬蘭發生了勞動者革命；一九一八年八月，在日本發生了所謂『米穀的暴動』；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奧大利和德國都發生了掃蕩半封建君主的革命；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匈牙利發生了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在朝鮮也發生了暴動；一九一九年四月，在巴威略地方出現了蘇維埃的政權；一九二〇年正月在土耳其發生了布爾喬亞國民革命；一九二〇年九月，在意大利發生了勞動者對於工廠的占領；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德國發生了蒸氣勞動者暴動；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發生了保加利亞的暴動；在一九二三年秋季，在德國發生了革命的危機；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發生了愛沙尼亞的暴動；一九二五年四月，發生了摩洛哥暴動，同年八月又發生了西里亞的暴動；一九二六年正月英國發生了總罷工；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維亞納發生了勞動者的暴動。一切這些事實，最後，還

有印度的暴動，以及在印度的深刻的動搖，和那振動了全歐洲大陸的中國大革命等的事件，都是國際革命連環中的一環，這些連環，形成了資本主義最深刻的總危機的一個構成部份。這種國際的革命過程中，包含着那些普羅列塔里亞爲着獨裁的直接的鬥爭，也包含着國民解放鬥爭和殖民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暴動，同時，這些殖民地的鬥爭和民族解放的戰爭，都和百萬萬的農民的農村運動有着特別的關聯。以這樣方法，把一切人類大衆，都引向革命的急流中。」（共產國際綱領第二章第一節）

在國際革命的發展上，隆盛和衰退，勝利和敗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雖然敗北，也並不能阻止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擴張和廣大，因爲牠並不能夠排除如下的這個事實：即，把帝國主義的矛盾，引導向最高峯的這個事實，這個最高峯不可避免要喚起革命的發展和成熟。

(二)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的銳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招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的許多深刻的進展，這種進展一方面表現出發展不平衡律底極其銳化的特別現象，而且另一方面招來這種不規性的更加

強化，而且也喚起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安定性的崩潰。

戰爭非常銳化了資本主義國家工業成長的不平衡性，當時，在那些加入了戰爭的歐洲國家中，發生了或多或少的生產的縮小，但是在那些稍稍參加了戰爭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以及某些中立的國家中，還有那些殖民地和保護領中戰爭強化了生產機關和牠的能力的成長。

在戰爭的影響之下，美國發生了經濟和金融權力的飛躍的成長。歐洲的國家向美國提出了大量軍備、生產工具、以及消費物的需要，美國的輸出，在戰爭的數年間顯著地增大了。依據國聯經濟委員會的統計，則從美國所輸出的實際金額（用一九一三年價格來計算）從二億四千萬美金（一九一三年）增加到三億四千萬美金（一九二〇年），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加工工業生產物的數量，把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一三年來比較，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鑄山工業的生產物，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年數同上）。同時，隨着美國生產能力的增大，在和牠有着不可分的關聯上，牠的金融能力，也必然地隨着而增大了。美國的資本，因為利用了戰爭時代的條件，以非常昂貴的格價把商品向歐洲賣出，在這個時候，從美國所輸出的金

額，一九一三年起到一九二〇年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但是牠的公稱實額，差不多增大到三倍半（即從二百四十萬增加到八百零十萬美金）。這些同盟者，爲着這些商品，從美國借了百億美元以上的巨款。因此美國遂從戰前的輸入國，而轉化爲有着強力資本輸出的國家。外資向美國的投入，在戰前差不多達到了五億美金。這些變化已經爲美國一切戰前的發展所準備。——戰爭的類似影響，也表明在日本的經濟上。日本，也和美國一樣在戰爭的條件上，發生了人家對牠商品的巨大的需要。除了那些加入戰爭國家的需要以外，因爲歐洲商品輸出的減少，也激烈地增大了日本商品在亞洲大陸上販賣的可能性。

日本的輸出在戰爭的幾年間，迅速地增大了。在一九一九年，牠達到了二十億零五千萬圓，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牠僅僅祇是六億二千八百萬圓。日本的賣出價格的指數，將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三年比較，則增加到百分之九十六，而在一九一九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非常顯著地表現出從日本所輸出的金額的增長。因此，我們知道了日本的生產能力，在戰爭的幾年中是激烈地增大了。日本的採集工業以及加工工業的生產物（一九一四年的情況來計算）從七億六千七百萬圓（一九一三年），增加到十一億七千五百萬圓（一九

一九年），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因此，鐵製品在這個時期中差不多增加了二倍，銅製品也增加了二倍，工業上的機器動力，在這個時期中，從八十三萬六千馬力增加到一百四十六萬五千馬力，發電所的能力，從二十八萬三千馬力增加到一百一十五萬四千馬力。

加之，在戰爭的時期，那些宗主國向殖民地所輸出的商品，更激烈地縮小了。因此土著的工業，乃一時地從宗主國的競爭中，被解放出來，所以也表現出顯著的成長，不消說，這種成長不過是一時的，同時，在這個時期中，更因為宗主國有著軍事和政治的顧慮，所以並不能阻止這種進展。

在中國，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間，煤炭的生產從九萬三千噸，增加到十九萬四千噸，鐵的生產，在這個時期中（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〇年）從十萬噸，增加到四十萬噸。在機械工業上，紡錘的數目從八十三萬一千個（一九一一年）增加到一百七十四萬五千個（一九三一年），即增大了兩倍以上。因此中國企業，特別迅速的成長也是戰爭時期的特徵。在印度，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間所生產的煤，從一萬六千七百噸增加到二萬三千噸，銅的生產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三〇年從六萬三千噸增加到十五萬八千噸。在纖維工業上織機的數目

從八十五萬七千架（一九一二和一三年）增加到一百零九萬四千架（一九一九年），黃麻工業上的機械，從二萬四千萬，增加到四萬一千。工業顯著的增大，也發生在許多其他的國家中，尤其是英國的屬地中。關於工業上最重要設備的統計，是這種增大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加拿大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工業上最重要的機器設備，增大了三倍又三份之一，在澳洲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增加了三倍，在非洲，從一九一五年和一六年，到一九一二和二三年間，增加了二倍又六分之三。

同時戰爭，在某些加入了戰爭的歐洲國家中（例如德國、法國、比利時等等）招來了工業的一部份的破壞，而且也招來了加入了戰爭的一切歐洲國家中工業生產的縮少（不消說這種縮少也是不均等的）。例如，法國工業生產的指數，一九一三起到一九一九年止，從一百減低到六三。德國的鋼鐵生產，在一九一三年，是十七萬一千噸，而在一九一八年是十三萬二千噸，在法國同樣地從四萬七千噸，減低到一萬八千噸等等。同樣的事實，也發生在世界農業經濟上。在戰爭的時候，農業生產，在歐洲是顯著地縮小了，例如，戰爭的五年間，小麥的收穫，在歐洲（其中除去了俄國）平均每年是二億七千九百萬平方公畝，而在戰前的

最後五年間，平均每年是三億四千九百萬平方公畝。同時因為戰爭的結果，歐洲國家對於農業生產物的需要遂激烈地增大了。從而，也喚起價格的激烈地增長。例如小麥的價格，在戰爭的時候增大了三倍。

在需要的增大和價格的高漲的影響之下，海外的國家，尤其是加拿大、美國、澳洲、阿根廷等國家中，播種的面積顯著地擴大了。在加拿大，小麥的生產在戰爭的五間年和戰前最後五年相比較，則增大了百分之二十七，在澳洲增大了百分之二十五，美國增大了百分之二十二，阿根廷增大了百分之十。這種生產物的增大，往往是用對於那不大肥沃的以及更加需要改良的土地的加大的方法來完成。這種土地的加工，在最低廉價格水準下是不能夠做到的，因此，這種耕地的擴佈，是輸出增大所附給牠的條件。例如，從美國所輸出的小麥，在戰爭的五年間，平均是四千一百萬平方公畝，而在戰爭前的五年祇是一千三百萬平方公畝。從加拿大的輸出平均每年是二千三百平方公畝，而在戰爭五年前每年只是二千萬。在一九一六年從加拿大的輸出，就已經達到了五千二百萬平方公畝，而且在一九一六年，從美國輸出的就達到六千六百萬平方公畝。因此，戰爭使農業中心更加激烈地向那些海洋國家轉移。

——以上所引出的那些世界工業的變化，本質地表露出一個國家，在某一階段上，用驅逐其他國家的方法而飛躍成長的。這種成長的特性是存在於那些由於戰爭所喚起的世界經濟衰弱背景之中。

在上面所述的，那些關於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性的本質和特徵問題的時候，我們已經述過了這種由於戰爭所喚起的不規則性的新的銳化，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縮少的影響，又由於世界市場狹隘的關係，所以，乃成為那些為着奪取販賣市場，原料源泉等等而發生出的鬥爭的破局銳化底原因，因此由於同志約瑟夫在第十五次黨大會席上，所指出的關於那為着奪取販賣市場和資本輸出而鬥爭的問題，獲得了重要的意義。

「我們能夠看到那些飛躍向前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同時我們也看見那些經濟衰落了的國家（例如英國）。我們看到成長着的德國，以及那些在最近幾年來擡頭着的新興國家（例如中國、加拿大、奧大利、阿根廷、和印度），我們也看見那安定了的國家（例如法國和意大利）。販賣市場上強奪者的數量雖然增大，生產可能性和供給雖然也增大了，但是那些市場的容量和勢力範圍境界，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舊態。」（約瑟夫）

(三) 市場問題銳化的新階段

一般市場問題的銳化，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特徵。獨占價格驚人的增長，實際工資的低落，金融資本對於農民各種各樣的榨取，對於殖民地國民的收奪，以及無情的榨取，還有那保護關稅之驚人的成長等等——一切都使那些生產的可能性和大眾購買力間的矛盾，迅速地增大了。

因為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影響之下，帝國主義的這些特徵，以未曾有的規模和未曾有的形態呈露出來的緣故，而且也因為以上所指出的那些發展的不平衡性、戰時和戰後從那些為着爭取商品販賣市場、資本輸出的再分割而發生出來的鬥爭獲得了尖銳的性質，所以戰後的資本主義時代，市場的問題乃獲得了未曾有的尖銳性。

在戰後的時期，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生產機關以及牠的能力，都迅速地恢復了，這裏必需強調的是戰爭使歐洲許多國家中的新的工業部門（如同化學、以及飛機工業等）達到了成長的這一件事實。隨著軍事技術的成長，也或多或少地刺激了許多國民經濟上技術的發展。除了這些以外，某些加入了戰爭的國家也為重工業的興盛建築了基礎。例如，在戰爭的幾年間，

意大利的重工業開始顯著的發展，而且，牠也強化了法國的重工業的發展。一切這些使多數歐洲國家都能夠比較迅速地復興了，而且使牠更加超過了戰前的生產力的水準（這裏暫且不論那戰前生產的數目是怎样緩慢地被恢復的這一件事實），但是因為牠們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被美國、日本等等的工業和農業，所侵奪了的緣故，而且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市場的容量，因為那土著工業成長而成為狹小的緣故，所以歐洲國家的工業和農業的復興，乃和前面這些事實發生了衝突。這些衝突，必然非常地銳化了市場中的競爭，也銳化了資本主義強國間的矛盾，而且招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機關的破壞。

然而，隨着戰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機關的成長，同時。發生了國民大眾的貧窮化，這種貧窮，不可避免地減低了他們的購買力。獨占的成長，以及那獨占價格支配傾向的強化，還有許多國家中長期的通貨膨脹，以及那由於生產機關的破壞而發生的不斷的失業增大等等……一切這些都使多數國家，發生實際的工資向戰前水準以下而低落的這個事實。隨而在通貨膨脹時期中，因為那些小布爾喬亞的蓄積，也被收奪的緣故，同樣也減低了他們的購買力。農民的購買力，在許多的國家中，因為那由於戰爭所喚起的農民經濟的衰落，

以及牠們借債的增加，也同樣而低降了。最後，因為從國家戰費中所發出的公債的增大，對於國民大眾購買力的低降，也給與很大的助力。因此美國、日本等成長了的生產機關，以及那些歐洲國家中的復興了的生產機關，在戰後時期，一塊兒都碰到市場問題銳化的麻煩。

因為要努力回復自己從前世界經濟上的地位，所以歐洲各國的工業乃用生產的合理化的方法來猛烈地減低生產費用。歐洲國家的競爭者們拼命地採用這種合理化，以圖強化和擴張自己的地位。同時這種合理化，也為那生產手段的販賣創造出一時的增補市場，從而又更加提高了工業的生產，換句話來說，即銳化了那為着販賣市場的鬥爭。「市場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基本問題的這個事實，是生產可能性的增大和市場相對縮小之間矛盾的基礎。一般販賣市場問題的銳化，尤其是那國外市場問題的銳化，還有那為着資本輸出而發生的市場問題的銳化等等，都是資本主義今日的狀態，工場和工廠的停閉乃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這個事實，也可以用以上這些事實來說明，關稅壁壘的強化，更是火上加油，想要將市場問題來求和平的解決這一件事實，並不發生而且也不能夠發生任何結果。」（約瑟夫）

（四）資本主義強國間矛盾的銳化

從市場問題所發生的矛盾，和那死亡着的資本主義矛盾的全體系相結合了。首先在戰爭的時期，發生了獨占的更進一層的成長，金融資本以及金融寡頭政治的更進一層的強化。我們知道，獨占的成長並不排除競爭，而且反而強化了競爭。因此在戰爭的時期，獨占的成長強化了世界經濟上的競爭。因為競爭招來勢力關係上本質的變化的緣故，所以極度地銳化了那從資本輸出所發生的鬥爭。國際信用關係和賠款問題相結合的這個事實，更加擾亂而且強化了那從資本輸出而發生的矛盾的全體系。戰爭執行了世界再分割的任務，這種再分割是和勢力關係相適應，但是這個再分割也更加深化而且銳化那為着世界再分割的鬥爭所發生的一切矛盾。

伊里奇在其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席上，曾經如下地說過，「這種戰爭是為着全世界的再分割而實行的，戰爭是因為那些大國家中的任何一國（例如英國或德國等等——）為要獲得對於全地球的榨取、掠奪、屠殺的權利和可能性而發生的。大家都知道戰爭是在英國的利益上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這個戰爭的影響，我們看見全資本主義矛盾無限量地增大。戰爭差不多將四萬萬的地球上居民，即刻投入了和殖民地相類似的地位——我希望諸君都記着世界的

這一幅圖畫，因為那些招來革命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一切基本的矛盾，以及那在勞動運動上的一切矛盾（正因為這個勞動運動上的矛盾，乃招來了我們和第二國際的無情的鬥爭）——一切這些的矛盾，都和地球上分配有着關聯。」

伊里奇所說的，「帝國主義一切基本的矛盾是和地球居民的分配有着關聯」的這一句話是從伊里奇帝國主義論中所得到的結論。為要給戰爭的結果以一個特徵，所以伊里奇這樣地指出：地球的再分割不僅沒有減少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且反而未曾有地把牠銳化了。首先更銳化了那些戰勝和戰敗國間的矛盾。隨而，也使戰勝國本身間矛盾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要是承認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以前，英國和德國之間的矛盾是重要的國際的矛盾，那麼在戰後英美的矛盾要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最重要的矛盾，而且同時法國和德國之間，美國和日本之間，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間的矛盾，也都非常地銳化了。在戰爭的方法之下，一部份帝國主義強國在某一階段上驅逐了其他的國家，而獲得了飛躍成長的可能。但是發展的不平衡性的強化，以及資本主義矛盾的銳化，把資本主義引導向更高的階段，在這種高度的階段之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爭。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軍事工業的康邨和合併拿獲得了重大的意義。近代經濟的危機，更加表現出這種不感受到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工業的主導作用。在這種原因之下，戰後法國的蘇勒伊鐵爾克里蘇康邨以及在捷克斯拉夫的蘇可等康邨，都獲得了驚人的成長。另一方面，維克斯安斯脫蘭軍事工業的集中，是帝國主義軍事工業達到高度階段的一個明白的例子，這一個維克斯安斯脫蘭托拉斯，是在一九二八年由於英國的兩個最大的軍事工廠——即維克斯有限公司和安斯脫蘭·維特渥——所結合而形成的。

(五) 民族解放鬥爭和殖民地的暴動

「殖民地的革命過程，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最本質的現象和事實。『這種殖民地的革命過程，把地球上大多數的住民，都引入到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過程，以及那些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和殖民地暴動的波濤」，都是戰後時期的特徵。這種革命過程、解放戰爭和暴動的規模，不消說是世界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民革命運動的旺盛，在某種階段上，是戰時殖民地工業發展的一

個表現；這種發展強化了革命運動中普羅列塔里亞的意識和比重，隨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促進了農民大眾以及都市小布爾喬亞中某些階層的崩潰和普羅列塔里亞化，而且也使牠們走向革命化。加之，因為世界市場的容量狹小，本國對於殖民地的壓榨，也更加被強化了，同時這個事變，事實也演着重大的作用。帝國主義國家拚命地用那強化殖民地榨取的方法來挽回這種由於戰爭所喚起的大量財富的損失，一切這些事實，都強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中那種帶着破壞性的政策，而且也助長牠們之中中國民革命運動的成長。由於戰爭的影響所發生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動搖，更加強化了這個過程。

戰後的農業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構成的一部份，這種農業危機的發展，在戰後也演着特別重要的作用。牠以很大的力量來壓迫數百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農民，同時牠也給殖民地大眾的革命化，以非常大的影響——蘇聯的存在和勝利着的社會主義建設，也給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旺盛以巨大的影響（同時這個事實也演着重大的作用）。

在一切這些條件的影響之下，若干半殖民地國家（例如土耳其和阿富汗）反對帝國主

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發端，乃成爲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同時，在許多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例如中國、印度、和印度羣島等）民族解放鬥爭的長久性以及那些到如今還繼續着的許多殖民地（例如，印度羣島、西里亞、摩洛哥）的暴動也都是帝國主義總危機時期的特徵。這種民族解放鬥爭和殖民地運動的旺盛，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現象，而且也是這種危機的更進一層深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因子。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鬥爭，使帝國主義國家不能夠再實現他們在這些國家中所榨取的超額利潤，在革命暴動的時期，大部份殖民地完全從帝國主義的榨取範圍中被除外了。一切這些，縮小了世界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根基，而且，使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銳化了的矛盾的解決，成爲特別困難。

(六) 企業的倒閉、不斷的大規模失業、傷勞動大衆的貧窮化

工廠慢性的倒閉，以及不斷大規模的失業，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主義總危機明白的表現。戰後的資本主義時代，工業的固定資本，通常就是在比較旺盛的年間也只堆積着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在許多的部門還比這更要少。因此，就是在市場景氣的

時期，失業也仍然維持着很大的規模——這種規模在戰前的資本主義時代，就是在危機和不景氣的時候也從沒有發生過的。

英國，從一八六〇到一九一三年間，工會會員中失業數目的比例，僅僅只有一次達到了十·七（即在一八七八年），在其他的危機和不景氣的時期中，失業的比例，平均每年是擺動於六到九的境界中，而在景氣和繁榮年間，牠通常是擺動於一到三的界限中。然而在戰後的時期，工會會員中，失業人數的比例，就是在最繁榮的年頭也從沒有比七更小，失業多半擺動於工會會員中的百分之十到十二的界限內。在目前的恐慌中，英國的失業，達到了未曾有過的規模（全失業的人數，平均是在失業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一到二十二，此外，部份失業的人數不消說是更大），這種失業的規模是英國歷史上（其中除去產業革命的時代）所未曾經歷過的。

德國在二十世紀的最初的十年間，工會會員中失業者的比例，每年是擺動於二到三的界限中。然而，從一九二三年開始，牠就是在景氣的時候也站在戰前危機年間那樣的水準（一九二五是百分之六·七，一九二七是百分之八·七）上，在不景氣的年頭，牠低落到很低的

水準之下，這種水準，就是在戰前的危機的年間，也不常看到的。例如，在一九二六年，牠每月都是擺動於百分之十四到二十五的限界間，平均全年是百分之十八。在戰後，德國部分的失業，同樣達到了戰前從來未曾有的規模，這種部分的失業，在戰前差不多是不存在的。以上所記載的那些景氣年間，牠雖然降低了，然而仍然是保持着異常高度的水準（在一九二五年是百分之八・六）在不景氣的時候牠增大到巨大的規模（在一九二六年是百分之十六）。在目前危機的時期，失業的規模達到了德國歷史中所從未有的程度。工會會員中，全是失業的比例，就是依照政府對於工會的調查，在一九三三年的開頭，也達到了百分之四十六。二，部分的失業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二・七。依據其他的統計，失業的比例，還比這更要高得多。

在美國，工會會員中失業的比例，在戰前景氣和旺盛的年間每年是擺動於一到四的限界間。然而在戰後時期，失業的規模，就是在景氣的時期也仍然停留在危機年間的水準上，而且屢屢超出這個水準。例如，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度，失業的比例每月都是擺動於九到十八的限界中。在目前危機的時代，美國工會會員中全失業的比例，在一九二三年初，達

到了百分之三十四，部分失業的比例，是百之二十。並且我們切不要忘去了這個美國的工會單單祇是由於熟練勞働者的上層者們所結合而成的。在那些沒有被組織的大衆中，失業的比例無疑地是更大。

如我們所知道，失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必然的伴侶。產業勞働預備軍的不斷的再生產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內在法則以及牠的性質所制約的。但是戰後的資本主義的失業預備軍的規模，是遙遠地超過總危機時期以前的失業規模，這種失業的規模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增大而成長的。問題不僅僅祇在戰後勞働預備軍的絕對的和相對的增大這個事實上，而且也存在於如下的事實中：即這種豫備軍已經和戰前的資本主義不同，因為就是在景氣的年間，牠也不能夠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被縮小而且還創造出不斷的失業。

馬克斯把人口的過剩分爲三個基本形態——即流動的、隱蔽的、停止的三個形態。人口過剩流動的形態，依據馬克斯的意見，則是由於大量的勞働者有時被辭退，有時被雇用這個事實所造成。所謂隱蔽的人口過剩者，乃是意味着農村中的過剩人口，這種人口過剩的範圍，

僅僅等到其排出口很大大地開放的時候，才成爲顯明。」（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停止的人口過剩，依據馬克斯的意見，則表現爲「工作着的勞動軍的一部份，但是他們的職業是非常不規則。」（前揭書）

我們非常明白地看到，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本質地變化了這些人口過剩形態中的性質和比重。人口過剩的流動形態，在那被辭退的傾向勝過被雇用的傾向的這種關係下受了本質的變化。由於這個結果，非常的增大了停止失業的形態。並且，因爲這種停止失業之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半失業者即部份地工作着的勞動者的緣故，所以牠的性質也被變化了。那些從事於工業中的勞動者的數目向着減少的傾向，是曾經發生於若干國家中。例如，在美國從事於工業中的勞動者的指數，如下地變化了：即，一九一九年是百分之百，一九二〇是百分之九〇，一九二三是百分之一百〇四，一九二四是百分之九十五，一九二五是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二六是百分之九十六，一九二七是百分之九十二，一九二八是百分之九十。這些的數字證明：那些從事於工業中的勞動者數目，在美國是明白地表現出減少的傾向。戰後的英國和德國也同樣有這種傾向，雖然在那裏牠祇是非常微弱地被表現出來。最後慢性的農業危機，也

招來了隱蔽人口過剩的驚人的增大，這種增大的程度，使這種隱蔽的人口大部份都明顯地表現出來。由於這些結果，戰後資本主義出現了大量的絕對過剩的人口，他們就是在景氣的時候，也找不到工作做。

近代失業的絕對數字，以及在近代危機以前的失業數字，僅僅祇反映出這種大量人口過剩的一部，這種人口的過剩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個特徵。在這些數字中，單單明白地表現出流動人口過剩和停止的人口過剩的一部份。那些隱蔽着的人口過剩的驚人的成長以及停止的人口過剩的另一部份，都是在這個反射的數字中，所不能夠達到的，即所謂不能夠計算的。這一切，都必然地在近代失業的絕對數字的研究之下被顯示出來。四千萬失業者這個數字是近代世界失業的特徵。這個數字與其說是反映失業者絕對的規模，倒不如說是反射其近似的數目。如果我們知道，這個數字是不能夠表現出關於半失業者以及失業的農夫的統計，而且也不能表現出關於亞洲和非洲國家的統計，那麼使我們更加明白這種情形。

在戰後的全時期中，大量的不斷失業是由於以上所敘述的那些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性所喚起的，這個總危機的特性，即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景氣，市場的不景氣，生產機關成

長的極其不平衡，以及保護關稅的成長，還有自給自足的成長等。這個快將死亡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特性使牠在某些國家中，就是在景氣的時期，也使生產不能夠迅速地成長，結果不能夠把現存的勞働力，引入到生產過程中，戰後工業的合理化，也給與勞働力的節省以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特殊性是由於以下這種事情所喚起，即由於這種合理化是實行於資本主義頽廢的條件上這個事實所招來。因為把人力以機器來代用，所以，強化了勞働強度，戰後的合理化，解除了大量的勞働者。然而，如上所記載的這些條件，又排除了生產迅速成長的可能，致不能夠重新把這種失業軍，引入到生產去。因此，形成了慢性的失業軍，這種失業軍，就是在景氣的時期也不能夠發現自己的應用。

不斷失業，乃成爲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般現象，同時牠本身成爲危機深化的因素。這種失業，首先剝奪了普羅列塔里亞大部份的收入，而且減低了他們的購買能力。隨而失業也使資本家，得以加緊去壓榨那些工作着的勞働者，即援助了資本家以低廉的工資來對於雇用他們，這樣也更減低了市場的容量，最後失業也給與國際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以牠大的影響，而且強化了牠們活動的能力，因此更加銳化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大規模的慢性的失業，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中，促進大眾貧乏銳化的一個重要因素。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普羅列塔里亞的絕對的貧窮化，在資本主義總危機中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隨着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中失業的增大，同時也發生了工資的暴落，尤其是熟練勞動者工資的低下。假使在資本主義中，一般的工資就已經比勞動力更要低廉的話，則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勞動力的價值和工資之間的剪刀形也必迅速地成長。

因此，一方面，大量的生產手段失去了功用，另一方面，大量的勞動力失去功用，都是資本總危機時代的特徵。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近階段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阻礙了大量生產力的結合，而且在失去了作用上，預定了牠們的運命——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最重要的特徵，馬克斯用以下這句話，在這個性質上發現了最明白的證明，即這個「從生產力發展形態所生成的生產關係在發展的某個階段上遂轉化為生產力的枯竭。」（馬克斯）

（七）周期發展底性質的變化

更之，戰後資本主義周期發展的性質的變化，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極其本質的特徵。總危機，並不絕滅資本主義周期的發展，而是激烈地變化了牠的性質。以下所引出的表（在

這個表中指出了在戰前時期的一定斷片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物的指數（旁邊有一橫的，是表示生產低下的年度）。

工業生產物的指數（1928年=100）

國別 年代	美 國	德 國	法 國	英 國	波 斯	瑞 士
一九二四	八五·六	六九·〇	八五·八	九四·八	—	九四·五
一九二五	九三·七	八二·三	八五·〇	—	七二·五	九六·四
一九二六	九七·三	七八·九	九九·二	—	七一·一	九九·一
一九二七	九五·五	一〇〇·一	八六·八	一〇一·二	八八·六	一〇四·五
一九二八	一〇〇·〇	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二九	一〇六·〇	一〇九·四	一〇六·〇	九九·八	一二三·七	—

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周期的性質仍然是保持着。但是牠的性質，受着了極其本質的變化。表中首先表示市場的景氣和旺盛的本質消失了。當一個國家停留在景氣和旺盛的時候，而其他的國家則由於或多或少的不景氣的銳化所支配。隨而，市場的景氣和好況，在一個國

家好像並不是長期的。若果那被考究的周期，是開始從一九二〇年的危機中，而且由於一二九年的危機所終結的話，則確證了在這種數字的範圍中，差不多在一切的國家，市場景氣都被那不尋常的繼續性和尖銳性的不景氣所絕滅。因此，某些部門（例如石炭工業）某些國家（例如英國）差不多完全停留在慢性的不景氣中，這個事實也是戰後周期發展的特性。

戰後資本主義的這種周期發展的變形，也明白地表現於近代世界經濟危機成熟過程的特性中而且在近代危機以前並沒有全面的和長久的景氣。在一九二八年，顯著的景氣祇存在於美國、法國以及若干小國中。在一九二九年上半期，那一時的市場的景氣和旺盛，發生於最大的工業國家中，但是，在一九二八的末後，世界農業危機已經激烈地被銳化了，而且由於這個危機的影響，大部份農業國家，在一九二九年的全年中，都被市場的不景氣和危機所籠罩。因此，我們知道，一九二九年度的大工業國家中暫時的景氣，帶來了農業國的一時危機和不景氣。

這一切周期發展的性質上的變化的動因，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上成爲更加的頑固。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占有形態之間的矛盾大大銳化了，這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特

性。只有當這些矛盾，在資本主義經濟上喚起了危機的必然性的時候，這種銳化，很明白地引導向危機的頻發，而且使恐慌和恐慌之間的不景氣的時期成爲長久。尤其是那固定資本的再生產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從總危機的條件所發生），給與周期發展的變形，以極其本質的影響，固定資本的再生產的周期性，形成了大體的周期發展的物質基礎。危機是固定資本周期再生產的出發點。但是後者本身也給與周期發展的長久性質以影響，也給與大體的周期的繼續性以影響。

在戰後資本主義的時期周期的發展，是發生於市場的狹隘的基礎上，而且也發生於戰後的特有的合理化的條件上，這個事實除了那種爲戰前的周期所特有的，那樣用螺旋狀線來發展的可能性。戰前資本主義，在周期循環的範圍上是以集中化的，擴大的半圓狀來描出，但是在戰後的資本主義就是在周期循環的範圍上，也是以不十分集中化的，常常中斷的圓形，來實現這種固定資本的生產。

這一切都說明：戰後資本主義，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範圍中一般景氣的不存在。在資本主義一切矛盾銳化的條件下一個國家中的景氣，祇有以其他的國家某種犧牲而實現。最後，這

些事實，也說明了近代世經濟危機的成熟過程的特性。戰後資本主義市場景氣的不平衡的銳化和增大，也在以下的事實中被表現出來，即當農業國家已經進入了危機的波浪的時候，工業的國家，還仍然保留着景氣。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戰後資本主義周期發展這些性質的變化上，在工業企業的倒閉上，在不斷的失業上，發現了自己的表象。

(八) 農業的危機

資本主義總危機，也在農業經濟上，表現了若干其他的現象形態。戰後的農業危機，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個構成部份。由於農業經濟上生產時期的長久性，以及小農經濟占優勢的影響，農業經濟中的總危機，是以比其他經濟範圍中更加緩慢的形態來表現。從一九二〇年——二一年間，農業的危機，表現出極其尖銳性質，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仍然沒有消退。在一九二四年——二七年的時候，這個危機現出顯著的消退，但是，從一九二八年起，牠又重新被銳化了。在一九二九年，因為牠和工業危機相結合，所以使牠獲得了未曾有的性質，深刻、和銳化。周期的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範圍和根基上被展開的，事實可以在那從一九二九年所開始的，農業危機的特性上發現出反映來。同時這種農業危機，也是這種

總危機的構成的一部份。戰後農業的危機，乃是由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一切條件所喚起的。在那些使用農業國家生產物的工業國家中國民大眾購買力的制限上演着重大的作用。但是，這種重要的事實，更加由於這種世界經濟上的變化，所銳化和強化，同時這種變動，乃是由于戰爭所喚起的。在以上我們已經說過，戰爭招來海外各國播種面積的驚人的擴大，同時，這種擴大是由於把更小的牧地，向那加工範圍而引入的方法來實行的。但是戰後歐洲農業經濟的復興，以及農業經濟機械擴佈過程的強化，還有在工業國家中市場容量的縮小等——這一切，都使牠或多或少地獲得慢性農業危機的不可避免性之條件。低廉價格（獨占資本主義是用這個低廉價格從農民那裏收買他們生產物）和高貴的價格（獨占資本是以這個高貴價格來販賣牠自己的生產物）之間的剪刀形，工業和農業價格之間的剪刀形；大賣者和小賣者之間的剪刀形；輸出價格和輸入價格之間的剪刀形：都是戰後農業危機的原因和實材的擔負者。獨占和獨占價格的驚人的成長，在工業國家中，對於農業生產物市場縮小，以及由於市場問題銳化的結果所發生的，流通費用的巨額成長，農民的分散性，以及他們反對獨占資本主義權威的無能等等，都是存在這種相互制約着的，結合着的「剪刀形」制度的基礎。

上。農民經濟的大量崩潰過程，以及以前獨立的農民向租戶的轉化，租戶向農奴的轉化，以及農民大量的貧窮化等等，都是從這些剪刀形以及農業危機的整個條件中所發生出來的結果。

(九)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政治特性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經濟過程，是和牠的政治的過程有着難分的關聯，而且和後者緊密地相結合。政治反動的增大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一般特徵。但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極其促進和強化了政治上層建築的革新過程。在階級鬥爭的極其銳化以及敵對戰爭的要素的成熟等等的條件上，民主政治和議會對於布爾喬亞的獨裁的維持進而成爲非常無力。爲着代替那布爾喬亞獨裁的隱蔽的形態，遂發生了更加適應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狀況的，布爾喬亞支配的新的公開的形態。已經開始於戰前的帝國主義時期的，會議主義的危機，成長到議會的破產。民主政治自主的絕滅和制限，議會機能的限制或者以「職業」的代表來代替牠的這個事，實際上已經轉移到個人獨裁，或者「小議院」權力，法西斯的成長，是這些過程的基本的現象。

法西斯的方法，是直接的獨裁方法，這個獨裁在觀念上蒙蔽了全國民、和職業代表的意

志（根據支配階級各種集團的本質）法西斯的方法是用某種特殊社會煽動的把戲來利用布爾喬亞、知識份子、和其他的大眾的不滿的方法（這種的把戲，例如，反對猶太人的情緒，反對高利貸資本的不澈底的鬥爭，以及議會「發言」的憤慨等等），同時法西斯的方法也是腐化政治的方法，這種腐敗的方法，在法西斯的民軍、黨機關、官吏羣中結合的，被收買了的制度創成形態上表現出來；因此，法西斯努力地侵入勞働者中，募集最落後的勞働階層，利用他們的不滿和社會民主黨的無能等等」——這樣，法西斯是布爾喬亞直接獨裁的方法，而且他們是以殺害革命的勞働前鋒，即「殺害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份子以及他們的幹部人員為自己的目的」軍事的武裝軍隊（例如德國的法西斯的突擊隊和防禦隊等等），乃成為法西斯黨中最重要的一個構成部份，這個事實正表現出法西斯這種目的。法西斯努力地拉攏小布爾喬亞階層，而且也募集普羅列塔里亞中最落後的階層這個事實，正是法西斯的特性。為着這個目的，法西斯擴大地採用了反資本主義的標語，而且給與那些都市和農村的小布爾喬亞以及知識階級以特別的吸力，再者為着要把牠們引入到自己的支隊，也努力地利用那大眾從社會民主黨的出發。

法西斯把布爾喬亞的直接的獨裁以及反對普羅列塔里亞前衛的流血，拿去和反資本主義民衆煽動相結合，一件事實正反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情狀。如果布爾喬亞的直接獨裁以及反對普羅列塔里亞的前衛的流血的需要，是從階級矛盾的極其銳化和敵對鬥爭的要素成熟中發生出來的話，反資本主義的口號的利用的必要是由於小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里亞的急進化所迫逼，同時，這種口號的利用，也是因為要是沒有適應於他們的反資本主義的心理，那就不能獲得對於他們的影響之所致。這種獲得不消說是一時的。法西斯，在那些在戰後，對於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勝利有着良好的條件，然而，因為受了民主黨代表的影響而失敗了的國家，特別迅速的成長了。法西斯巧妙地利用了大眾的不滿，他們在為着政權而行鬥爭的時期，不惜提出反資本主義的標語和綱領的約束，但是等到他們得了政權「……更加明顯地表現出大資本家恐怖的獨裁，而且很快地取消自己反資本主義的標語。」

民主政治的法西斯化，也是總危機的其他一個明白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乃轉化為法西斯的左翼。民主黨也參加去慘殺普羅列塔里亞的前衛，而且屢屢本身就是這種流血的主導者，這種事實正可以表現出社會民主黨的法西斯化。社會民主黨

把社會主義的口調和布爾喬亞階層的防禦活動相結合，而且實際上壓迫一切大眾的切實的罷工運動，並且以牠本身表現爲金融資本的代理人，這一切事實，都是社會民主黨的法西斯化的表現。所謂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家資本主義等等的「理論」都是奉承於這種社會法西斯實踐的理論。

的確，社會法西斯的特別任務和特殊的地位，強制社會法西斯去宣告自己是社會民主黨和議會制度的參加者，他們在某一階段上也利用馬克斯主義的口號，而且爲大眾反對這種表面的掠奪的嘗試而鬥爭。在對於大衆實行壓迫的時候，企圖在大衆中維持自己勢力的目的中，法西斯有時也不得不轉化爲「反動」。但是在事實上，社會法西斯掃除法西斯的道路，而且表現爲法西斯的代理人。爲了要適應於政治時局的變化，布爾喬亞利用了法西斯的方法，也利用了和社會民主黨互相提攜的方法，當危機最深刻的時候社會民主黨本身對於資本主義演着法西斯的作用。在發展的進路上，社會民主黨也表現出了法西斯的傾向，因爲在其他政治時局之下，他們並沒有防止法西斯去反對那些爲反對黨的布爾喬亞政治的底法西斯的方法，以及那和民主黨相結合的方法。爲「標準的」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而且也是資本主義總

危機所特有的法西斯的方法，被布爾喬亞利用牠以來拖延革命的前進。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招來了法西斯以及社會法西斯的出現和成長，同時也招來資本主義的破產，即所謂帝國主義矛盾的非常銳化。普羅列塔里亞和農民的貧乏化等等，破壞了法西斯和社會法西斯在大眾中的勢力，銳化了那些適應于這些政黨的各種社會階層間的不可避免的階級矛盾，而且由於牠把政黨導向沒落。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切條件上，都招來了普羅列塔里亞農民大眾以及都市小布爾喬亞的革命化過程的成熟。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時期曾經發生過好像戰後資本主義時期那樣尖銳的階級鬥爭。大量普羅列塔里亞的出現，在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未曾有的興盛以及農民的革命化——這一切都形成了戰後大眾的進攻，和革命運動的未曾有的緊張，也使普羅列塔里亞和農民的聯合的可能性，而且也使普羅列塔里亞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聯合得以現實。並且使普羅列塔里亞，能夠對於大眾的世界革命運動實行指導。——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這一切重要的性質的影響之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成長了。

(十)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迪沃羅基上的表現

頹廢的和行將死滅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期，也在意識形態上——即科學、藝術、以及哲學等之上，表現出特殊的性質。帝國主義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上的這種特質，被伊里奇在牠的著作「唯物論和經驗批評論」中的最深刻的分析，所闡明，而且強調了。在哲學上布爾喬亞，向着反動的方向的轉變，這個事實是帝國主義過渡時代——即十九世紀末——的特徵。「還元到康德」「還元到蘇姆」等等口號都被削除了，蘭格、阿維拿里烏斯、馬哈、條格，披爾遜等等的哲學出現於舞台上，那些美國的實驗主義者，也出現了，他們屢屢在「革命的」文句和最新的理論的護符之而傳佈觀念論，並且成爲公然的僧侶的，固有神祕的一層構成學說等發明驚人地成長了，另一方面由於觀念論的立場上來抽出物理的部份這些都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因此，在物理上最新的發見，成爲哲學以及自然科學上與唯物論者相鬥爭的工具和理由，因此在觀念論的手中這種數學和數學的物理學，都演着特別重大的作用。在這些條件下，物理學的舊代表的崩潰招來了自然科學的危機。社會民主黨們，把考茨基安特列夫等的理論，當作自己的意識形態，這些哲學者們成爲馬克斯哲學——即辯證法的唯物

論——的敵人，而且用自己的力量，來促或——康德主義，機械主義的理論的流佈，這些社會民主黨完全成爲普羅列塔里亞的敵對營陣。

帝國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時期，在藝術上同樣表現出神祕主義以及曖昧的、魁感底強化，或者也表現出形式主義的經驗主義來。這些現象，在帝國主義時期的傾向和藝術學派中——即在象徵主義、未來派、立體派、無對象的藝術派、表現主義、構成主義、古典主義派等等——發現了自己的表象。

因爲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和法西斯的成長，所以在哲學的領域上，比以前更大地表現出理想主義和僧侶主義來了。那些轉化爲法西斯的伊迪沃羅基的，新黑格爾勢力，遂成長了，法西斯不單單壓迫了普羅列塔里亞的意識形態，而且也壓迫了布爾喬亞唯物主義論者的理論，甚至於理想主義的思潮，這些思潮是表現出布爾喬亞階層的左傾份子的思想，而且祇是和唯物論相眉來眼去的思潮（例如若干新康德主義和機械論的最新的思想）。在德國自從轉變爲法西斯政權以後，這種壓迫過程，達到了極其的高度。由於德國某些州省的政府，隨而全帝國的政府的條約的締結布爾喬亞的唯物論的雜誌——如「理性之聲」——之禁止，以及

那以黑格爾主義爲基礎的一元論的，聯盟的組織，學校的破壞和法西斯化，「毒害讀物」的焚壞，教授的迫害等等——這一切都證明了布爾喬亞文明的崩潰的，在反對科學的哲學的立場上，法西斯的哲學，公然的傳說神祕，以及反對唯物論，反對唯物論的世界的中心——蘇聯。

第四節 蘇聯的成長和資本主義穩定的終結

當世界經濟分離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這種分離成爲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根本現象的時候，總危機的時期，乃成爲兩個敵對制度，在先前單一的世界經濟界限中，行着無情鬥爭的時代。在這個鬥爭中，蘇聯方面占着極大優勢，這種優勢，是蘇維埃比資本主義經濟有爲許多的優點所促進。同時，這些優點非常加速蘇聯經濟的發展。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和地主把大部份的國民收入，都用到不生產方面去，但是這件事情，在蘇聯經濟中完全被排除了，這是蘇聯經濟的一個極大的優點。根據若干統計，在帝俄時代工業利潤率從一八八五年到一九一三年的時期中，平均每年是百分之十

六左右（其中扣除對於外國資本的比率，直接的租稅和紅利等等），但是工業上固定資本的增大，不過祇是百分之七左右。我們知道，固定資本的增大，不單單祇是用工業利潤來實行。而且有時也運用那將財產從農業向工業中移注的方法，以及輸入了的資本等等，來實行的知道了這個以後，那末，我們就更加明白，這些大部份工業利潤，都被利用到不生產方面。同時，我們也明白，這種被蓄積的，只不過是這些工業利潤的極其小的部份。大部利潤的寄生使用也發生於商業、運輸、銀行的部門中。工業、運輸、銀行等等從資本家分離而成爲國有化的這件事實，創造了以下兩個可能性，第一、國家能夠把國民收入的部份，拿來促進蓄積；第二、可以將牠來提高工資等等。

在蘇聯地主的寄生消費都被消除了，這同樣也有重大的作用。革命廢除了贖身金、借貸金、以及地租等等，同時也廢止了土地的買賣，並且也減低了租稅。因此，大部份的國民收入，在從前是被利用爲不生產的目的，但是到今日隨着普羅列塔里亞的革命，也被解放而且拿來爲生產目的而應用丁。

加之，在蘇聯經濟制度中，生產的動機並不是爲着利潤的，這個事實同樣也有着重大的

意義。這個實和國民大眾購買力的增進以及有計劃的規則經濟三樣相合起來，乃創造了企業最高效率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生產機關，通常是以不完全的工作能力，工作於一次的替換，但是，在蘇聯的經濟中，甚至也在兩三次的交代上實現了企業實際的完全效率的可能，而且也實現了那從間斷的勞働日轉移向連續勞働日的可能，這是因為在蘇聯經濟中，並不存在着那為資本主義所特徵化的商品，販賣的困難性的緣故。這些條件都是蘇聯能夠掉那為資本主義所特徵化的週期發展（即危機）的原因。蘇聯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不同，因為牠能夠不斷地而且有計劃地發展着。

在蘇聯牠因為那基本的生產手段都集中於普羅列塔里亞獨裁的統一機關中，所以為技術進步的促進，造成了特別豐富的條件。首先，使大量的生產，以及生產的專門化，和標準化，都成為可能。加之，祇有在蘇聯，才能夠發生國民經濟電氣化的未曾有的增大。因為生產和動力的源泉，都集中於普羅列塔里亞獨裁的統一機關所，使牠能夠實現那大規模的地方發電所的建造的澈底計劃這而且用這種大發電所，來供給許多地方的電力。同時這種機械化以及生產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化，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的指導的任務，而且也是牠的經濟

政策的方針，並且以上這件事情，在其中有着特別重大的作用。

蘇聯的工業化，是能夠在那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水準和技術的基礎上而進行。所以造成了勞働生產性的很高的水準，而且保證了投資的高度的効用。雖然，這些優點，在一定時期，是那些工業化了的，後進國家的特性，然而，祇有在蘇聯，因為有着大規模的資金的援助，所以才能夠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勞働組織化方面，我們必需強調在蘇聯經濟中，失業完全被排除這一件事，以上所記載的那些蘇維埃經濟制度的特性，使失業能夠得以消除。不消說，這種失業的消除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因為牠意味着（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下），生產人民的顯著的增多。勞働者對於生產態度的根本變化同樣也有着最重大而且非常特別的意義。生產手段向着普羅列塔里亞手中的移轉，造成了勞働者對於勞働採取着一種進取的和創造的態度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競賽、突擊隊、以及工業財政計劃等等，都是勞働者對於生產所採取的態度的大轉變的一個表現。

文化水準的提高，在增加國民對於生產部門的創作能力的興盛上也演着重大的作用。在

大衆間興起了對於技術，對於學習的未曾有的緊張。農民集體農場，以及熟練勞働者以自己的速度，而行着未曾有的成長。實際的水準，雖然還是不充分的，然而這些水準，是保存着未曾有的速度而驚人的向上。這種文化水準的提高意味着國民大衆對於生產部門上創造能力感覺到更加的實際，而且要轉化爲大大的改善的源泉，也轉化爲生產的組織化，以及成爲促進生產力增大的源泉。在蘇維埃商業的領域上，首先，必需記載，那在蘇聯經濟上，大部份的不生產的流通費用的消除。因爲在蘇聯這種不生產的流通費用有能夠完全消除的緣故，因此解放出許多爲生產的目的而應用的財產。

我們更要記載，戰爭費用的縮小這個事實，因爲在蘇聯帝國主義利益鬥爭的不存在，所以使出入的預算，能夠比帝俄時代要減少兩倍之多。隨而帝俄政府公債的取消，把蘇聯從資本家的很大的支付中，解放了出來，而且把牠拿來應用爲國家工業化的費用。我們很記得這種支付，在一九一三年是四億三千四百萬魯布，就是以上那些的記載，也並不能夠完全表露出蘇維埃經濟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極其本質的優越性。但是在以上的說明中已經很明白地表現出，蘇聯經濟，是能夠達到很快的發展速度，而且這種速度的程度是遙遠地凌駕

那些由於資本主義國家所達到的最大速度。

過去幾年間事實上的發展的速度，完全證明了以上所述的那些事實。工業生產物的每年平均的成長速度，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是百分之二十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因為在這個五年計劃中，困難的中心，被轉到新的企業的國產化，所以每年的成長，最低限度預定為百分之十三到十四間。這些速度底特別的性質，若果將牠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的生產成長的速度相對照那就成為非常的明白。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速度，要算美國為最高，但是在那裏，就是工業生產物的每年最大的增大速度平均在十年間（在一九世紀七十年代間）從沒有超出百分之十。加之，從九十年代開始平均速度，遂有系統的低落了，而且每年所擺動於百分之三到四的界限之間。尤其是在一九二四—二八年的時期中，牠每年平均是百分之三。

蘇聯經濟特別的速度而成長，這種速度，是凌駕那由於資本主義國家所呈現的特別速度。但是資本主義的世界是停滯於總危機之中，這種危機，在從前就是在最初的時期就已經表現出成長速度的激烈的降低了，而且到了如今，牠更表現出未曾有的性質，長久性、深

化、以及世界經濟危機的銳化。蘇聯經濟的成長，和資本主義世界的頹廢間的對立在近代世界經濟危機以前，就已經被表露出來了。這種危機的發展，更加深刻化了這種對立。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中（即一九二八—三一年間），工業生產物的實數，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十九，向工業中的投資，是二百三十三億盧布。「因為爲了重新建起，工業、運輸和農業的自身工業化的基礎，所以蘇聯在技術經濟的關係上，已經達到最發展國家的第一列。」

然而，在美國，工業生產，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二八年相比較，竟低落了百分之四十四，在德國低落百分之四十五，英國低落了百分之二十，在法國低落了百分之二十五，波蘭低落了百分之四十六等等。一方面，蘇聯耕地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增加了二千一百億平方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也是以收穫的增大爲目標，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方面，因爲危機的影響，行着耕地的縮小，農業的機械和肥料販賣的縮小，而且使農民經濟崩潰。蘇聯成爲世界上獨特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不但避免了危機，而且在世界危機的時代，也以特別的速度繼續地發展。隨而，這樣的事實使蘇聯對於全世界勞動大衆的革命影響急速地增大起來。

蘇聯不僅僅在經濟組織的方面，而且也在文化的領域和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立。爲着和那

發生於資本主義的國家的反動的增大，科學的徹底的創造工作的歪曲等相對抗，蘇聯特別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發生了科學的徹底工作和科學澈底的創造的驚人的發展，也發生了那爲着最廣大的勞動大衆的一般的和技術的學識鬥爭，並且完成了成功的鬥爭，也發生發明以及文化成長，宗教和其他的根絕等等。

資本主義部份的或一時的穩定（這個穩定是開始第二個時期，而且也是從這個第二時期所創成的），從戰後的紛亂中，發現了資本主義一時的出路，而且反映出商業和生產的成長，革命戰爭的退潮，美國資本向歐洲的充溢，償款問題的一時調節等等。但是近代世界經濟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一個階段，這個近代的危機，迅速的掘崩了一切資本主義朽腐了的穩定的條件。因爲近代世界危機是特別銳化、長久性、深化以及全面性，所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的混亂又重新被強化了，而且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乃發生了未曾有的失業和生產的縮小這種生產的縮小，乃招來未曾有的失業的增大和未曾有的大衆的痛苦，也掘崩了世界的信用關聯，而且也增大了世界貨幣流通上的混亂，非常攬亂而且銳化了全國際的和階級的矛盾；極其增長了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大衆的影響。在大衆中，革命熱情的成熟也發

生於這個基礎上。法西斯的成長，以及牠在德國一時的凱旋，祇是支配階級用破壞普羅列塔里亞前衛的方法，用狂暴的，和無慈悲的流血的方法，來進攻成熟了的普羅列塔里亞革命勝利的最後努力的一個表現。但是，法西斯，在那被強化了的資本主義的危機的條件上，要成爲國際的以及階級的矛盾更進一步的銳化的因子。

這一切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的條件，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莫大勝利之下確定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終結。

「在資本主義世界上，繼續地發生了如下的情形：第一、經濟危機的銳化；生產的縮小，牠的規模達到使得半數以上的勞動階級，都體受到完全的或部份的失業的，這樣程度；農民的貧窮化獲得稀有的規模；第二、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同時也在殖民地的國家中，革命的成熟，（例如那狂暴的頑固的罷工、革命的表示、勞動者和警察、以及法西斯的無情的衝突、農民大衆的武裝等等）；以及那殖民地國民，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鬥爭的銳化；第三、帝國主義國家間矛盾更進一層的銳化，例如，商業的戰爭，帝國主義武器強化的競爭，凡爾賽制度的破壞；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日本和英國之間，英國和美國之間，意大利和法國之間，

德國和法國之間關係等等，激烈地銳化）；第四、反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準備也被銳化……總括一句來說，這一切事實，都完全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階段上，表現出一定的破壞，表現出那瘋狂地滿布了那由於各地所遲延了的敵對勢力的特有衝動。敵對的勢力已經為衝突而爆發於特定的、極其重要的、復雜的地點。資本主義相對地安定終結了。但是在最重要的以及占支配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直接革命的形勢，還沒有到來。那在階級之間，在國家之間的巨大衝突向着新的波浪過渡着，這個向着革命和戰爭的新波浪的過渡，確實要在不久的將來完成。

譯後記

本書是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十七卷中「帝國主義」一項的譯述。主要的內容是敘述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切現象和法則。它完全是根據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的理論體系，加上許多新事實的材料完成的。在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裏，曾引用了許多布爾喬亞的文獻，本書中盡可能的減少了，所以使得讀者更容易閱讀。本書的大綱在緒論裏已經有很詳細的敘述，所以這裏也用不着我來多費筆墨。

想不到剛譯完第九章的時候，竟遭遇了一場大病，要不是朋友們的幫忙，恐怕再過幾個月這本書也不會和讀者見面吧！

因為病魔的纏繞，致不能仔細親自校對，更不能逐字逐句去修改，所以譯筆非常生硬和艱澀，誤譯的地方亦在所難免，尚希讀者原諒和指正。

本書第十章反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全章都刪去了，原因同樣出於病魔的糾纏。好在每一章裏都附有對不正確理論的批判，多少可以補足這個缺點；然而，總是一件美中的不足。

最後，我要向橋本宏毅、田中長三郎、朱正萍、鄭健來諸君致謝，爲的是他們給了我不少的幫忙。有的在譯述方面做了我的教師，有的在出版和整理上做了我的臂助。

譯者 一九三七，五，二〇。